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7 至 8 世紀唐朝與突厥爭奪農牧混合地帶

The Conflict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the Turks in the
Agricultural- Pastoral Mixed District from 7th to 8th Century

文宇軒

Yu-Hin Man

指導教授：甘懷真 博士

Advisor: Huai-Chen Kan, Ph.D.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July, 2016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7 至 8 世紀唐朝與突厥爭奪農牧混合地帶

The Conflict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the Turks in the Agricultural-
Pastoral Mixed District from 7th to 8th Century

本論文係 文宇軒 君（學號 R01123005）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5 年 7 月 13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
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甘懷真

（指導教授）

李明仁

陳俊強

謝辭



首先，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和口試委員。在兩年半的時間中，甘懷真老師擔任我的指導教授，教導我一些論文寫作的概念，叮囑我的寫作進度。在敲定題目後，他建議我參考晚近的學術著作，特別是農牧混合地帶的相關研究。李明仁老師不僅擔任我文獻回顧的口試委員，更給了很多的閱讀上的建議，我循他的建議充實了內亞史方面的知識。此外，也感謝陳俊強老師百忙中抽空擔任這我碩士論文的口試委員。

接著，論文寫作前後，感謝學長姐給我各種的建議。林慧芬學姐的研究領域和我比較接近，在求學期間給了相當多的協助、鼓勵和建議。蔡長廷學長擔任我的初稿發表評論人，協助我了解北亞史研究的學術脈絡，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此外，林世偉學長也給了我不少鼓勵和建議。

最後，還得感謝一些親友，但人數眾多，無法一一道謝。有關老師、學長姐給的閱讀建議，由於時間緊迫，未能全部讀完，算是完成論文之際的小小遺憾。

摘要



本文處理 7 至 8 世紀唐朝與突厥爭奪農牧混合地帶，以及其後續影響。農牧混合地帶是一個從現今遼寧伸延到甘肅、內蒙古西部、陝西北部的狹長過渡地帶。本文焦點，將放在今內蒙古中部及山西北部，大約是唐高宗時期單于大都護府的所在地。所謂唐朝與突厥爭奪農牧混合地帶，包含了 7 世紀初東突厥滅亡，唐朝就地設置羈縻州，和 7 世紀末 8 世紀初，唐朝與後突厥在該區爆發的戰爭。歷史上，草原游牧國家與農耕中國重複爭奪這個區域，當後者取得勝利時，會沿邊安置歸降部落，以阻擋更外圍的游牧部落。唐朝之所以設置突厥羈縻州，也是基於上述原因。唐朝為了架空可汗氏族阿史那氏，改以重用阿史德氏族，結果導致阿史那氏的崛起，突厥人在其主導下復國。在內陸亞洲史的脈絡下，後突厥汗國時期，以突厥文字的發明為指標，漠北的游牧社會開始進入「文明化」。後繼的回紇開始修築城市，引入體系化宗教，完成了「文明化」的過程。受回紇影響的契丹繼承了這些變革，並解散了既有的部落共同體，代表北亞正式進入中世時代。在中國方面，雖然朔方軍的建立、三受降城的修築抵擋了後突厥的入侵，但隨著中唐以後國勢漸衰，藩鎮割據，晉北與內蒙中部在晚唐成為李克用的勢力範圍，下啟五代沙陀諸王朝。以上，無論是突厥的復國、朔方軍的建立，都可以追溯到公元 7 至 8 世紀的農牧混合地區。

關鍵詞：唐朝、後突厥汗國、農牧混合地帶、阿史德氏、內亞史

Abstract



This thesis deals with the conflict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the Turks in the Agricultural- Pastoral mixed District from 7th to 8th century and its influence. Agricultural- Pastoral mixed District was a long and narrow transitional area from Liaoning to the west of Inner Mongolia and the north of Shaanxi. This thesis would focus on the nowadays middle part of Inner Mongolia and North of Shanxi, which was the location of Chanyu Protectorate during the Gaozong reign. The conflict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the Turks in the Agricultural- Pastoral Mixed District means, 1. fall of the First Turkic Khanate in early 7th centur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Jimifuzhou and 2. The war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the Second Turkic Khanate in late 7th and the early 8th century. In history, nomadic states and agricultural China had conflicts in the Agricultural- Pastoral mixed District, if the latter won the war, it settled down the surrendered tribes in the same area to defend the outer nomadic tribes. Tang Dynasty created Jimifuzhou for the same reason. Tang Dynasty promoted the members of the Ashide clan(or tribe) and overhauled the members of the Ashina clan(or tribe), it caused the rise of Ashides that the Turks rebuilt their khanat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Ashides. In the context of inner Asia history, the Turkic Alphabet was invented in the era of the second Turkic Khanate,, which mean the “civilizing” in the north of Gobi. The following Uyghurs built cities and introduced systemic religion, finished the progress of “civilizing”. Affected by Uyghurs, the Khitans displaced the original tribal communities, as a symbol of medieval period in inner Asia history. In the other hand, although the Tang Dynasty defended itself from the invasion of Turks by organizing the Shuofang Army and building the three Shouxiangchengs, it came to weaken in 8th to 9th century, the local powers fall into the

hands of warlords, Li Keyong controlled the north of Shanxi and the middle part of Inner Mongolia, his followers built the Sha-t'o dynasties. In conclusion, the path of Chinese and Inner Asian history in after 8th century was affected by the conflict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the Turks in the Agricultural- Pastoral Mixed District from 7th to 8th century in some reason.

Keywords: Tang Dynasty, the Second Turkic Khanate, Agricultural- Pastoral mixed District, Ashide clan, Inner Asian history

目 錄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謝辭.....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	1
第二節、研究回顧.....	2
第三節、材料、方法與架構.....	14
第二章、草原與農牧混合地帶的歷史.....	16
第一節、內亞史的時代劃分.....	16
第二節、農牧混合地帶與中國史.....	22
第三章、從唐朝羈縻統治到後突厥建國.....	27
第一節、唐朝羈縻體制.....	27
第二節、唐羈縻統治下的阿史德氏.....	41
第三節、從「十二姓」突厥到「三十姓」突厥.....	57
第四章、後突厥汗國與唐朝爭奪農牧混合地帶.....	63
第一節、黑沙南庭與後突厥的崛興.....	63
第二節、從黑沙南庭到於都斤山.....	72

第三節、8 世紀以降的草原與農牧混合地帶.....	81
第五章、結論.....	88
徵引文獻.....	91



圖目錄



圖一、突厥汗國的政治結構.....	19
圖二、公元 10 世紀的中央歐亞型國家/征服王朝.....	22
圖三、三受降城及陰山的突厥遺址群.....	66
圖四、南北蒙古的遊牧中心概念圖.....	80
圖五、陰山山脈要圖.....	86



第一章、緒論

(一)、研究動機

本文所指 7 至 8 世紀的突厥，實際上是指唐朝羈縻支配下的突厥人，以及復國之後的突厥第二汗國，或稱後突厥汗國。貞觀四年(630)唐朝滅東突厥後，在陰山以南，以雲中為中心的農牧混合地帶，設置突厥系羈縻州，作為唐朝北方邊疆的屏藩。因此，調露元年(679)突厥的復國也在農牧混合地帶展開。接著，後突厥與唐朝圍繞著該地帶開始一系列的戰爭。以景龍二年(708)，三受降城的修築為轉捩點，後突厥在這場爭奪戰都漸居劣勢。毗伽可汗將政治重心移往漠北，並積極向唐朝爭取互市，這樣的政策被後起的回紇汗國繼承。

承上，本文回應的課題有三。第一，是後突厥汗國，特別是毗伽可汗統治時期作為草原歷史的轉捩點。無論從「北亞」、「內陸亞洲」抑或「中央歐亞」的角度，都不難看出 10 至 13 世紀，草原進入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其特徵為文字、城池、體系化宗教、部落組織的解體與重編。除了最後一項，其餘三項都在回紇汗國時期業已完成。有更甚者，草原上突厥系民族的文字，發明於後突厥汗國時期，而在毗伽可汗統治時期，便有過築城、建立佛寺的建議，只是最後沒有執行。從以上的例子，可看出草原歷史並不止於部落聯盟的散聚、游牧國家的興亡，而是一個「螺旋向上」的過程。

第二，是後突厥與唐朝爭奪農牧混合地帶，如何造成雙方政策的轉變。自戰國、秦漢、北魏、隋唐，歷代王朝都將農牧混合地帶視為北方國防的最前線，積極控制農牧混合地帶。不僅如此，北魏、北周、隋、唐一脈相承的「拓跋國家」，與該地帶的游牧集團都有頗深的淵源。另一方面，來自草原的游牧國

家為了農業、手工業的資源來維持王權，必需掠奪，甚至控制農牧混合地帶。後突厥爭奪農牧混合地帶區未果，把重心移往漠北，改為貿易為主的政策，為後世的回紇沿用。唐朝則在河套以北成立了朔方軍，最初是防備突厥，後來成為平定安史之亂的主力。在後突厥滅亡之際，進入東北邊疆的粟特系突厥，則成為安史軍的重要成員。由於唐朝貫徹著以降部屏藩北方邊疆的政策，原屬朔方軍的振武軍，在沙陀的主導下成為唐末重要的割據勢力，並開啟五代沙陀王朝。以上無論是回紇、粟特系突厥、沙陀，乃至與沙陀同時期的契丹，都可視為 8 至 9 世紀內陸歐亞交通及貿易發達，財富、軍事力量與統治技術結合的結果。

第三，是關於後突厥汗國的性質。在半世紀的羈縻統治中，唐朝架空阿史那氏，重用阿史德氏，結果阿史德氏以擁護阿史那氏為號召，領導突厥人推翻唐朝的羈縻統治。突厥的「復國」實際上以阿史那旁支和阿史德為權力核心，其權力結構與原來的東突厥不完全相同。此外，晚近的研究指出，後突厥全盛時期，一直建牙陰山以北，稱為黑沙的地方。這個發現使研究者重新閱讀〈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時，能有一些新的發想。更進一步，可以結合 7 世紀初東突厥滅亡前夕的歷史，探討突厥牙帳從定襄到黑沙，再到漠北於都斤山的意義。

(二)、研究回顧

1. 草原歷史的相關概念

在有關草原與遊牧民歷史的討論中，不時可見「北亞」、「內亞」、「中央歐亞」這三個說法。有時候，這僅作業習慣用語或地理名詞來被使用，但事實上這些專有名詞都有其具體所指和學術史上的淵源。

在日本學界，「北亞」一語可以追溯到白鳥庫吉。白鳥庫吉〈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對立〉以南北兩大勢力的對立解釋亞洲的歷史。¹這篇文章雖然在學術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但其內容仍然有不足之處。白鳥氏把中國和遊牧國家當成兩個同質的整體來處理，忽略了邊疆的地域性格，也忽略了隋唐統治集團與北魏的淵源。

到了戰後，北亞的範圍有了更明確的定義，而學者們在處理北亞的歷史發展時，比較注意到不同時空背景的差別。護雅夫《遊牧騎馬民族国家》所指的北亞，大概是蒙古高原及其周邊，如鄂爾多斯、南西伯利亞、阿爾泰山一帶。²田村實造《アヅア史を考える—アヅア史を構成する四つの歴史世界》把歷史世界的定義為，同一文化圈中，從古代到中世期間，存在統一政權的世界。在這框架下，遊牧文化相對於農耕文化，北亞世界相對於東亞世界。田村氏將匈奴至回紇視為北亞史的古代，將遼朝視為北亞史中世的開端。³

日本學者在修正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的中國征服王朝理論⁴的同時，把征服王朝與北亞歷史的斷代連結起來。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について——總括にかえて〉認為，滲透王朝與征服王朝都採取二元體制，兩者差別僅在於取得權力的方式不同，因此相對於征服王朝的不應該是滲透王朝，而是遊牧國家。⁵他在《中国史上の民族移動期》把前燕視為征服王朝的祖型，將北魏與遼、金、元並列為征服王朝。⁶田村氏在〈北亞に於ける歴史世界の形成と展

¹ 白鳥庫吉，〈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對立〉，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第8卷，(東京：岩波書店，1970 初版)，頁 69-84。

² 護雅夫，《遊牧騎馬民族国家》(東京：講談社，1967 初版)，頁 179-180。

³ 田村實造，《アヅア史を考える—アヅア史を構成する四つの歴史世界》(東京：中央公論社，1990 初版)，頁 3-6，74。

⁴ 魏復古把秦、漢、隋、唐、宋、明分類為典型中國朝代，把五胡十六國分類為滲透王朝，把遼、金、元、清分類為征服王朝。征服王朝在經濟和政治上實行二元統治，同時由於文化涵化而產生出第三種新文化，但新文化本身並不取代原有的遊牧文化和農耕文化。Karl A. Wittfogel 著，蘇國良、江志宏譯，〈中國遼代社會史(907-1125 年)總述〉，收入鄭欽仁、李明仁編《征服王朝論文集》(台北：2010 二版)，頁 9-51。

⁵ 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について——總括にかえて〉，收入氏著《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中編，(京都：東洋史研究会，1974 初版)，頁 625-629。

⁶ 田村實造，《中国史上の民族移動期》(東京：創文社，1985 初版)，頁 122。

開)以遼朝作為北亞中世的展開。⁷遼朝以人為方式改組部落，以耶律氏、述律氏為中心建立四大帳族，在長城外建立斡魯朵，長城內建立頭下州，後繼的金朝建立了猛安·謀克，成吉思汗時期的蒙古以千戶制取代了原有的部落，清朝也以人為建成的八旗作為核心的武裝。以上不同王朝的制度，可概括為解散舊部落，確立北亞的君主專制，預示著北亞中世的展開。⁸

村上正二〈征服王朝〉將北亞民族的歷史分為四階段，從匈奴到柔然為初期遊牧王朝，五胡十六國與北魏為滲透王朝，突厥、回紇為後期遊牧王朝，契丹、蒙古為征服王朝。村上氏以回紇作為後期遊牧王朝的典型，以強烈的民族文化認同、具備商業與宗教性格的都城為其主要特徵，又認為契丹和蒙古先後繼承以上兩項重要遺產。在此基礎上，遼朝實行徙民並建立斡魯朵、頭下州，乃至後來蒙古建立的投下州，都可視為遊牧封建制的開端。⁹

山田信夫純粹從北亞史角度去處理遊牧封建制，既有別於田村實造，也跟村上正二不盡相同。山田信夫《北アヅア遊牧民族史研究》把遊牧社會分成幾個階段，公元前7世紀南俄草原出現遊牧的生計方式，並在歐亞大陸擴散，公元6世紀出現了歐亞草原三大國，也就是東突厥、西突厥與可薩汗國，可薩汗國最先出現城市，7世紀的後突厥汗國創造了突厥文，7至9世紀的回紇建立具有商業與宗教性格的都城，引入作為體系化宗教的摩尼教，完成了遊牧社會的「文明化」。接下來的階段，是成吉思汗時代舊部落解體，人為建立新的軍政單位，作為子弟與功臣的封地，是為遊牧封建制、北亞中世時代的展開。¹⁰

⁷田村實造，〈北亞に於ける歴史世界の形成と展開〉，收入氏著《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上編，(京都：東洋史研究会，1964初版)，頁55-56；田村實造，《アヅア史を考える—アヅア史を構成する四つの歴史世界〉，頁74-75。

⁸田村實造，〈北亞に於ける歴史世界の形成と展開〉，頁44-56；村上正二著，鄭欽仁譯，〈征服王朝〉，收入鄭欽仁、李明仁編《征服王朝論文集》(台北：2010二版)，頁129-134。

⁹村上正二著，鄭欽仁譯，〈征服王朝〉，頁109-123。

¹⁰山田信夫，《北アヅア遊牧民族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1989初版)，頁230-250；護雅夫著，林慧芬譯，〈遊牧國家的「文明化」——突厥遊牧國家〉，《早期中國史研究》，第2卷，(2010，台北)，頁213-253；護雅夫著，吳慶顯譯，〈索格底人在蒙古地區諸游牧國中所扮演的角色——一個新發現資料的介紹〉，《邊政研究所年報》，第9期，(台北：1987初版)，頁294-295。

有關「文明化」的討論，可以參考護雅夫〈遊牧國家的「文明化」——突厥遊牧國家〉及〈索格底人在蒙古地區諸游牧國中所扮演的角色——一個新發現資料的介紹〉兩文。東突厥在 6 世紀一度引入粟特文字和佛教，7 世紀末的後突厥汗國出現文字，同時期也出現了築城池、修佛寺的建議，但沒有被實行。¹¹綜合來看，後期遊牧國家的「文明化」完成於回紇，但最早可追溯到突厥。

除了上述的「北亞」，草原的歷史還可以用「中央歐亞」或「內亞」的概念來加以討論。內陸亞洲一詞最早是由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提出，其描述範圍也僅限於中國邊疆。後來，塞諾(Denis Sinor)將之擴大解釋，也比較接近今天學術界的普遍用法。在塞諾的用語中，中央歐亞是一個相異於歐亞大陸邊緣輝煌文明的文化圈，兩者的版圖互相消長。理論上，中央歐亞包含了草原、沙漠、西伯利亞的森林和北極的苔原，但只有草原的遊牧民能有較複雜的政治組織，與定居文明相抗。同時，遊牧民帶有宗教寬容的精神，經常作為文化的傳播者。¹²由於亞洲的遊牧民總是建立起舉足輕重的遊牧國家，因此塞諾有時用把中央歐亞簡化為內亞，即使他承認這並不是最適合的稱呼。¹³

以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為代表，近十年的研究開始採取中央歐亞的視點。森安孝夫認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是一種歐洲中心史觀。在森安孝夫的框架下，約 1000 年至 1500 年被稱為中央歐亞型國家優勢時代。有別於過去的日本學者，森安孝夫並不片面聚焦於中國征服王朝，指出同時代歐亞各地出現了由遊牧民統治大多數定居民的中央歐亞型國家。據書中的說法，所謂 6 至 9 世紀遊牧國家的「文明化」，其實就是文字的發明、體系化宗教的引入與城池的修築，其結果是遊牧騎馬軍團與絲路商人的結合、統治技術

¹¹護雅夫著，林慧芬譯，〈遊牧國家的「文明化」——突厥遊牧國家〉，頁 242-244。

¹²丹尼斯·塞諾(Denis Sinor)著，羅新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06 初版)，頁 1-24。

¹³丹尼斯·塞諾(Denis Sinor)著，羅新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譯序〉，頁 1-2；Denis Sinor edit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pp.2.

的累積、文書作業成為可能，最終促成大量中央歐亞型國家的誕生。¹⁴



2. 突厥遊牧國家

本文所指 6 至 8 世紀的遊牧國家，實際上是 6 世紀建立，7 世紀初滅亡的東突厥，以及 7 世紀末建立，8 世紀初滅亡的後突厥。要了解以上兩個突厥遊牧國家，除了參考歷史學界的相關研究，也能借用拉鐵摩爾、巴費爾德(Thomas J. Barfield)、Khazanov 等人類學對遊牧國家的研究成果。

在中國北方廣闊的邊疆中，存在著很多不同型態的遊牧社會，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指出，蒙古高原的遊牧民擁有強大的機動力與戰鬥力，能夠在邊疆建立遊牧與農耕的混合社會，西北綠洲與東北滿洲缺乏嚴密的社會政治組織，通常作為中國與北方遊牧國家彼此爭奪的對象。¹⁵

巴費爾德《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也注意到這現象，認為蒙古高原的遊牧國家才有能力敲詐勒索中國，而另一方面，東北環境與族群則相對多元，讓在地勢力得以進行嘗試各種統治實驗。當中原及草原兩大勢力衰落的時候，東北的勢力可以起來建立自己的王朝，甚至進一步入主中原。¹⁶

Wolfram Eberhard“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也注意到不同的遊牧民擁有不同的社會政治組織，突厥系遊牧民結成遊牧國家，蒙古系遊牧民有恆常的部落聯盟，藏系遊牧民只在戰時結成短暫的同盟。¹⁷此外，Peter Golden, ”The Turk Imperial Tradition”認為，遊牧民建立國家與否不完全取決於其族屬，歐亞草原東部本身具有一王權傳統，是草原西部所欠缺的。

¹⁴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東京：講談社，2007年初版)，頁 84-86，307-310。

¹⁵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初版)，頁 37-52，78-82，109-113。

¹⁶巴費爾德(Thomas Barfield)著，袁劍譯，《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初版)，頁 16，21-40，131-133。

¹⁷ Wolfram Eberhard,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Leiden: E. J. Brill, 1965), pp.116-118.

有關游牧國家的興衰，拉鐵摩爾認為，游牧社會的統治者必需面對財富與機動力(戰鬥力)的兩難。他們用軍事力量維持一個混合國家，這使他們逐漸喪失機動力，並與沒分到利益的游牧民發生衝突，屆時混合國家將會分裂，一部份人重新回歸游牧生活。¹⁹巴費爾德指拉鐵摩爾混淆了北方與東北游牧民的差別，蒙古草原的統治者透過攫取、分配來自中原的資源，作為鞏固權力的手段，分別為敲詐、掠奪中國的「外部邊界戰略」，和藉由朝貢、互市取得中國資源的「內部邊界戰略」。²⁰Anatoly M. Khazanov 主張游牧社會在與外部世界的互動中，產生政治整合。「外部世界」包括定居、農耕人群，以及其他游牧團體。²¹游牧君主透過壟斷外部資源，來建立、維持其威權。例如，壟斷商品交易，役使外來人口。²²商品交易的部份，可以參考松田壽男〈絹馬交易覺書〉。文中指出絲絹作為草原和絲路上的交易媒介，使游牧民有積極取得中國絲絹的必要，繼而開始了歷史上游牧國家與中國交替進行的戰爭與互市。²³林俊雄，〈掠奪・農耕・交易から見た游牧國家の發展：突厥の場合〉也從游牧民農業資源的依賴，具體地分析了東突厥乃至後突厥積極控制農牧混合地帶的動機。²⁴

從西方學者有關游牧國家的討論，可見一種長時段、靜態觀察的取徑。相

¹⁸ Peter Golden, "The Turk Imperial Tradition in the pre-Chinggisid era", *Turks and Khazars*, (Farnham: Ashgate, 2010), pp26-27.

¹⁹ 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頁 49-50，328-335。

²⁰ 巴費爾德(Thomas Barfield)著，袁劍譯，《危險的邊疆：游牧帝國與中國》，頁 16，21-40，131-133。

²¹ 高層政治組織並非游牧經濟的直接產物，它可能產生自以下原因：一、分配一些相對重要的資源；二、規劃常用的放牧遷徙路線；三、對特定生產進度的需求；四、防禦的需求；五、爭奪牲口、牧地，甚至耕地；六、遷徙與戰爭；七、征服其他的游牧群體。這些原因加以歸納、簡化，可概括為處理游牧團體內部事務、處理與其他游牧團體之間的互動、處理與農耕、定居人群之間的事務。Anatoly M. Khazanov translated by Julia Crookenden,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94) pp.148-149.

²² Anatoly M. Khazanov translated by Julia Crookenden,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pp157-158.

²³ 松田壽男，〈絹馬交易覺書〉，收入氏著《松田壽男著作集》，第 2 冊，(東京：六興出版，1986 初版)，頁 140-153。

²⁴ 林俊雄，〈掠奪・農耕・交易から見た游牧國家の發展：突厥の場合〉，《東洋史研究》，44:1，(京都，1985.6)，頁 110-112。

對之下，護雅夫致力於反駁亞細亞停滯論，²⁵因此更注重遊牧社會內部的階段性發展。在西方學界的語境中，遊牧國家與遊牧帝國並沒有非常明顯的區分，而護雅夫在《遊牧騎馬民族国家》中，則把氏族、遊牧國家(il/el)²⁶與遊牧帝國視為先後有序的階段性發展。一開始，遊牧氏族為祈求牧畜繁衍而產生薩滿信仰，其族長即薩滿，「聖」的權威者。同時，遊牧民為爭奪優良的牧地而爆發戰爭，互相兼併最終產生遊牧國家。這過程中，族長作為軍隊司令，也就是「俗」的權力者，鞏固控制自己的氏族，並將婚親氏族和關係較疏的其他氏族納入支配。而當一個遊牧國家兼併其他遊牧國家，統一北亞全境，便是所謂的遊牧帝國。²⁷

如果護雅夫的遊牧帝國對應為一般意義上的遊牧國家，他所指的遊牧國家實際上是「中核氏族群」或「貴族氏族群」，與其他被征服部族組成的「平民氏族群」集結成遊牧帝國。突厥可汗以聖山於都斤山為中心，派遣吐屯監視偏遠的被征服部族，並分封阿史那子弟為封建性諸侯，有權在「采邑」裡徵兵徵稅。至於，被征服部族的族長，則被授予俟利發或俟斤的稱號，被納入突厥汗國的伯克階層。²⁸護雅夫〈鉄勒諸部における elt äb är、irkin 号の研究〉考證，以上這些地方共同體的族長，比較有力的稱俟利發，比較弱小的稱俟斤。²⁹總括而言，護雅夫把突厥國家視為以阿史那氏為中心，層層向外擴張的同心圓，多少是受到 Wolfram Eberhard 的啟發。³⁰林恩顯《突厥研究》基本上沿用了護雅夫有關突厥汗國政治結構的討論，並以啟民可汗為界，把啟民以前的東突厥稱為

²⁵ 護雅夫，《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第1編，(東京：山川出版社，1967 初版)，序文，頁1。

²⁶ 護雅夫使用「突厥部族國家」來理解中古突厥文的 il(或 el)，這個 il 由可汗氏族阿史那及其姻親氏族阿史德，還有一些突厥氏族組成。護雅夫，〈突厥の国家構造〉，收氏著《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第1編，(東京：山川出版社，1967 初版)，頁3-4。

²⁷ 護雅夫，《遊牧騎馬民族国家》，頁185-187。

²⁸ 護雅夫，〈突厥の国家構造〉，頁3-60。

²⁹ 護雅夫，〈鉄勒諸部における elt äb är、irkin 号の研究〉，收氏著《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第1編，(東京：山川出版社，1967 初版)，頁398-438。

³⁰ 以上轉述李明仁師。

分權的封建國家，把啟民以後稱為集中的封建國家。³¹近年，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以語言學取徑，探討俟斤、俟利發從美稱到官號再到官稱的過程，並指出俟斤在這過程中不斷貶值，以至要創造更尊貴的俟利發，授予有力的部族首長。³²

有關東突厥政治史的部份，還有幾位篇論文可以參考。平田陽一郎〈突厥他鉢可汗の即位と高紹義亡命政權〉討論北周滅北齊後，東突厥他鉢可汗扶植北齊宗室的行動。³³藉由本文的啟發，研究者可對巴費爾德提出商榷——北方游牧國家要向中國勒索資源，必需以中國的分裂與積弱為基礎，故他鉢可汗有必要扭轉北周統一華北的事實。此外，朱振宏〈隋唐與東突厥互動關係之研究〉，文中整理出東突厥四部分國制，³⁴林慧芬〈北亞游牧國家之興衰與均勢——以突厥第一汗國為中心〉從國際間勢力均衡討論東突厥的滅亡，皆可作為了解東突厥政治史的參考。³⁵

史料方面，礙於材料的匱乏，有關東突厥乃至後突厥的研究都非常依賴後突厥的所謂突厥文三大碑。但得利於新材料的出土和學術的進步，相關領域的研究近年逐漸取得了突破。

首先，是〈唐故三十姓可汗貴女阿史那氏之墓誌〉中「十二姓」與「三十姓」的問題。羽田亨〈唐故三十姓可汗貴女阿史那氏之墓誌〉把墓誌中的「十二部」理解為高車十二部，³⁶但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認為十二部應該是指突厥，或突厥系粟特。³⁷片山章

³¹林恩顯，《突厥研究》(台北：商務書局，1988 初版)，頁 78-80。

³²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初版)，頁 148-150。

³³ 平田陽一郎，〈突厥他鉢可汗の即位と高紹義亡命政權〉，《東洋學報》，86:2，(2004，東京)，頁 1-34。

³⁴朱振宏，〈隋唐與東突厥互動關係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年，頁 38-41。

³⁵林慧芬，〈北亞游牧國家之興衰與均勢——以突厥第一汗國為中心〉，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暨碩士班歷史組碩士論文，2010 年。

³⁶羽田亨，〈唐故三十姓可汗貴女阿史那氏之墓誌〉，《東洋學報》，3:1，(1913，東京)，頁 135-152。

³⁷ Edwin G. Pulleyblank, “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 *T'oung Pao*, 2:41,(1952),pp.339.

雄，〈Toquz Oγuz と「九姓」の諸問題について〉認為唐代寫「九姓」、「九姓鐵勒」，其直接對應為 Toquz Oγuz，十二姓當指原來的突厥十二姓。³⁸森安孝夫〈テベツト語史料中に現われる北方民族——DRU-GU と HOR〉也認為十二部為「十二姓突厥」，也就是原本的東突厥諸部落。³⁹鈴木宏節〈三十姓突厥の出現——突厥国をめぐる第二汗北アヅア情勢〉認為「三十姓突厥」反映後突厥全盛時期的狀況，當時後突厥包括原有乎突厥十二姓、西突厥十姓，以及葛邏祿三姓、拔悉密五姓。⁴⁰

接著，是有關黑沙的地理比定。岩佐精一郎〈突厥の復興に就いて〉最先確認後突厥黑沙南庭在呼和浩特以北陰山一帶。⁴¹以前為基礎，後人試圖整理出更具體的地點。芮傳明〈Coray 和 Kara Kum 方位考〉認為黑沙大同以北，靠近白雲鄂博。⁴²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認為黑沙當在伊克湖靠近百靈廟。⁴³鈴木宏節考慮到陰山北麓烏蘭察布岩壁畫中的突厥文化遺存，⁴⁴以及 2010 年白玉冬、包文勝發表突厥文〈查干敖包碑銘〉的考察報告，⁴⁵將黑沙比定於白雲鄂博與百靈廟之間，稍偏向百靈廟處。鈴木宏節〈唐代漠南における突厥可汗國の復興と展開〉和〈内モンゴル自治区発現の突厥文字銘文と陰山山脈の遊牧中原〉認為，後突厥頡施跌利可汗、默啜可汗均以黑沙為中心，建立後突厥的

³⁸片山章雄，〈Toquz Oγuz と「九姓」の諸問題について〉，《史学雑誌》，90:12，(1981，東京)，頁 1。

³⁹森安孝夫，〈テベツト語史料中に現われる北方民族——DRU-GU と HOR〉，《アヅ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第 14 期，(1977，東京)，頁 10。

⁴⁰鈴木宏節，〈三十姓突厥の出現——突厥第二可汗国をめぐる北アヅア情勢〉，《史學雜誌》，115:10，(2006，東京)，頁 15-24。

⁴¹岩佐精一郎，〈突厥の復興に就いて〉，收入和田清編《岩佐精一郎遺稿》(東京：岩佐傳一，1936 初版)，頁 100-118。

⁴²芮傳明，〈Coray 和 Kara Kum 方位考〉，《西北民族研究》，1990 年 2 期，(1990，蘭州)，頁 156。

⁴³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5 初版)，頁 277-281。

⁴⁴蓋山林，〈內蒙古百靈廟一帶突厥遺跡初探〉，收氏著《蓋山林文集》(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 初版)，頁 725-761。

⁴⁵白玉冬、包文勝，〈內蒙古包頭市突厥魯尼文查干敖包銘文考釋——兼論後突厥汗國「黑沙南庭」之所在〉，《西北民族研究》，2012 年 1 期，(2012，蘭州)，頁 79-83。

全盛時期。⁴⁶這正好呼應了吉田順一〈ハンガイと陰山〉，認為於都斤山和陰山為大漠南北兩個同樣重要的遊牧中心。⁴⁷

最後，有關阿史德氏的崛起。護雅夫考證阿史德氏作為可汗姻親氏族，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後突厥時期的材料做來進行推論。齊藤茂雄，〈突厥「阿史那感德墓誌」注考——唐羈縻支配下突厥集團の性格〉運用〈阿史那感德墓誌銘〉證明阿史那與阿史德氏的聯姻，最起碼可以最溯到唐朝羈縻府統治時期。同時，文中也討論到唐朝架空阿史那氏的做法，間接造成阿史德氏興起，並以擁護阿史那氏為號召，領導突厥復國。⁴⁸

3. 農牧混合地帶

對於草原遊牧地區與中國農耕地區的過渡地帶，日本學者稱之為環狀地帶⁴⁹、農業—遊牧境域線⁵⁰、農牧接壤地帶⁵¹，中文學界稱之為長城區域⁵²，或針對唐代的狀況稱之為三受降城區。⁵³總之，學界對這地帶尚無劃一稱呼，本文暫且稱為農牧混合地帶。

有關農牧混合地帶的早期研究，可以參考歐文·拉鐵摩爾在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一書提出的「貯存地」(reservoir)概念。中國邊疆在歷史上是

⁴⁶鈴木宏節，〈唐代漠南における突厥可汗國の復興と展開〉，《東洋史研究》，70:1，(2011，京都)，頁 50-55；鈴木宏節〈内モンゴル自治区発現の突厥文字銘文と陰山山脈の遊牧中原〉，《内陸アツア言語の研究》，第 28 号，(2013，大阪)，頁 67-100。

⁴⁷吉田順一，〈ハンガイと陰山〉，《史観》，第 102 冊，(1980，東京)，頁 48-61。

⁴⁸齊藤茂雄，〈突厥「阿史那感德墓誌」注考——唐羈縻支配下突厥集團の性格〉，《内陸アツア言語の研究》，第 26 期，(2011，豊中市)，頁 22-33。

⁴⁹石見清裕，〈ラティモアの辺境論と漢～唐間の中国北辺〉，收唐代史研究会編《東アツ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東京：唐代史研究会，1999 年，初版)，頁 279-299。

⁵⁰妹尾達彦，〈長安の都市計画〉(東京：講談社，2001 年初版)，頁 41-45；妹尾達彦，〈中華の分裂と再生〉(東京：岩波書店，1999 年初版)，頁 8-12。

⁵¹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頁 59-62。

⁵²李鴻賓，〈長城區域在唐史研究中的位置——從歷史學與民族學結合的角度觀察〉，收氏著《唐朝的北方邊地與民族》(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1 年初版)，頁 102-103。

⁵³朱開宇，〈唐代交通圖唐帝國的空間運作——邊防、軍政佈局及歷史意義〉，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頁 89。

外來王朝的發祥地，並為「下一次的歷史變動(北方民族南侵)」儲存能量。⁵⁴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以此解釋歐亞大陸東部的歷史循環。草原深處的遊牧民擁有機動的軍事優勢，他們進入草原邊緣，透過掠奪累積財富，逐漸形成一個邊疆混合社會。同時，統治者必需維持機動與財富間的平衡，否則將導致政權的崩潰。⁵⁵

有關拉鐵摩爾提到的邊境混合社會，可以參考前田正名《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北魏佔領以桑乾河流域為中心，宜農宜牧的大同盆地，扼守了西接鄂爾多斯高原，南接山西太原，東方穿過太行山進入河北，北方越過白道進入漠北的交通線。北魏同時控制內蒙歸綏平原及晉北大同盆地，將原屬過渡地帶的農牧混合地帶，整個納入遊牧勢力的掌控之中。⁵⁶

有關 5 世紀後六鎮社會的形成與發展，可參考〈代の地——內陸アヅア境界地域社会の起源発展および歴史的意義〉。為了防禦柔然入侵，北魏在陰山地區設立六鎮。這些徙往六鎮的良民，出自鮮卑遊牧集團。又因為陰山的降雨量不出，這些人安頓下來後，應該採取畜牧為主的生業方式。其後，六鎮的人們漸漸成為新的精英，不僅推翻了北魏，也間接促成了唐朝的建立。⁵⁷

有關唐朝的邊疆政策，可參考森部豐〈唐前半期河北地域における非漢族の分布と安史軍淵源の一形態〉。文中考察了唐代河北地域羈縻州的沿革與安祿山麾下諸將的出身，從中可見唐朝與突厥的勢力消長，以及降唐的突厥系粟特人如何在當地發展勢力。唐初在河北設置羈縻州，到了武后時期，後突厥入侵，羈縻州或叛或遷。開元年間突厥漸漸衰弱，安祿山等突厥系粟特人降唐，被安置於河北，逐漸在當地形成勢力。⁵⁸

⁵⁴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pp30-53.

⁵⁵ 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328-352。

⁵⁶ 前田正名著，李凭、孫耀、孫蕾譯，《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初版)，頁 2-14，109-110，121-125。

⁵⁷ スコット・ピアース(Pearce Scott)著，早大北朝史研究会譯，〈代の地——內陸アヅア境界地域社会の起源発展および歴史的意義〉，《史滴》，第 27 号，(東京，2005)，頁 22-46。

⁵⁸ 森部豐，〈唐前半期河北地域における非漢族の分布と安史軍淵源の一形態〉，收入唐代史研究會編《唐代史研究》，第 5 卷，(2002，東京)，頁 32-36。

石見清裕〈ラティモアの辺境論と漢～唐間の中国北辺〉重新介紹了拉鐵摩爾的學說，強調草原與農耕地的中間地帶，希望超脫南北抗爭論的二元論史觀。文中的「中國北邊」是指從現今遼寧經過北京，沿長城經過山西北部，到達鄂爾多斯的一線。據石見氏觀察，當地自漢迄唐均扮演著以下的角色：一、將來自蒙古的民族移入當地，防禦更北邊的民族；二、藉由賚賜、互市、蕃將的俸給，使中國的財貨向北方輸送；三、當地的勢力為中國提供兵力，負起邊防的任務，但同時潛在著叛亂的危險性。⁵⁹石見清裕〈唐の成立と内陸アツア〉認為隴西李氏之族譜為偽託，唐朝皇族當出自大青山一帶的遊牧集團。⁶⁰〈唐の建國と匈奴の費也頭〉一文，考證李淵聯合他在鄂爾多斯的姻親，匈奴系費也頭，消滅河西薛舉。⁶¹

妹尾達彥的遊牧—農耕境域線是指，大約北緯 40 度，貫通歐亞大陸的地帶。生態上，當地的農耕地與牧草地、牧場並存，人們以畜牧業補充農產量的不足。遊牧—農耕境域線遍佈綠洲都市，是歐亞大陸重要的商業、交通線，與之毗鄰的地區往往是文明中心，其中關中平原就是個很好的例子。⁶²唐朝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平原為中心，經甘肅迴廊連結西域、吐蕃，經黃土高原、山西北部連接蒙古，越過秦嶺沿長江上游連接蜀地，通過渭河支流與漢水到達長江中游，並且經山西陸路到達華北。歷史上，長安一直是不同政治勢力、族群互相爭奪的地域，擁有文化上的混雜性。⁶³

森安孝夫的「農牧接壤地帶」，是指從河北、山西北部「燕雲十六州」到寧夏、甘肅六盤山、賀蘭山、祁連山的地帶。農牧接壤地帶對中國歷代王朝而言是雙面刃，唐朝前期有效控制該區而促成一時的繁榮。但同樣地，農牧接壤地帶也是安史之亂的搖籃。不僅如此，當地更是五代時期沙陀諸王朝、遼朝及西

⁵⁹石見清裕，〈ラティモアの辺境論と漢～唐間の中国北辺〉，頁 285-296。

⁶⁰石見清裕，〈唐の成立と内陸アツア〉，《歴史評論》，2010 年 4 月號，(2010，東京)，頁 4-7。

⁶¹石見清裕，〈唐の建國と匈奴の費也頭〉，收入氏著《唐の北方問題と国勢秩序》，頁 48-52。

⁶²妹尾達彥，《長安の都市計画》，頁 30-34。

⁶³妹尾達彥，《中華の分裂と再生》，頁 38。

夏登場的舞台。⁶⁴

張廣達〈從「安史之亂」到「澶淵之盟」：唐宋之際的中原和北方〉提到，安史之亂後河北作為一個民族雜處的社會，等9世紀回紇滅亡，契丹得以擺脫回紇的控制，在東北崛起。同時期，沙陀進入代北，下啟沙陀諸王朝。沙陀王朝為宋朝取代，遼宋簽定澶淵之盟，開啟了一種既非納貢也非羈縻的國與國關係。⁶⁵綜合而言，6至9世紀草原與中國兩個世界之間，以農牧混合地帶為中介，存在一種多線並行的互動。來自遼西與河東的兩個集團，分別在草原和中國建立王朝，做為全新歷史時期的指標。

(三)、材料、方法與架構

本文使用的歷史材料，主要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傳統漢文史料。其中，正史有《舊唐書》、《新唐書》，編年有《資治通鑑》，政書有《通典》、《唐會要》。第二類是突厥文史料，有〈噉欲谷碑〉、〈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以及近年發現的〈查干敖包蘇木銘文〉。第三類是突厥或其他外族的漢文墓誌，有〈阿史那感德墓誌銘〉、〈唐故三十姓可汗貴女賢力毗伽公主雲中郡夫人阿史那氏墓誌〉、〈大唐安西阿史夫人壁記〉、〈撥川郡王碑〉、〈李光進碑〉、〈康公神道碑銘〉。其中，〈阿史那感德墓誌銘〉和〈大唐安西阿史夫人壁記〉完全是考古出土，〈唐故三十姓可汗貴女賢力毗伽公主雲中郡夫人阿史那氏墓誌〉則既有實物，又有收入《全唐文》中，便於互相參照。其餘〈撥川郡王碑〉收入《文苑英華》，〈李光進碑〉收入《金石萃錄》，〈康公神道碑銘〉收入《全唐文》。

有關第二類史料，主要參考日本和中國學者的解讀，而〈查干敖包蘇木銘文〉的文字只有一句，最大的史料價值反而在於阿史那氏的公山羊標記。事實

⁶⁴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58-62，72-75。

⁶⁵張廣達，〈從「安史之亂」到「澶淵之盟」：唐宋之際的中原和北方〉，收黃寬重編《基調與變奏：七至十二世紀的中國》(台北：政大歷史學系，2008 初版)，頁 1-27。

上，這部份的討論必需依賴中國的考古報告，結合陰山北麓的烏蘭察布岩壁畫和突厥墓葬，才能做出比較有意義的解釋。由於題目本身的特性，本文參考了語言學、歷史學、人類學、考古學等研究成果，以求對史料作出有效的解釋。礙於筆者語言能力的不足，本文參考文獻以日文和英文為主，無法兼顧到土、俄、德、法等語文，也無力解釋中古突厥文的原始史料，希望他日能有所改善。

架構方面，第一章緒論，交待研究動機、文獻回顧、材料與方法。同時，也交代本文希望回應學界的哪些討論。

第二章「草原與農牧混合地帶的歷史」，整理基本的事實和背景知識，為全文的討論提供基本的框架。有關草原歷史的部份，討論北亞、內亞、中央歐亞等語彙的學術脈絡。有關農牧混合地帶的部份，討論該地帶在中國史上的作用，以及唐朝建國與當地的淵源。

第三章「從唐朝羈縻統治到後突厥建國」，討論了羈縻州的統治原理、管理方式。更進一步，討論唐朝架空阿史那氏嫡系的做法，如何造就了阿史德氏的崛起，以及阿史德氏在後突厥建國中的角色。

第四章「後突厥汗國與唐朝爭奪農牧混合地帶」敘述唐朝與後突厥汗國爭奪農牧混合地帶的過程、雙方政策的調整，同時考察後突厥黑沙南庭的位置。更進一步，從突厥牙帳的轉移，重新理解〈闕特勤碑〉與〈毗伽可汗碑〉。最後，透過後突厥與唐朝爭奪農牧混合地帶的歷史，總結草原及中國歷史的轉向，闡述兩者間透過農牧混合地帶，達至多線並行的相互影響。

第五章為結論，總結全文，回應緒論提出的問題意識，並展開相關領域研究的未來。

第二章、草原與農牧混合地帶的歷史



要處理 7 至 8 世紀突厥與唐朝爭奪農牧混合地帶的課題，先得釐清兩個重要的歷史脈絡。第一，是有關草原的歷史，乃至突厥人在草原歷史上承先啟後的角色。第二，是農牧混合地帶在中國史上的作用，乃至唐朝與該地帶的淵源。以下將就內亞史與農牧混合地帶的角度，整理有關的基本事實及背景知識。

(一)、內亞史的時代劃分

在歐亞大陸，除北極的苔原太嚴寒而無法滋養文明外，輝煌的文明大多集中在大陸邊緣，故塞諾以「中央歐亞」來泛指大陸中央遊牧民、狩獵人民與綠洲民的文化圈。由於歷史上的遊牧民往往比另外兩種人群擁有更複雜的社會政治組織，他們經常得以征服另外兩者，並入侵「文明」地區，導致中央歐亞史的討論，幾乎都以遊牧民歷史為主。⁶⁶又因為亞洲的遊牧民經常組成強大的政權，衝擊大陸邊緣的文明，因此「中央歐亞」有時被置換為更簡潔的「內亞」。⁶⁷戰後，日本歷史學界也碰到類似的問題——「北亞」作為一個相對於「東亞」的歷史世界，其所指幾乎都是中國北方的遊牧民，⁶⁸以致村上正二和吉田順一質疑金朝和清朝能否算入征服王朝。⁶⁹有鑑於本文主題，僅在於突顯後突厥與 10 世紀以降歐亞草原變革的連結，有關其變革的性質，謹留給學界進一步的研究。為方便討論，本文論及「中央歐亞」、「內亞」、「北亞」時，大都是指歐亞

⁶⁶丹尼斯·塞諾(Denis Sinor)著，羅新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頁 1-24。

⁶⁷丹尼斯·塞諾(Denis Sinor)著，羅新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譯序〉，頁 1-2；Denis Sinor edit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p.2.

⁶⁸田村実造，《アツア史を考える—アツア史を構成する四つの歴史世界》，頁 3-6。

⁶⁹村上正二著，鄭欽仁譯，〈征服王朝〉，頁 125-130；吉田順一著，鄭欽仁譯，〈北亞的歷史發展與魏復古的征服王朝理論〉，收入鄭欽仁、李明仁編《征服王朝論文集》(台北：2010 二版)，頁 180-182。

草原上的遊牧民。

漢文中的「遊牧」或「游牧」，翻譯自清代 18 世紀前半的滿文中「遷徙更換牧地」的動詞。⁷⁰遊牧，或說專化遊牧(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是指在特定環境中，利用草食動物的食性和移用力，以轉化有限的、人類無法直接使用的資源，藉此滿足生活所需的經濟模式。⁷¹其特徵可納歸為：一、畜牧是主要的經濟活動；二、沒有畜舍，全年移動放牧；三、為了畜牧經濟的需要，季節性往返不同的牧地；四、大部份人口都參與遷徙放牧的活動，不是單單交給專業人士；五、經濟生產以滿足生存所需為導向。⁷²簡單來說，遊牧是畜牧的一種，但畜牧不能直接等同遊牧。⁷³

接著，有關遊牧民歷史的展開，不得不提到遊牧起源的課題。遊牧的起源有所謂農耕說與狩獵說，以中國北方而言，強調農牧說的學者會以內蒙古的半農半牧社會作為例子，強調狩獵說的學者會以滿洲的森林狩獵人群為例。⁷⁴西南亞的遊牧起源，學界基本採信農耕說，中亞遊牧民雖然很可能源自西伯利亞森林的狩獵民，但他們基本上是偷取其他遊牧民的牧畜來掌握遊牧，而不是在森林深處馴化草食動物，並將之帶離森林。⁷⁵遊牧的生活方式到底源自傳播還是演化，當中有太多的難題尚待考古學、人類學和語言學家去解決。

在專化遊牧業中，馬匹擁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騎馬有利於控制畜群、狩獵和戰鬥。歐亞草原最早的騎兵，是公元前 1000 年的米底人和波斯人，有學者以此作為騎馬遊牧民族誕生的時代。⁷⁶所謂「騎馬民族」，是指那些熟習騎馬戰術，熱衷於集團化掠奪戰爭的民族，最早的騎馬民族都是遊牧民，而森林邊緣

⁷⁰ 山田信夫，《北アヅア遊牧民族史研究》，頁 253。

⁷¹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台北：中央研究院，2009 初版)，頁 109。

⁷² Anatoly M. Khazanov translated by Julia Crookenden,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pp.16.

⁷³ 今西錦司，《遊牧論そのほか》(東京：平凡社，1995 初版)，頁 48。

⁷⁴ 今西錦司，《遊牧論そのほか》，頁 56-58。

⁷⁵ Elizabeth E. Bacon, "Types of Pastoral Nomadism in Central and Southwest Asia",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0:1, 1954, pp.47-51.

⁷⁶ 江上波夫著，張承志譯，《騎馬民族國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 初版)，頁 9；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頁 84。

的狩獵民、草原邊際的半農半牧居民，則是受他們的啟發才成為騎馬民族。⁷⁷斯基泰人作為典型的騎馬遊牧民，把一種尚武、騎馬、遊牧的文化轉播到西伯利亞乃至蒙古。⁷⁸公元前 1500 至 300 年，由於氣候乾旱，晉北內蒙的半農牧人群逐漸走向移動化和武裝化，最終成為騎馬遊牧民，也就是戰國晚年的匈奴。⁷⁹

漢朝東北、北方和西北的外族擁有不同的社會政治組織，遼西的烏桓、鮮卑是部落聯盟，蒙古的匈奴是遊牧國家，青海河湟的羌人只有暫時性的軍事同盟，塔里木盆地的綠洲國家各自為政，全憑匈奴或漢朝宰制。⁸⁰這樣的格局，基本延續到魏晉南北朝乃至隋唐。⁸¹為方便討論，本文所謂內亞史的時代劃分，主要以蒙古、遼西的歷史為中心。

經歷匈奴、鮮卑、柔然的更替後，蒙古高原在 6 世紀至 8 世紀初進入突厥人的時代。其中，東突厥在貞觀四年滅亡，經歷半世紀的唐羈縻統治後「復國」，也就是所謂的後突厥。護雅夫用〈毗伽可汗碑〉、〈闕特勤碑〉重現了突厥的政治結構。突厥正統可汗，由阿史那一門的出身者獨佔，阿史那氏做為突厥的可汗氏族，如同纛鞬氏之於匈奴，藥羅葛氏之於回紇，「黃金氏族」之於成吉思汗時代的蒙古。簡單來說，突厥汗國擁有阿史那氏族「家產」、「共同財產」的特性，可稱之為阿史那氏的「家產國家」。阿史那加上姻親氏族阿史德，還有若干突厥部落，組成突厥汗國的貴族氏族群、中核氏族群，或所謂的 il，以上集團征服其他遊牧集團，使之成為平民氏族群，共同形成遊牧國家。這些被征服者維持著固有的共同體，其族長被授予官號，受設的節制，或被吐屯監視，設和吐屯都必需由阿史那出身者擔任。⁸²

⁷⁷江上波夫著，張承志譯，《騎馬民族國家》，頁 3-11。

⁷⁸ 江上波夫著，張承志譯，《騎馬民族國家》，頁 14-22；山田信夫，《北アヅア遊牧民族史研究》，頁 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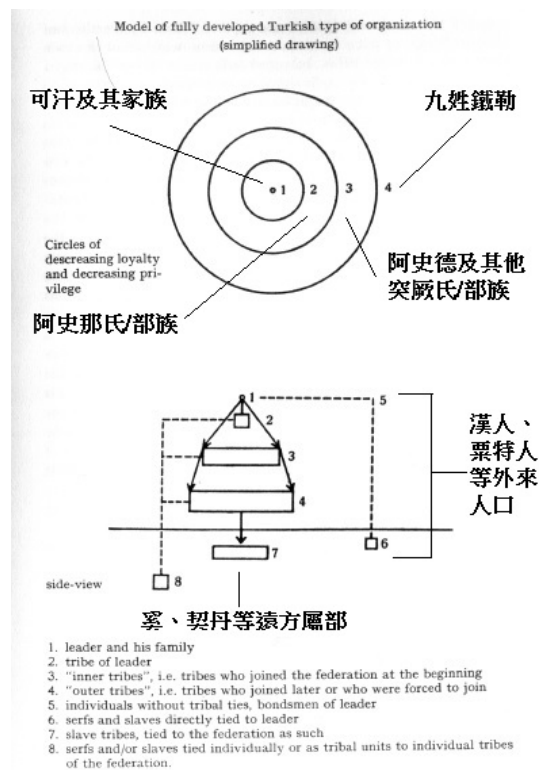
⁷⁹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頁 81-95，108-111。

⁸⁰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頁 36-35，69-80，100-109；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頁 153-166，188-203，221-228。

⁸¹ Wolfram Eberhard,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pp.116-118.

⁸²護雅夫把 il 譯做遊牧國家，把統一北亞全境的政權稱為遊牧帝國，後者對應於其他學者所說的遊牧國家。為方便討論，正文中並未照搬護雅夫的用語。護雅夫，〈突厥の国家構造〉，頁 3-

如果用三層的同心圓來表述，可汗及其家族是為圓心，其部落為最內圈，其他核心部落為第二圈，較晚加入、被迫加入的部落為第三圈。如果把同心圓垂直成金字塔，塔頂可以分出可汗的私臣，由他們指揮可汗的奴隸，這些奴隸直屬於可汗而不屬於任何部落。還有一種奴隸，隸屬於各個部落。最後，有所謂奴隸部落，為於金字塔的最底層，身份比同心圓第三層的部落還要低。⁸³



圖一、突厥汗國的政治結構

修改自 Wolfram Eberhard,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pp.117.

用具體的例子來說明，以上最內圈是可汗及其家族，第二圈是突厥阿史那部，第三圈是阿史德部等核心部落，第四圈是同樣說突厥語的鐵勒諸部，奴隸

49；護雅夫，《遊牧騎馬民族国家》，頁 185-187。

⁸³ Wolfram Eberhard,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pp.116-118.

部落當指靺、奚、契丹等遠方屬部。同時，漢人、粟特人等外來人口直屬於可汗，作為農民、工匠、商人補充游牧經濟的不足，一部份的粟特人武裝起來作為突厥汗國的戰鬥力。

公元 8 世紀初，後突厥滅亡，後繼的回紇汗國從 8 世紀延續到 9 世紀。回紇汗國瓦解，回紇人往東、南、西方遷徙，而其遺產卻啟發了往後的遊牧民，蘊釀出 10 至 13 世紀草原政治、社會的一大變革。10 世紀，歐亞草原發生重大的變化。在草原東部，9 世紀回紇滅亡使契丹部落聯盟脫離游牧國家的掌握，同時又接受回紇的都城文化，進一步產生可汗專制的新政體。接著，成吉思汗在 13 世紀初統一蒙古，創造出另外一個可汗專制的政體。有關上述歷史轉折，大概可以歸成三套學說。

第一，是所謂征服王朝的成立。「征服王朝」的說法源自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他把秦、漢、隋、唐、宋、明分類為典型中國朝代，把五胡十六國分類為滲透王朝，把遼、金、元、清分類為征服王朝。征服王朝在經濟和政治上實行二元統治，同時由於文化涵化而產生出第三種新文化，但新文化本身並不取代原有的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⁸⁴田村實造修正魏復古的說法，指出滲透王朝與征服王朝同採取二元體制，兩者差別僅在於取得權力的方式不同，因此相對於征服王朝的不應該是滲透王朝，而是游牧國家。⁸⁵他把前燕視為征服王朝的祖型，將北魏與遼、金、元並列為征服王朝。⁸⁶田村氏的研究並不止於修正魏復古，他以修正過的理論來解釋北亞從古代邁向中世的過程。⁸⁷遼朝以人為方式改組部落，以耶律氏、述律氏為中心建立四大帳族，在長城外建立斡魯朵，長城內建立頭下州，後繼的金朝建立了猛安·謀克，成吉思汗時期的蒙古以千戶制取代了原有的部落，清朝也以人為建成的八旗作為核心的武裝。以上不同王朝

⁸⁴ Karl A. Wittfogel 著，蘇國良、江志宏譯，〈中國遼代社會史(907-1125 年)總述〉，頁 9-51。

⁸⁵ 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總括〉，頁 625-629。

⁸⁶ 田村實造，〈中國史上的民族移動期〉，頁 122。

⁸⁷ 田村實造，〈北亞に於ける歴史世界の形成と展開〉，頁 55-56；田村實造，〈アヅア史を考へる—アヅア史を構成する四つの歴史世界〉，頁 74-75。

的制度，可概括為解散舊部落，確立北亞君主專制，代表北亞中世的展開。⁸⁸

第二，是有關遊牧封建制的成立。事實上，遊牧封建制並不需要等到蒙古滅金之際的投下州，成吉思汗時代的蒙古便存在著遊牧封建制。把遊牧社會分成幾個階段，公元前 7 世紀南俄草原出現遊牧的生計方式，並在歐亞大陸擴散，公元 6 世紀出現了歐亞草原三大國，也就是東突厥、西突厥與可薩汗國，可薩汗國最先出現城市，7 世紀的後突厥汗國創造了突厥文，7 至 9 世紀的回紇建立具有商業與宗教性格的都城，引入作為體系化宗教的摩尼教，完成了遊牧社會的「文明化」。接下來的階段，是成吉思汗時代舊部落解體，人為建立新的軍政單位，作為子弟與功臣的封地，是為遊牧封建制、北亞中世時代的展開。⁸⁹

第三，是中央歐亞型國家的成立。這套說法以森安孝夫為代表，認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是一種歐洲中心史觀。他把世界史分為八個時期，以公元前 1000 年騎馬遊牧民的出現為第四個時期，以 1000 年至 1500 年的中央歐亞型國家優勢時代為第五個時期。在這論述中，遼的建立不再是中國和北亞史上的獨立事件，而是被放入 10 世紀以來，遼朝、沙陀諸王朝、甘州回紇、西州回紇、喀拉汗國、塞爾柱王朝等中央歐亞型國家大量湧現的脈絡中去討論。遊牧民與定居民長時間經過戰爭、協調、融和，漸漸累積統治技術，如城池的修築、絲路商業與遊牧騎馬軍團的結合，加上文字的發明使文書作業成為可能，促成 10 世紀以後大量中央歐亞型國家的誕生。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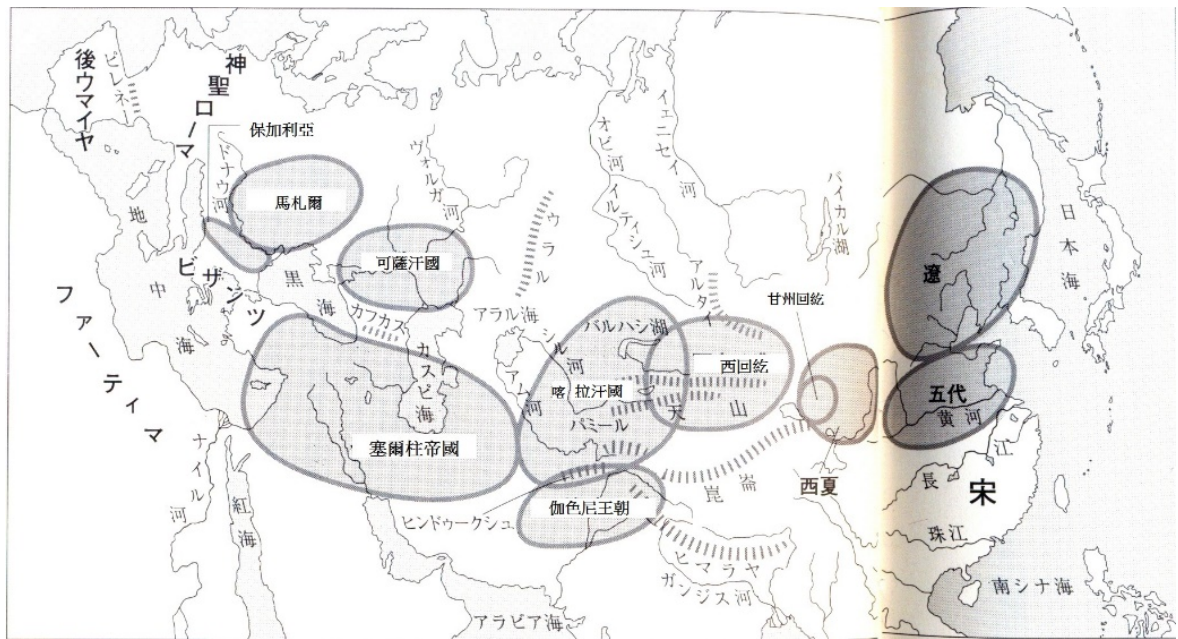
綜合而言，10 至 13 世紀歐亞草原東部的變革可歸納為：一、文字的發明；二、體系化宗教的引入；三、具備商業與宗教性格的城市；四、透過政治力解散原生部落，整編成人為的軍政單位。以上第一、二、三點也稱為遊牧國家的「文明化」。以上過程完成於回紇，卻能追溯到後突厥，甚至東突厥。總而言之，6 至 9 世紀的突厥、回紇遊牧國家存在著一種延續性，既有別於公元前 3

⁸⁸田村実造，〈北亜に於ける歴史世界の形成と展開〉，頁 44-56；村上正二著，鄭欽仁譯，〈征服王朝〉，頁 129-134。

⁸⁹山田信夫，〈北アツア遊牧民族史研究〉，頁 230-250。

⁹⁰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頁 84-86，307-310。

世紀至公元 6 世紀匈奴、鮮卑、柔然，也啟發了 10 到 13 世紀的新型政體。因此，不妨把前 3 世紀到 6 世紀、6 世紀到 9 世紀視為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並把兩個時期的遊牧國家視為不同類型的遊牧國家。⁹¹如此一來，更有利於做長時段的觀察，而不是斷裂式地看待 10 世紀以來的征服王朝、遊牧封建制或中央歐亞型國家。



圖二、公元 10 世紀的中央歐亞型國家/征服王朝

修改自：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東京：講談社，2007 初版)，頁 308-309。

(二)、農牧混合地帶與中國史

在北亞草原與耕農中國之間，存在一個狹長的過渡地帶，不同的學者給予

⁹¹ 村上正二著，鄭欽仁譯，〈征服王朝〉，頁 109-123。

這地個地帶不同的稱呼，包括：一、環狀地帶，意指從現今遼寧經過北京，沿長城經過山西北部，到達鄂爾多斯的一線⁹²；二、農業—遊牧境域線，指涉大約北緯 40 度，耕地與牧場並存，並貫通歐亞大陸的地帶⁹³；三、農牧接壤地帶，指涉從河北、山西北部「燕雲十六州」到寧夏、甘肅六盤山、賀蘭山、祁連山，農業與遊牧交雜的地帶⁹⁴；四、李鴻賓稱之為長城區域，泛指長城沿線的州縣。⁹⁵本文將這地區稱為農牧混合地帶，以顯示其半農半牧的過渡性質。

有關農牧混合地帶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拉鐵摩爾對中國邊疆進行的區域研究。拉鐵摩爾曾分析過這一個過渡地帶，當地從南到北由農漸牧，從北到南由牧漸農。但同時，當地又很強烈的地方性格，並不因牧農生計的分別而分化成不同集團。當草原遊牧國家或農耕中國強大時，當地勢力往往選擇倒向其中一方。另一方面，這個半農半牧的邊疆又作為遊牧民南侵的「貯存地」，為「下一次的歷史變動(北方民族南侵)」儲存能量。此處是既是中原政治與文化能夠所及的最北端，同時又是遊牧民南侵的始發線，為了自身的安全考量，中國必需有效控制這樣的一個區域。另一方面，遊牧民如入主這個地區，便會建立起一個混合社會，其統治者必需維持遊牧與定居、機動與財富間的平衡，否則將導致混合社會的崩潰。⁹⁶

如果將重點放在農牧混合地帶的地域性，可歸納出漢迄唐，這個地帶的幾個重要特徵：一、將來自蒙古的民族移入未能完全控制的北方地域，防禦更北邊的民族；二、藉由賚賜、互市、蕃將的俸給，中國的財貨經過當地向北方輸送；三、當地的勢力為中國提供兵力，負起邊防的任務，但同時潛在著叛亂的危險性。⁹⁷

⁹²石見清裕，〈ラティモアの辺境論と漢～唐間の中国北辺〉，頁 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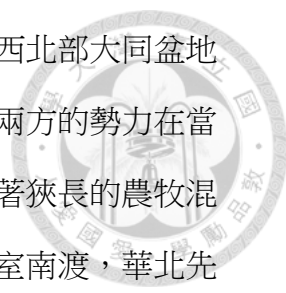
⁹³妹尾達彦，〈長安の都市計画〉，頁 41-45；妹尾達彦，〈中華の分裂と再生〉，頁 8-12。

⁹⁴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頁 59-62。

⁹⁵李鴻賓，〈長城區域在唐史研究中的位置——從歷史學與民族學結合的角度觀察〉，頁 103-104。

⁹⁶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頁 169-172，328-352；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pp30-53.

⁹⁷石見清裕，〈ラティモアの辺境論と漢～唐間の中国北辺〉，頁 283-296。



歷史上，從現今內蒙古中部呼和浩特平原，往南延伸到山西北部大同盆地的過渡地帶，一直都是遊牧國家與農耕中國互相爭奪的區域，兩方的勢力在當地的彼此消長。漢宣帝一度在此安置匈奴呼韓耶單于，東漢沿著狹長的農牧混合地帶安置南匈奴、烏桓、鮮卑，以抵擋更北邊的北匈奴。晉室南渡，華北先後出現五胡十六國，最後由拓跋鮮卑以大同盆地為中心，四出征戰統一華北。大同盆地桑乾河流域擁有豐富的水源而成為宜農宜牧的地區，西接鄂爾多斯高原，南接山西太原，東方穿過太行山進入河北，北方越過白道進入漠北。拓跋部率領遊牧民佔領呼和浩特平原到大同盆地的整個地區，並往東、南、西、北四方征戰，是為遊牧勢力在當地擴張的高峰。⁹⁸北魏道武帝、明元帝與太武帝北征高車，將掠奪來的人口和牧畜置於平城北方鹿苑，並在鹿苑分配戰利品。群臣除分得牧畜，同時也獲得田宅，計口授田。由此可見，北魏初年農牧並行，而農業在往後愈加重要的狀況。然而，由於大規模農、牧業造成環境破壞，北魏初年的體制漸難以運行，是為往後孝文帝遷都的背景之一。⁹⁹同時，六鎮與洛陽朝廷漸生嫌隙，最終爆發叛亂。六鎮最初源自北魏為了防禦柔然入侵，而徙往陰山北麓的良民，則出自鮮卑遊牧集團。六鎮的人們漸漸成為新的精英，不僅推翻了北魏，也間接促成了隋唐的建立。¹⁰⁰

隋文帝以武力迫使東突厥臣服，此後除都藍可汗叛亂北歸以外，東突厥都接受隋的安置，建牙於陰山以南定襄。隋末唐初，東突厥一躍成為強權，卻沒有像北魏一樣控制整個農牧混合地帶。大致上，以阿史那氏為核心的集團分佈在呼和浩特平原，也就是隋朝定襄郡，一部份延伸到河套以北，與鄂爾多斯隔黃河相望。在遼西，奚和契丹作為被征服部落，被納入東突厥汗國。但在農牧混合的南部，東突厥得用間接的方式，扶植群雄來控制交通線並取得當地的穀

⁹⁸ 前田正名著，李凭、孫耀、孫蕾譯，《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頁 2-14，109-110，121-125。

⁹⁹ 佐川英治，〈遊牧と農耕の間——北魏平城鹿苑の機能とその変遷〉，《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 47 号，文学部教員研究活動一覽，(2007，岡山)，頁 49-76。

¹⁰⁰ スコット・ピアース(Pearce Scott)著，早大北朝史研究会譯，〈代の地——内陸アツア境界地域社会の起源発展および歴史的意義〉，頁 22-46。

物。¹⁰¹另一方面，李淵祖先源自六鎮中的武川，為現今呼和浩特以北，土城梁或二份子遺址一帶。¹⁰²李淵進入關中的同時，聯合鄂爾多斯的匈奴系費也頭，消滅河西薛舉。¹⁰³

東突厥滅亡後，唐朝設置羈縻州安置突厥部落。關於太宗時期突厥羈縻州的位置分佈，學界眾說紛云而未有定論。但就高宗時期的單于大都護府來看，突厥部落應該被安置在黃河以北、陰山以南，現今內蒙古中部一帶，屬於農牧混合地帶的北半部。由此來看，高宗時期突厥羈縻州的位置，應該與 6 世紀東突厥部落的位置相差不遠。調露元年，突厥人推翻單于大都護府，建立後突厥汗國。在唐朝與後突厥對抗的過程中，朔方軍成立，唐朝透過修築三受降城而牢固控制著陰山以南。後突厥滅亡後，部份鐵勒部落降唐，被編入朔方軍。唐末，從朔方軍分出的振武軍落入沙陀李克用手中，成為舉足輕重的勢力並介入內地政治。


以上，就是農牧混合地帶在中國中世的狀況。草原遊牧國家與農耕中國反覆佔領這個區域，但對整個區域的控制力並不是均等的，而當地的集團也有其地方性格，在朝廷力量削弱的時期，尾大不掉，不受節制。整體而言，農牧混合地帶的概念修正了南北抗爭論的不足，但以上兩說把中國和蒙古的遊牧國家視為兩個內部同質的存在，忽略了兩者之間存在一個擁有地方性格的區域，藉由南北兩強的對抗催生出一波又一波的地方集團。這些集團不僅抵禦北方邊牧國家，一有機會更會擁兵自重，甚至反叛朝廷、入主中原。

在擺脫南北對抗論的同時，研究者轉向了「中央歐亞」的概念。然而，使用這個概念必需先處理歐洲中心的史觀。妹尾達彥把歐亞歷史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為公元 3 世紀以前，古典文化形成期；第二期為公元 3、4 世紀至 15、16 世紀，遊牧民優勢時期；第三期為 16、17 世紀以降，歐羅巴優勢時期。其中，

¹⁰¹林俊雄，〈掠奪・農耕・交易から見た遊牧國家の發展：突厥の場合〉，頁 116。

¹⁰²石見清裕，〈唐の成立と内陸アツア〉，頁 4-7。

¹⁰³石見清裕，〈唐の建國と匈奴の費也頭〉，頁 48-52。



第一期的大都會、重要文明都誕生於北緯 30 度至 40 度的農業—遊牧境域線，得利於物產、文化、情報的匯聚與交換。¹⁰⁴在這論述下，從東漢末年到唐朝的建立的歷史，被解釋為公元 3 至 5 世紀遊牧民入侵，古典文化的衰敗，同時由於遊牧民帶來衣食住、習俗、信仰的改變，促成 6 至 8 世紀新文化的形成。¹⁰⁵森安孝夫認為，約 3000 年前歐亞大陸出現遊牧的生活方式，經過漫長的累積，遊牧民在約 1000 年前進入中型歐亞型國家優勢時代。約 10 世紀，遊牧民累積軍事支配、稅制、商業、文字、文書作業等技術，習得同時統治遊牧、定居兩個世界的方法，在中央歐亞的農牧接壤地帶建立起中央歐亞型國家。¹⁰⁶如果用一實例說明，則可見 8 至 11 世紀，農牧混合地帶先後孕育出五代王沙陀王朝和契丹，前者入主中原，後者與確立了未來千年異族王朝的二元體制。同時，契丹與宋朝簽定澶淵之盟，開啟了一種既非納貢也非羈縻的國與國關係。¹⁰⁷總而言之，農牧混合地帶一直牽動著草原遊牧和農耕中國兩個世界的歷史，因此被比喻為遊牧民入侵的「儲貯地」。

¹⁰⁴妹尾達彥，《長安の都市計画》，頁 30-34。

¹⁰⁵妹尾達彥，《中華の分裂と再生》，16-18，72-79。

¹⁰⁶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84-86，305-310。

¹⁰⁷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社，1984 初版），頁 15-58；張廣達，〈從「安史之亂」到「澶淵之盟」：唐宋之際的中原和北方〉，頁 1-20。

第三章、從唐朝羈縻統治到後突厥建國



貞觀四年，東突厥汗國滅亡，突厥遺民被置於唐朝的羈縻統治之下，調露元年阿史德溫傅、阿史德奉職發起叛亂，永淳元年(682)年阿史那骨咄祿從陰山入寇單于大都護府。在唐朝半個世紀的羈縻統治中，阿史德氏逐漸累積實力，不僅主導了調露元年突厥人反抗唐朝統治，在後突厥汗國，阿史德族人比東突厥時期更積極參與政治和軍事的決策。以下論及突厥人對唐羈縻統治的反抗時，將從唐朝羈縻體制、阿史德氏的崛起、三十姓突厥的組成三方面進行討論。

(一)、唐朝羈縻體制

在討論突厥人對唐羈縻統治的反抗之前，必先討論羈縻體制的具體內容。以下將從羈縻府州的統治原理、成立與管理措施三方面進行討論。

1.羈縻府州的統治原理

從貞觀四年到調露元年，唐的羈縻統治可從兩個層次理解，一是基層的羈縻府州，二是在羈縻府州所隸屬的都護府。學者們採用兩種取徑來討論唐朝對羈縻府州的統治原理，一是從內部研究不同時期、地點的羈縻府州，歸納出羈縻統治的特式，二是採用政治思想史的視角，從外部、東亞世界的框架，討論羈縻府州的統治原理。

有唐一代設置羈縻府州，最早應該是武德元年(618)靺鞨歸附所置的夔州，而羈縻府州可能基於以下各種原因而設置：一、朝廷直接下令設置；二、朝廷

派出使節出訪設置；三、軍事征討中設置；四、邊州都督府開置；五、少數民族酋帥自行開置。羈縻府州的都督、刺史由原本的酋帥出任並且世襲，他們被授以印契、告身、笏版，以玄魚為符信。如果部落位置要衝，或唐朝銳意控制的地區，會特別受朝廷重視，所授的勳官品位也較高。羈縻府州採取漢蕃二重官制，由朝廷派華官參治。羈縻府州的首長受唐朝冊封，並有納質、納貢的義務，「版籍不上戶部」，¹⁰⁸同時受其上的都護府節制。¹⁰⁹

在部份地區，唐朝在羈縻府、州上設羈縻都護府，在其下設羈縻縣。同樣地，府、州、縣的建置取決於部落大小，酋帥之官品取決於部落大小及自身蕃望。羈縻府州長官為唐朝官員，領唐朝俸祿，於透過唐朝冊封保障其世襲統治。唐朝有權廢立其長官，派遣漢官參治，配合對酋帥的禮遇來干預、招撫羈縻府州，羈縻府州亦必需對唐朝負起奉唐正朔、繳納賦稅、入貢、入質等諸多義務。¹¹⁰然而，羈縻府州內長官世襲、版籍不上戶部，其納貢也不定時。一種羈縻府州僑置在正州之下，顯然屬於唐朝領土，另一種設立於他族原居地，叛服無常。¹¹¹

從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羈縻」概念的起源一部份源自周代的中華思想，另一部份從《史記》、《漢書》、《漢官儀》中獲得「羈縻」的語源。唐朝的羈縻政策，委以部落酋長都督、刺史的官職，實行世襲統治——當然，世襲的後繼者仍需獲得唐朝冊封。羈縻府州有朝貢的義務，相關事務由鴻臚寺下屬的典客署負責。¹¹²

從「天下秩序」的角度，羈縻府州是魏晉南北朝「外臣內臣化」¹¹³的延

¹⁰⁸歐陽修，《新唐書》，卷 43，〈地理志〉，頁 1119。

¹⁰⁹ 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 初版），頁 8-62。

¹¹⁰ 馬馳，〈試論唐代蕃州的管理體制〉，收入中國唐代學會編輯委員會編《第三屆中國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唐代學會，1997 年），頁 1-32。

¹¹¹ 譚其驤〈唐代羈縻州論論〉，收入《紀念顧頡剛學術論集》，（下冊），（成都：巴蜀書店，1990 初版），頁 555-569。

¹¹² 岡田宏二〈中国王朝の羈縻政策が概観〉，收氏著《中国華南民族社会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3 初版），頁 4-18。

¹¹³ 谷川道雄，〈東アヅア世界形成期の史的構造〉，收入唐代史研究會編《隋唐帝国と東アヅア世界》（東京：汲古書院，1979 初版），頁 102。

續。羈縻府州處於外臣一層最靠近內臣的一側，版籍多不上戶部，長官世襲，其制度著於令式，另一方面其版籍歸兵部管轄，同樣承擔貢賦，其君長接受天子冊封，接受君長人身統治。¹¹⁴公元 7 至 8 世紀中國在軍事、政治、文化上影響周邊各族群，羈縻體制下的君臣關係代表著周邊地區的領域化(內地化)。¹¹⁵

2. 羈縻府州體制的成立

本文論及的羈縻府州體制，實際上是指都護府和羈縻府州兩個部份。從時間上看，羈縻府州的成立早於都護府，以下將從羈縻州府開始討論，又因為本文討論陰山南麓的農牧混合地帶為主，因此以下內容將以當地的都護府及羈縻府州為主。

唐代羈縻州的設置可追溯到高祖武德元年，靺鞨歸附後設置的夔州，但要到貞觀時期，羈縻州大量成立，才使之成為正式的名目。¹¹⁶貞觀年間，對突厥降戶先後進行了兩次安置。第一次為東突厥滅亡後，但隨著貞觀十三年九成宮事件的爆發，加上薛延陀的崛興，太宗立阿史那思摩為傀儡可汗，使之遷往河北，結束了第一次的安置。然而，思摩不堪薛延陀壓迫，貞觀十七年(643)再次內遷。貞觀二十一年(647)薛延陀滅亡，唐朝重新在漠南設立羈縻州，是為貞觀年間對突厥降戶的第二次安置。有關唐朝第一次安置突厥遺民的措施，可參考《資治通鑑》的記載：

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眾。¹¹⁷

¹¹⁴高明士，《東亞古代的政治與教育》(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初版)，17-64。

¹¹⁵ 栗原益男，〈七、八世紀の東アツア世界〉，頁 141，152-153。

¹¹⁶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 初版)，頁 8-17；譚其驥〈唐代羈縻州述論〉，頁 555。

¹¹⁷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卷 193，唐貞觀四年條，頁 6077。



以上史料包括了兩個關鍵概念，一是「分突利故所統之地」設置的順、祐、化、長四州，二是「分頡利之地為六州」的「六州」。關於以上六州及四州的設置時間、分佈地點，存在頗大的分歧，石見清裕稱之為「六州問題」，而從六州問題，又引申出定襄、雲中兩都督府設置時間的問題。¹¹⁸在進一步介紹六州問題前，必需先介紹傳統文獻中的各種史料，首先是《資治通鑑》貞觀四年的記載：

五月辛未，以突利為順州都督，使帥其部落之官。¹¹⁹

(五月)壬申……頡利之亡也，諸部落酋長皆棄頡利來降。獨思摩隨之，竟與頡利俱擒。上嘉其志，拜右武侯大將軍，尋以北開州都督，使統頡利舊眾。¹²⁰

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為北寧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為北撫州都督。¹²¹

(六月)壬寅，以右饒衛將軍康蘇(密)為北安州都督。¹²²

《新唐書·地理志》，有關突厥羈縻府州的記載：

貞觀四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於幽、靈之

¹¹⁸石見清裕，〈唐の突厥遺民に対する措置〉，收入氏著《唐の北方問題と国勢秩序》(東京：1998 初版)，頁 110-119。

¹¹⁹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93，唐貞觀四年五月辛未條，頁 6077。

¹²⁰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93，唐貞觀四年五月壬申條，頁 6077。

¹²¹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93，唐貞觀四年丁酉條，頁 6079。

¹²²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93，唐貞觀四年壬寅條，頁 6079。

境。又置北開、北寧、北撫、北安等四州都督府。六年，順州僑治營州南之五戍。¹²³



《唐會要》記載了貞觀四年分頡利之地為六州的說法：

貞觀四年三月三日，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加置雲中都督，以降降虜。¹²⁴

除此之外，《舊唐書·突厥傳》同樣提到分頡利之地為六州：

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眾。

¹²⁵

最後，《舊唐書·地理志》記載了定襄都督府的位置：

隋朔方郡。貞觀二年，討平梁師都，改為夏州都督府，領夏、綏、銀三州。其夏州，領德靜、巖綠、寧朔、長澤四縣……定襄都督府 寄治寧朔縣縣界，管小州四：阿德州、執失州、蘇農州、拔延州。¹²⁶

簡單來說，史料分別提到北開、北寧、北撫、北安四州、順、祐、化、長四州，以及定襄、雲中兩都督府治下，名字不詳的六州。其中，北開、北寧、北撫、北安四州在大約貞觀七、八間易名為順、祐、化、長四州，此為大部份學者的共識。

¹²³ 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43，〈地理志〉，頁 1125。

¹²⁴ 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90 北京第 3 刷)，卷 73，安北都護府條，頁 1311。

¹²⁵ 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194，〈突厥傳〉，頁 5163。

¹²⁶ 劉昫，《舊唐書》，卷 38，〈地理志〉頁 1413-1415。

岩佐精一郎認為，貞觀四年設置的是順、北開、北寧、北撫、北安五州，北開州在貞觀八年(634)易名化州，另一州在貞觀七年(633)易名長州。據岩佐氏推論，祐、化、長都是後來所取的州名。¹²⁷石見清裕也同意北開、北寧、北撫、北安四州與順、祐、化、長四州為先後繼承關係，北開、北寧、北撫、北安為貞觀四年安置突厥遺民的臨時措施，直到貞觀七、八年，正式在黃河以南設順、祐、化、長四州。¹²⁸樊文禮認為北撫州即後來的順州，北安州即後來的祐州，另外兩州雖然無法證明，但很可能同為前後繼承的關係。¹²⁹艾沖認為北開、北寧、北撫、北安四州在貞觀八年改名為順、祐、化、長四州。¹³⁰

章群和艾沖都不同意以上說法。章群認為順、祐、化、長只有順州為突利部屬。貞觀四年所置的六州，應該是祐、化、長、北寧、北撫、北安六州，其中化州即北開州。換言之，北開、北寧、北撫、北安四州與順、祐、化、長四州並非前後繼承，而是同時並存。¹³¹艾沖認為，貞觀初年的突厥羈縻府州實際上只有北開、北寧、北撫、北安四州，加上定襄、雲中兩都督府，其中四州在貞觀八年改名為順、祐、化、長四州。¹³²然而，章群與艾沖都為了解釋名字佚失的六州，而忽略了貞觀七、八年間州名改易的事實。

至於順、祐、化、長四州的位置，岩佐精一郎和吳玉貴都質疑《新唐書·地理志》的記載。岩佐氏認為，《新唐書·地理志》混淆了僑置營州的順州順義郡與順、祐、化、長的順州，後者應該是僑置代州。¹³³吳玉貴認為順、祐、化、長四州的設置，早於北開、北寧、北安、北撫四州，後者設置後，八州同時並存。他認為，史書把「豳州」誤寫為「幽州」，實際上順、祐、化、長四州

¹²⁷岩佐精一郎，〈突厥の復興に就いて〉，80-82。

¹²⁸石見清裕，〈唐の突厥遺民に対する措置〉，頁119-122。

¹²⁹樊文禮，〈唐貞觀四年設置突厥羈縻府州考述〉，《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4年3期，(1994，北京)，頁89-91。

¹³⁰艾沖，〈唐前期東突厥羈縻都督府的置廢與因革〉，《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8:2)，(2003，西安)，頁136-139。

¹³¹章群，〈唐代降胡安置考〉，《新亞學報》，1:1，(1955，香港)，頁263-268。

¹³²艾沖，〈唐前期東突厥羈縻都督府的置廢與因革〉，頁136，139。

¹³³岩佐精一郎，〈突厥の復興に就いて〉，82-83。

都不離河套地區。¹³⁴蘇北海則同意順、祐、化、長四州帶佈於東起幽州，西至靈州的狹長地帶。¹³⁵後來，劉統考定順州在唐代河北道；長州在今山西省靖邊縣西；北開州即後來化州，在今內蒙古烏審旗南，以此證實《新唐書》的記載可信。¹³⁶

關於定襄、雲中兩都督府的位置，章群、吳玉貴、蘇北海均取信《舊唐書·地理志》的記載，認為兩府僑置於夏州。¹³⁷然而，岩佐精一郎、劉統、石見清裕、樊文禮都主張兩府在今浩和呼特周邊。岩佐精一郎和石見清裕均指出，《舊唐書·地理志》所記為天寶十一年(752)的紀錄，無法反映貞觀初年的狀況。¹³⁸劉統考定襄都督府在漢定襄故城，雲中都督府在今呼和浩特市以南和林格爾縣。¹³⁹樊文禮也指出，兩府僑置夏州，是元年突厥復國，單于都護府淪陷之後的事。¹⁴⁰

此外，石見清裕對前述史料的解讀值得額外一提。他認為北開、北寧、北撫、北安四州是唐貞觀四年安置突厥降民的臨時措施，約貞觀七、八年正式決定了處理降戶的方案，把降戶遷入黃河以南，同時設定襄、雲中兩都督府，管理留在故地的突厥人。然而，這一體制最終因為貞觀十三年(639)遣突厥降戶北歸而告終。貞觀十七年(643)，思摩不敵薛延陀而南返，使得唐朝需要直接面對薛延陀。貞觀二十一年(647)薛延陀滅亡，鐵勒諸部降附，貞觀二十三年(649)突厥車鼻可汗的殘餘勢力被消滅，唐朝才重新在漠南設置定襄、雲中都督府，安置突厥降戶。¹⁴¹

¹³⁴ 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初版)，頁 244-246。

¹³⁵ 蘇北海，〈唐朝在回紇、東突厥地區設立的府州考〉，《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 年 1 期，(1987，烏魯木齊)，頁 52。

¹³⁶ 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頁 146。

¹³⁷ 章群，〈唐代降胡安置考〉，頁 263-268；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頁 253-256；蘇北海，〈唐朝在回紇、東突厥地區設立的府州考〉，頁 52。

¹³⁸ 岩佐精一郎，〈突厥の復興に就いて〉，頁 85-91；石見清裕，〈唐の突厥遺民に対する措置〉，頁 113-114。

¹³⁹ 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頁 145。

¹⁴⁰ 樊文禮，〈唐貞觀四年設置突厥羈縻府州考述〉，頁 91。

¹⁴¹ 石見清裕，〈唐の突厥遺民に対する措置〉，頁 110-115，123。

有關都護府的部份，唐朝最早設立的都護府是貞觀十四年的安西都護府，而第一個北方邊疆的都護府，則要到貞觀二十一年(647)，燕然都護府成立。有關燕然都護府，詳見以下兩則史料：



至(貞觀二十一年)四月十日，置燕然都護府，以揚州司馬李素立為都護，瀚海等六都督、阜蘭等七州並隸焉。¹⁴²

於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以導賓貢。¹⁴³

以上兩則史料的背景，是貞觀二十一年漠北鐵勒歸附，唐朝在漠北設立六府七州之際。其中，第一則史料來自《唐會要》安北都護府條，第二則來自《舊唐書·迴紇傳》，從後者可見，燕然都護府最初的職能是「以導賓貢」，有別於後來具有邊政，甚至監察功能的都護府。此外，燕然都護府的北遷及易名，也關係到單于大都護府的成立，以及南北兩都護府以漠為界的格局。¹⁴⁴有關大漠南北兩都護府的設置時間，可參考以下三則史料：

改燕然都護府為瀚海都護府，瀚海都護府為雲中都護府。¹⁴⁵

車鼻既破之後，突厥盡為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都護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瀚海都護領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¹⁴⁶

¹⁴²王溥，《唐會要》，卷 73，〈安北都護府條〉，頁 1314。

¹⁴³劉昫，《舊唐書》，卷 195，〈迴紇傳〉頁 5196。

¹⁴⁴艾沖，〈唐代安北都護府遷徙考論〉，《陝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報)》，(西安，2008)，頁 106。

¹⁴⁵劉昫，《舊唐書》，卷 4，〈高宗本紀〉，頁 84。

¹⁴⁶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66。

麟德初，改燕然為瀚海都護府，領回紇，徙故瀚海都護府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磧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¹⁴⁷



以上第一則史料出自《舊唐書·高宗本紀》，第二條出自同書〈突厥傳〉，第三條出自《新唐書·突厥傳》。從第一則所見，高宗龍朔三年(663)確定了北方瀚海、南方雲中兩都護府的格局，而第二則卻記載永徽元年(650)就有了北方瀚海、南方單于都護府的佈局。如果參考《資治通鑑》，永徽元年(650)的的記載也跟第二則史料基本相同。¹⁴⁸再來是第三則，參考同書〈地理志〉、〈突厥傳〉以及《資治通鑑》，則可知漠南的都護府在麟德以前為雲中都護府，麟德元年(664)高宗接受突厥阿史德氏請求，更名單于大都護府。¹⁴⁹由此可見，第三則的「麟德初」為誤記。然而，在另一方面，第三則還是帶出一項重要訊息，也就是「故瀚海都護府」存在的的可能性。總而言之，以上史料帶出兩個關鍵問題——漠南漠北兩府的格局始於永徽元年還是龍朔三年？南北兩府在不同時期各採用了什麼名字？

要解決上述問題，得進一步徵引更多的史料，如《唐會要》和《通典》。首先是唐會要的部份：

永徽元年九月八日，右驍衛中郎將高品執車鼻可汗，獻於武德殿。處其餘眾於鬱督軍山，分其地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就府、蘇農等十四州、瀚海領金微、新黎七都督府、仙萼、賀蘭等八州，各以首領為都督刺史。¹⁵⁰

¹⁴⁷歐陽修，《新唐書》，卷 215，〈突厥傳〉，頁 6042。

¹⁴⁸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卷 199，永徽元年九月庚子條，頁 6272。

¹⁴⁹歐陽修，《新唐書》，卷 37，〈地理志〉，頁 976；歐陽修，《新唐書》，卷 215，〈突厥傳〉，頁 6042；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01，麟德元年春正月甲子條，頁 6339。

¹⁵⁰王溥，《唐會要》，卷 73，單于都護府條，頁 1309。

(永徽元年)十月二十日，以新移葛邏祿在烏都鞬山者，左廂置狼山州、右廂部落置渾河州，並隸燕然都護府。至三年十一月四日，以阿特部落置稽落州，隸燕然都督府。¹⁵¹



龍朔三年二月十五日，移燕然都護府於迴紇部落，仍改名瀚海都護府。其舊瀚海都護府，移置雲中古城，改名雲中都護府，仍以磧為界。磧北諸蕃州，悉隸瀚海，磧南並隸雲中。¹⁵²

以上第一則史料引自《唐會要》單于都護府條，支持了前述兩唐書的記載，顯示永徽元年便已設下南方單于、北方瀚海兩都護府的佈局。第二、三則同引自《唐會要》安北都護府條。其中，第二則史料反駁了第一則史料，顯示燕然都護府的名號在永徽三年仍然存在。同時，第三則史料支持了這個論點，表明燕然都護府在龍朔三年才移往漠北，並改名瀚海都護府，而同年設於南方的都護府為雲中都護府，非單于大都護府。接著，再看《通典》的部份：

顯慶二年，遣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回紇婆閏等率師討擊，仍使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持節為安撫大使。¹⁵³

以上記錄的背景是唐朝與西突厥的戰爭，燕然都護任雅相率領蕃部討伐西突厥，由此可見燕然都護的官職到顯慶二年(657)仍然存在。

關於永徽元年「分置瀚海、單于兩都護府」的記載，學界基本上達成共識，認為文獻中「瀚海」及「單于」兩名是後來的名稱，即使永徽元年便存在

¹⁵¹王溥，《唐會要》，卷 73，安北都護府條，頁 1315。

¹⁵²王溥，《唐會要》，卷 73，安北都護府條，頁 1315。

¹⁵³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 199，頁 5459。

南北兩府，也不可能採用瀚海都護府、單于大都護府的稱呼。然而，問題並未因此解決。有關永徽元年是否有兩個實際存在的都護府，分掌漠南、漠北，學界大致分成三派說法。第一派認為南北兩府的佈局在永徽元年便已完成，代表學者有岑仲勉、譚其驤、樊文禮、李宗俊，他們對前引史料的解說，認為「故瀚海都護府」或「舊瀚海都護府」是指永徽元年至龍朔三年(663)的十三年間，漠南有一個瀚海都護府，平行於漠北的燕然都護府，而龍朔三年年燕然都護府改名為瀚海都護府，原來的瀚海都護府改名為雲中都護府，雲中都護府也就是麟德以後的單于大都護府。¹⁵⁴

另一派認為唐朝到龍朔三年才落實南北平行設置都護府的政策，代表學者有岩佐精一郎及艾沖。其中，艾沖對這部份的論述比較簡略，而岩佐精一郎的論述較為詳細，富有參考價值。岩佐氏認為，龍朔三年改燕然都護府為瀚海都護府並遷之於漠北，史料都的「故瀚海都護府」實際上是指燕然都護府故地，在燕然都護府離開後，新成立了雲中都護府，也就是後來的單于大都護府。¹⁵⁵

最後，嚴耕望認為，永徽元年至龍朔三年間，有燕然、瀚海、單于三都護府，龍朔三年燕然都護府北移並改名瀚海都護府，舊瀚海都護府移至雲中故城，改名雲中都護府，舊單于都護府省廢。¹⁵⁶李宗俊雖然不認為永徽元年至龍朔三年間有三府同時存在，但同意嚴耕望認為永徽元年便有單于大都護府的存在，這個單于大都護府在龍朔三年改為雲中大都護府，又有麟德元年改回單于大都護府。¹⁵⁷

因為對史料的不同解讀，以上第一、二派學者對燕然都護府北移的解釋也不一樣。第一派認為，貞觀廿一年、廿三年先後平定鐵勒和突厥殘部，唐朝乘

¹⁵⁴ 岑仲勉，《突厥集史》(北京：中華書局，1958 初版)，頁 270；譚其驤，〈唐北陲二都護府建置沿革與治所遷移〉，收氏著《長水集》(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初版)，頁 263-266；樊文禮，〈唐代單于都護府考論〉，《民族研究》，(1993，北京)，頁 35-36。

¹⁵⁵ 岩佐精一郎，〈突厥の復興に就いて〉，94-97；艾沖，〈唐代安北都護府遷徙考論〉，頁 110-111。

¹⁵⁶ 嚴耕望，〈唐代安北單于兩都護府考〉，《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香港：新亞研究所，1974 初版)，頁 23-25。

¹⁵⁷ 李宗俊，〈唐代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再考〉，《中國史研究》，(2009，北京)，頁 64，67。

勝將都護府遷往漠北。¹⁵⁸第二派認為，顯慶五年(660)思結、拔野古、同羅等鐵勒部族發起叛亂，龍朔二年(662)被鄭仁泰、薛仁貴鎮壓後，唐朝才把燕然都護府北遷，從「以導賓貢」變成具有邊政功能的都護府。¹⁵⁹

保守地說，龍朔三年以前，唐朝的北方邊疆政策尚有很多需要研究的地方，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甚至可以說，在唐朝對突厥人的五十年羈縻統治中，只有單于大都護府存在的十六年有比較明確可知的制度、行政編制和長官人選。¹⁶⁰然而，也並非一無所獲，因為後來阿史那、阿史德起兵，所對抗的正是龍朔三年後建立起來的單于大都護府。

3.都護府的職能及羈縻府州的管理

本文所指羈縻府州體制，包含都護府與羈縻府州兩個部份。從制度上看，羈縻都護府位於羈縻府州之上，故以下將從都護開府開始討論，從上而下地展開討論。

礙於地理與政治的因素，唐朝對各邊疆羈縻府州的控制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現大致整理如下：一、漠北在貞觀末至永徽初設置羈縻府州，受後突厥汗國侵攻而內遷，開元初於關內道北部重置安北都護府，於靈、夏等邊州都督府下僑置羈縻府州；二、黨項羈縻府州曾參與平定六胡州，安史之亂後，靈、夏、鹽、慶諸州黨項投奔了吐蕃；三、營州都督府轄下靺鞨、奚、契丹羈縻府州，其中契丹和奚在武后時期投奔後突厥汗國，玄宗時期又再歸附；四、安西四鎮在屬國(羈縻府州)的都城外設置城寨，控制數目有限的綠洲；五、在天山以北，北庭都護府的控制力有限，靠著招撫西突厥及往後的突騎施，勉強維持

¹⁵⁸譚其驤，〈唐北陲二都護府建置沿革與治所遷移〉，收氏著《長水集》(下冊)，頁 263；樊文禮，〈唐代單于都護府考論〉，頁 35。

¹⁵⁹岩佐精一郎，〈突厥の復興に就いて〉，96-97。

¹⁶⁰郁賢皓有關單于大都護府的考察選擇乃從麟德元年開始，對該府的前身避而不論。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第一冊，(合肥：宗徽大學出版社，2000 初版)，頁 383。

通往中亞的交通線；六、在中亞，唐朝對吐火羅、昭武九姓國僅有名義上的羈縻關係，無法長期駐軍；七、東北的渤海國、黑水靺鞨、室韋同受唐朝冊封，但唐朝在當地的控制力有限，無法阻止渤海國兼併黑水靺鞨；八、雲南的羈縻府州最早設於高祖武德年間，文宗太和年間，與南詔以大渡河為界。¹⁶¹

理論上，邊境鎮撫機構，其職能包括管轄羈縻府州、以導賓貢、撫和招納、敦促羈縻府州納質、轉賜俸祿、使命往還、對外交涉、揖寧外寇、互市管理、掌握蕃國動態。¹⁶²然而，以上僅為一種靜態的描述，多少忽略了時間與地區的差異性。以北方的兩府來說，龍朔三年前的燕然都護府的確比較具有「以導賓貢」的招撫性質，但在龍朔三年北遷並改名為瀚海都護府後，便應該更具監控的性質——即使這監控不如後來的節度使體制嚴密。同時，唐朝也為了管轄突厥降戶，在漠南建立雲中大都護府，也就是單于大都護府的前身。¹⁶³

接著是羈縻府州的實際管理，可以從華官參治、兵役與賦稅三方面去考量。關於華官參治，栗原益男〈七、八世紀の東アヅア世界〉論及了唐朝對高句麗和百濟的羈縻統治，高句麗被切割成很多羈縻縣，派華官參治，相反百濟的羈縻府、州是按原來的部、郡設置的，也沒有華官參治，情況比較接近唐朝對遊牧社會的統治。¹⁶⁴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認為華官參治始於太宗，在高宗時期成為定制，但有落實的都是定居的羈縻府州，在遊牧民的羈縻府州未有落實華官參治。¹⁶⁵對此，馬馳〈試論唐代蕃州的管理體制〉持有不同看法，認為即使是遊牧地區，如鐵勒十三府州，仍然有所謂華官參治的狀況。¹⁶⁶

有關兵役的部份，譚其驤〈唐代羈縻州論述〉雖然指出了出兵助唐的不一定是羈縻州，唐朝也不一定接受屬國輸兵輸糧，但沒有證明或反駁唐朝從其控

¹⁶¹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頁 79-141。

¹⁶²李大龍，《漢唐外交制度史》（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8 初版），頁 497-508。

¹⁶³樊文禮，〈唐代單于都護府考論〉，《民族研究》，1993 年 3 期，（1993，北京），頁 55。

¹⁶⁴栗原益男，〈七、八世紀の東アヅア世界〉，頁 148-149。

¹⁶⁵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頁 38-40。

¹⁶⁶馬馳，〈試論唐代蕃州的管理體制〉，頁 10-12。

制的羈縻府州徵調軍隊的事實。¹⁶⁷相對之下，桂齊遜比較肯定羈縻府州的作用。他認為唐初以外層都護府、內層都督府，配以羈縻府州，構成一套堅強的防禦系統。¹⁶⁸劉統認為羈縻府州接受唐朝徵發的義務，唐朝用羈縻府州的兵力征討不服其他外族，是一種以夷制夷的手段。然而，上述義務只限於都護府能控制的羈縻府州，太過偏遠的地方並不屬唐朝徵兵對象。¹⁶⁹馬馳認為羈縻府州受唐遣發，或主動出征討伐敵國，或擔任保衛唐朝邊疆的角色。¹⁷⁰石見清裕〈唐の内附異民族対象規定〉認為北方系遊牧民的羈縻府州受唐朝徵發，服役超過 30 天獲得免稅。¹⁷¹森部豐〈唐前半期河北地域における非漢族の分布と安史軍淵源の一形態〉從軍事建置出發，整理了安史軍中諸將的族裔出身，也探討了這些人與羈縻州的關係。文中考察了五名安史部將的出身，張孝忠是奚人，部落不明；李寶臣為奚人，與鎖高部落有關，經平州盧龍府折衝都尉，後為安祿山引用；王武俊出身契丹怒皆部落，其父從饒樂府都督李詩歸唐；李永定，羈縻州刺史李仙禮之子，出任於羈縻州折衝府，後轉任河北軍職，但仍兼任羈縻州刺史。由此可見，有不少羈縻州出身者，在羈縻州或外地折衝府任職後，再轉入藩帥的近側。¹⁷²此外，高明士也從軍事建置出發，認為羈縻府州內設有鎮、城、戍、捉守等軍事據點。¹⁷³

最後，有關賦稅。譚其驥認為唐朝對羈縻府州的控制頗為有限，羈縻州僅需不定期向天子納貢，還能取得回賜，看不出與其他藩屬的朝貢有明顯區別。

¹⁷⁴劉統認為，雖然唐朝沒有明確規定羈縻府州是否承擔賦稅徭役，但實際上，

¹⁶⁷譚其驥〈唐代羈縻州述論〉，頁 561。

¹⁶⁸桂齊遜，〈唐代都督府、都護府及軍鎮制度與節度體制創建之關係〉，《大陸雜誌》，89:4，(1994，台北)，頁 24。

¹⁶⁹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56-59。

¹⁷⁰馬馳，〈試論唐代蕃州的管理體制〉，頁 31-32。

¹⁷¹石見清裕，〈唐の内附異民族対象規定〉，收入氏著《唐の北方問題と国勢秩序》(東京：1998 年初版)，頁 170-171。

¹⁷²森部豐，〈唐前半期河北地域における非漢族の分布と安史軍淵源の一形態〉，頁 32-36。

¹⁷³高明士，〈羈縻府州制度〉，頁 56-59。

¹⁷⁴譚其驥〈唐代羈縻州述論〉，頁 559-561。

大多數羈縻府州都向邊州都督和都護交納賦稅，並承擔徭役。¹⁷⁵馬馳認為「戶籍多不上戶部」表示仍有部份府州需要納賦稅，只是稅額較低。同時，其長官亦需向天子進奉方物。¹⁷⁶高明士認為羈縻府州除了對中央的「貢」，還有對邊州或都護府的「賦」，羈縻府州同樣納稅，只是稅額較低。¹⁷⁷

事實上，即使是同意羈縻府州向唐朝繳納賦稅的學者，彼此間也有不同主張。樊文禮認為，僑置羈縻府州的蕃戶一代之後即成為編戶，與唐人繳納同等的賦稅。¹⁷⁸石見清裕對此持有不同看法，認為蕃戶與降戶所指有異，前者是少數移入唐境的個人，後者是游牧民氏部族集團，作為羈縻州民而保有過去的生活方式。¹⁷⁹同時，羈縻府州的稅制不只一種。在西南或南方有免稅三年的招慰手段，這可能是給予適用於羈縻府州的狀況，也可能適用於羈縻府州昇格為正州時的情況。在北方系游牧民的羈縻府州，以羊繳納賦稅，被徵發 30 日以上，免除輸羊。¹⁸⁰

綜合以上，突厥系羈縻州當有賦稅與服役義務。即使有部份羈縻府州並不承擔兵役、賦稅，但從徵發 30 日以上免除輸羊的規定，還有羈縻州內鎮、城、戍、捉守的設立，可見北方游牧系的降戶是需要承擔兵役、賦稅的。有鑑於此，不能單以「版籍不上戶部」一文就理解成豁免稅役，這些降戶仍需承擔兵役和賦稅，只是改為向都護府而非戶部負責。

(二)、唐羈縻統治下的阿史德氏

隨著 7 世紀唐朝羈縻統治的崩潰，使得東亞陸續出現新羅、渤海等律令式

¹⁷⁵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頁 62。

¹⁷⁶馬馳，〈試論唐代蕃州的管理體制〉，頁 28-29。

¹⁷⁷高明士，〈羈縻府州制度〉，頁 32-41。

¹⁷⁸樊文禮，〈唐代靈、慶、銀、夏等州界內的僑置府州〉，《民族研究》，1990 年 4 期，(1990，北京)，頁 91。

¹⁷⁹石見清裕，〈唐の突厥遺民に対する措置〉，頁 135-140，168；石見清裕，〈唐の内附異民族対象規定〉，頁 168。

¹⁸⁰石見清裕，〈唐の内附異民族対象規定〉，頁 160-173。

集權國家。¹⁸¹草原上雖然沒有出現律令制國家，但從突厥語中「都督」、「刺史」、「長史」等外來語，仍可發現遊牧民受唐律令制支配的痕跡。¹⁸²除此以外，唐朝的羈縻統治也為突厥內部的政治帶來一些變革，主要表現於阿史德氏的興起。在阿史德氏的輔助下，阿史那氏建立後突厥汗國，並從原來的東突厥十二姓擴大到三十姓。¹⁸³以下將從「阿史德氏的崛起」和「阿史那與阿史德氏的聯姻」兩方面進行進行討論。

1.阿史德氏的崛起

要討論阿史德氏的崛起，得分為三個階段來進行論述。第一是阿史德崛起之前，由武德至貞觀年間，阿史德氏族先作為東突厥臣民，後降附於唐朝；第二是高宗永徽至調露年間，阿史德氏逐漸在唐朝累積實力，最終成為突厥人反唐與建國的中堅力量，第三是後突厥時期阿史德氏在軍事、政治、出使方面的表現。

首先，是武德至貞觀年間的記錄。自唐武德元年至貞觀四年東突厥滅亡，有關史阿德氏的漢文史料只有兩條。最早的紀錄是武德四年(621)頡利可汗與苑君璋入侵雁門未果，雙方交換人質：

先是漢陽公瓌、太常卿鄭元璠、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等各使于突厥，頡利並拘之，我亦留其使前後數輩，至是為大恩所挫，於是乃懼，仍放順德還，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斤，欲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嘉之，放其特勤熱寒、阿史德等還蕃，賜以金帛。¹⁸⁴

¹⁸¹ 栗原益男，〈七、八世紀の東アヅア世界〉，頁 141，152-153。

¹⁸² 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頁 172。

¹⁸³ 鈴木宏節，〈三十姓突厥の出現——突厥第二可汗国をめぐる北アヅア情勢〉，頁 15-20。

¹⁸⁴ 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55；王欽若，〈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 980，頁 11510-1。



引文中，一位名字不詳的阿史德族人代表東突厥出使唐朝，被唐朝拘留，武德四年雙方交換人質而獲釋放。數年後，另一位阿史德氏死於與唐朝的戰爭：

九年七月，頡利又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己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侯大將軍尉敬德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¹⁸⁵

從上可見，阿史德烏沒啜的官號為俟斤，也就是地方氏·部族共同體的族長，¹⁸⁶在與尉遲敬德的戰鬥中被俘獲。

東突厥在武德九年最後一次威脅長安，其後遭遇天災、薛延陀的叛亂、頡利與突利可汗的內鬨。貞觀四年春，頡利可汗被擒獲，東突厥滅亡，阿史德和其他突厥部落向唐朝投降，接受後者的羈縻統治。從貞觀到麟德年間，《資治通鑑》共有三則阿史德氏的記載：

初，李靖破突厥，遷三百帳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為之長。¹⁸⁷

(貞觀二十年)多彌引數千騎奔阿史德時健部落，回紇攻而殺之，并其宗族殆盡，遂據其地。¹⁸⁸

(貞觀二十二年)又以阿史德時健俟斤部落置祁連州，隸營州都督。¹⁸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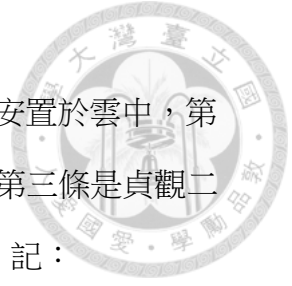
¹⁸⁵ 杜佑，《通典》，卷 197，頁 5409；王欽若，《冊府元龜》，卷 357，頁 4237-1；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91，武德九年秋八月己卯條，頁 6018；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57；歐陽修，《新唐書》，卷 215，〈突厥傳〉，頁 6022-6023。

¹⁸⁶ 護雅夫，〈突厥の國家構造〉，頁 38-42。

¹⁸⁷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01，唐麟德元年春正月甲子條，頁 6339。

¹⁸⁸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98，唐貞觀二十年夏六月條，頁 6237。

¹⁸⁹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98，唐貞觀二十二年春正月條，頁 6252-6253。



第一條史料是有關唐朝對東突厥的戰後處理，阿史德三百帳被安置於雲中，第二條是貞觀二十年(646)薛延陀多彌可汗投奔阿史德時健未遂，第三條是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遷徙阿史德時健部落。《新唐書·迴鶻傳》記：

帝更詔時健它部為祁連州，隸靈州都督……¹⁹⁰

同書〈地理志〉記：

隴右道

突厥州三，府二十七。

皋蘭州 貞觀二十二年以阿史德特健，初隸燕然都護，後來屬。¹⁹¹

引文中，特健即時健，燕然都護府即是後來的雲中都護府，麟德元年改單于大都護府。至於祁連州及皋蘭州，《唐會要》記：

以阿史德特建俟斤部落置皋蘭祁連二州，隸靈州都督府。¹⁹²

今從《唐會要》。又因貞觀二十二所遷為阿史德「它部」，大部份人口應該留在雲中，才会有高宗初年「請如胡法立親王為可汗以統之」的記錄。貞觀二十三年(649)，置定襄、雲中兩都督府：

¹⁹⁰歐陽修，《新唐書》，卷 217，〈回鶻傳〉，頁 6113。

¹⁹¹歐陽修，《新唐書》，卷 43，〈地理志〉，頁 1129-1130。

¹⁹²王溥，《唐會要》，卷 73，靈州都督府條，頁 1316。



二十三年十月三日，諸突厥歸化，以舍利吐利部置舍利州，阿史那部置阿史那州，綽部置綽州，賀魯部置賀魯州，葛邏祿怛怛二部置葛邏州，並隸雲中都督府，以蘇農部落置蘇農州，阿史德部置阿史德州，執失部置執失州，卑失部置卑失州，郁射部置郁射州，多地藝失部置藝失州，並隸定襄都督府。¹⁹³

除此以外，同書「諸蕃馬印條」及《新唐書·地理志》，也記載阿史德州隸於定襄都督府，阿史那州隸於雲中都督府。¹⁹⁴

綜合以上引文，自武德四年至麟德元年(664)的 43 年當中，最初 9 年是東突厥與唐朝交戰的時期，有兩名阿史德族人見於文獻之中，一名是使節，另一名是俟斤。其後，東突厥滅亡，隨後 34 年的記錄大部份是唐朝對阿史德族人的處置。

進入高宗麟德元年，阿史德氏的政治實力逐漸增加，一方面由於人口增長，另一部份由於族人在唐朝服役，並逐漸獲得重用。有關阿史德族人在雲中的活動狀況，可參考以下記錄：

至是，部落漸眾，阿史德氏詣闕，請如胡法立親王為可汗以統之。¹⁹⁵

麟德元年春正元月甲子，改雲中都護府為單于大都護府，官品同大都督府。¹⁹⁶

¹⁹³王溥，《唐會要》，卷 73，安北都護府條，頁 1315。

¹⁹⁴王溥，《唐會要》，卷 72，諸蕃馬印條，頁 1307-1308；歐陽修，《新唐書》，卷 43，〈地理志〉，頁 1120。

¹⁹⁵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01，唐麟德元年春正月甲子條，頁 6339。

¹⁹⁶劉昫，《舊唐書》，卷 4，〈高宗本紀〉，頁 85。

以上第一段史料出自《資治通鑑》，第二段出自《舊唐書》。綜合兩段文字，由於阿史德氏部族漸眾，高宗設立單于大都護府加以統制。就結果來看，阿史德氏奏請「立親王為可汗以統之」的對象，該是指唐朝統治下的，陰山以南的全部突厥羈縻州。可見在麟德以前，阿史德氏在突厥降戶中已擁有相當的影響力及發言權。有關阿史德氏在唐朝軍隊服役的事實，可以參考顯慶五年(660)，被派往平定奚和契丹叛亂的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

(顯慶五年)五月，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侯將軍延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含珠為冷陁道行軍總管，各領本蕃兵以討叛奚。仍令尚書左丞崔餘慶充使總護三蕃，尋而奚遣使降附。¹⁹⁷

同月，阿史德樞賓改為沙磧道行軍總管，與契丹和奚的戰鬥直到十二月才結束。¹⁹⁸這位定襄都督很可能就是頡利可汗曾孫阿史那感德的丈人。¹⁹⁹阿史德氏崛起的另一個原因，就是送子弟入質長安。薛登懼怕外族借入質了解中國形勢，曾為此進諫：

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為邊害。²⁰⁰

引文提及的阿史德元珍，後來在單于都護府「檢校降戶部落」，²⁰¹叛唐成為後突厥建國的功臣。

阿史德氏的崛起，除依靠入質京師、參與平亂、在單于大都護府擔任要

¹⁹⁷王欽若，《冊府元龜》，卷 986，頁 11577-2。

¹⁹⁸歐陽修，《新唐書》，卷 3，頁 60；歐陽修，《新唐書》，卷 219，〈北狄·契丹傳〉，頁 6168。

¹⁹⁹趙振華，〈唐《阿史那感德基志》考釋〉，收氏著《洛陽古代銘刻文獻研究》(西安：三秦，2009 初版)，頁 480-481。

²⁰⁰歐陽修，《新唐書》，卷 112，〈薛登傳〉，頁 4170。

²⁰¹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67。

職，也不能忽略唐朝架空阿史那氏，而重用其他突厥氏族的背景。現存漢文史料記載了雲中都督舍利元英、定襄都督阿史德賓樞，卻沒有任何紀錄顯示阿史那氏出任都督或單于大都護府中的其他要職。由此推論，阿史那氏的實際影響力應該不超過其所在的阿史那州。²⁰²

調露元年至永淳元年，單于大都護府轄下的突厥人向唐朝揭起反旗，其結果為骨咄祿率眾進入陰山北麓黑沙城，在此展開突厥復國的大計。在傳世的漢文文獻中，以《舊唐書·突厥傳》的記載最為詳細：

調露元年，單于管內突厥首領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落始相率反叛，立泥孰為可汗，二十四州並叛應之。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右千牛將軍李景嘉率眾討之，反為溫傅所敗，兵士死者萬餘人。又詔禮部尚書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等統眾三十餘萬，討擊溫傅，大破之，泥孰匍為其下所殺，并擒奉職而還。永隆元年，突厥又迎頡利從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將渡河立為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從之。又詔裴行儉率將軍曹繼叔、程務挺、李崇直、李文暉等討之。伏念窘急，詣行儉降。行儉遂虜伏念詣京師，斬于東市。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祿復反叛。²⁰³

時有阿史德元珍，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嘗坐事為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繫，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依舊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而便投骨咄祿。骨咄祿得之，甚喜，立為阿波達干，令專統兵馬事。²⁰⁴

又，根據《資治通鑑》的記載，骨咄祿與阿史德元珍的兵馬在弘道元年(684)攻

²⁰²岩佐精一郎，〈突厥の復興に就いて〉，88-89。

²⁰³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66。

²⁰⁴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67。

下單于大都護府：

三月，庚寅，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圍單于都護府，執司馬張行師，殺之。²⁰⁵



以上引自《舊唐書》、《資治通鑑》的三條史料中，提及阿史德奉職、溫傅、元珍三位阿史德氏的事跡。前兩人率先起事，立先後立阿史那熟泥匐、阿史那伏念為可汗，後者則作為骨咄祿的重臣，在骨咄祿奔陰山後的第二年，與之攻陷單于大都護府。

綜合而言，調露元年至弘道元年的起事乃由阿史德氏主導，以擁護阿史那氏為號召。²⁰⁶在這場叛亂中，阿史那與阿史德氏的角色，可從遊牧國家中可汗的權力構成來加以討論。可汗既是軍事、政治首領，世俗的「權力者」，也是薩滿，神聖意義上的「權威者」。²⁰⁷雖然後者的狀況難以判斷，但阿史那氏在高宗初年，無疑已喪失了作為世俗「權力者」的實力，其狀況可從以下史料略見一二：

骨咄祿者，頡利之疏屬，其父本是單于右廂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領，代襲吐屯啜。²⁰⁸

舍利氏並不是顯赫的氏族，反能出任雲中都督，骨咄祿父祖貴為阿史那氏，反而只能掌握阿史那州的部眾，位在舍利元英之下。這很可能是唐朝畏於突厥人在阿史那氏領導下蜂起反抗，因而對阿史那氏多加打壓。阿史德氏雖然累積了一定的實力，但由於突厥根深蒂固的傳統，汗位由阿史那氏一門獨佔，因此不

²⁰⁵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03，弦道元年春三月庚寅條，頁 6413。

²⁰⁶齊藤茂雄，〈突厥阿史那感德墓誌記注考——唐羈縻支配下突厥集團の性格〉，頁 23-24。

²⁰⁷護雅夫，《遊牧騎馬民族国家》，184-186，197-202。

²⁰⁸杜佑，《通典》，卷 198，頁 5434。

能自稱可汗，必需立阿史那氏為傀儡可汗。²⁰⁹

骨咄祿在 683 年攻下單于大都護府，唐朝再無法對突厥遺民實施羈縻統治，加上軍事討伐的失敗，武后遂在垂拱三年(687)，立阿史那感德為可汗，此舉有著讓正統的「突厥第一帝國」復活，對抗「突厥第二帝國」的意味。唐朝上次扶立突厥正統可汗，是唐太宗在貞觀十三年(639)扶植阿史那思摩，現由於羈縻體制的破壞，不得不重施故技。事實上，唐朝一直採用立支配者之直系為傀儡，以壓抑新興勢力的手段，如同在西突厥立阿史那懷道為可汗，對抗新興的突騎施。此外，吐蕃崛起導致西部戰事緊張，也是武后立阿史那感德以防禦漠南的重要原因之一。²¹⁰換言之，無論是阿史德氏與武后都曾立阿史那氏為傀儡可汗，前者扶立「頡利從兄之子」阿史那伏念，後者扶立頡利曾孫阿史那感德，由此可見阿史那嫡系仍然擁有某種精神上的號召力。

然而，長年被架空的頡利嫡系始終難有作為，不如出身旁支的骨咄祿，藉個人人才幹及賢臣輔助，建立起後突厥汗國。後突厥的建立，除了頡利施可汗骨咄祿，其重臣阿史德元珍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有關阿史德元珍的身份，學界曾有過不少的討論，有認為阿史德元珍與噉欲谷為不同之二人(二人說)，有認為兩者為同一人(一人說)。其中，二人說可參考岩佐精一郎與薛宗正。二人說的論點，大概可歸納為：一、噉欲谷在骨咄祿隊伍只有七百人時就加入其麾下，阿史德元珍等 638 年骨咄祿攻擊單于大都護府時才加入；二、噉欲谷的官號為裴羅莫賀達干，阿史德元珍的官號為阿波達干；三、阿史德元珍在默啜派兵西域時戰死，噉欲谷則活到毗伽可汗時期。²¹¹

另一方面，護雅夫和耿世民認為噉欲谷和阿史德元珍為同一人，兩人利用語言學的方法，均指出「元珍」為「噉欲谷」的漢文意譯，鈴木宏節採用了護

²⁰⁹護雅夫，〈突厥第一帝国における qayan 号の研究〉，收氏著《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第 1 編，(東京：山川出版社，1967 初版)，頁 231-233。

²¹⁰齊藤茂雄，〈突厥「阿史那感德基誌訳注考——唐羈縻支配下突厥集團の性格〉，頁 25-30。

²¹¹岩佐精一郎，〈突厥の復興に就いて〉，頁 105；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初版)，頁 435-436。

雅夫的解釋。²¹²同時，護雅夫反駁了「二人說」的第二個論點，他進一步解釋，阿史德元珍加入突厥第二汗國後，在 697 年出任阿波達干，710 年後降為裴羅莫賀達干，但噉欲谷碑敘述其早年事跡時，使用了其晚年官號。²¹³至於噉欲谷比阿史德元珍早加到骨咄祿集團的說法，目前還未見有其他回應。

以上有關噉欲谷的身份，史家目前各執一詞，只好期待除非找到第三個史料來源的出現。本文無意也無力處理阿史德元珍的正實身份，而僅止於整理各家學說。事實上，假使阿史德元珍與噉欲谷為不同之二人，亦不影響阿史德氏在七世紀末興起的論點。

突厥第二汗國建立後，噉欲谷經歷頡跌利施可汗、默啜可汗、毗伽可汗三朝，同時是毗伽可汗的謀臣和岳父。噉欲谷一生的事跡，被記載在〈噉欲谷碑〉，碑文相當程度上反映了阿史德氏在後突厥政治中的發揮的作用：

我是謀臣噉欲谷，本人成長於唐朝。(那時)突厥人民臣屬於唐朝。²¹⁴

首領是設，他說：「請集合(我們的隊伍)吧！」集合的是我——謀臣噉欲谷。我說：我是否要催促他成為可汗？我想：如果在遠處區分瘦公牛和肥公牛，人們就不知道哪個肥公牛，哪個是瘦公牛，我這麼想了。之後，由於上天賜給(我)智慧，我自己敦促(他)為可汗，謀臣噉欲谷——裴羅莫賀達干²¹⁵


頡跌利施可汗由於其英明和勇敢，曾與唐朝交戰十七次，與契丹交戰七

²¹²克利亞什托爾內著，李佩娟譯，《古代突厥魯尼文碑銘：中亞細亞史原始文獻》(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 初版)，頁 24-27；護雅夫著，吳永明譯，〈阿史德元珍與噉欲谷〉，《民族譯叢》，1979 年 3 期，(北京，1979)，頁 35-39；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頁 92；鈴木宏節，〈突厥トニユクク碑文筭記——斥候逃亡者〉，《待兼山論叢(史學篇)》，第 4 号，(2008，大阪)，頁 55。

²¹³ 護雅夫，〈阿史德元珍與噉欲谷〉，頁 35-39。

²¹⁴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頁 94。

²¹⁵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頁 95。



次，與烏古斯交戰五次。那時其顧問也是我，其前敵官也是我。為頡跌利施可汗，為突厥默啜可汗，為突厥毗伽可汗(我出了力)。默啜可汗二十七歲時，我輔佐他即位。我夜不能眠，晝不能坐，流鮮血，灑黑汗，我(為國)貢獻了力量。我也派出了遠征(軍)。我擴大了禁衛隊。我使叛服無常的敵人來歸。我同我的可汗(多次)出征過。上天保佑，我沒有讓全副裝武的敵人在突厥人民中馳騁，我沒有讓打有結飾的馬匹到處奔馳。如果頡跌利施可汗不努力，要是我不跟隨他也努力的話，國家和人民都得滅亡。由於他(可汗)的努力，由於跟隨他，我自己的努力，國家才成為國家，人民才成為人民。我自己已衰老年邁了。不論什麼地方，凡有可汗的人民中，只要有(像我)這樣的人，就不會有什麼不幸! 我謀臣噉欲谷讓人為突厥毗伽可汗的國家寫了(這個碑)。²¹⁶

從引文可見，噉欲谷為自己的功勳感到驕傲。他參與了後突厥汗國的建立，促使骨咄祿即位為頡跌利施可汗。他為汗國出謀獻計，並領導了軍事遠征。〈噉欲谷碑〉記載了突厥人對九姓鐵勒、點戛斯、突騎施的遠征。²¹⁷其中，第三次攻擊的對象為突騎施可汗娑葛。²¹⁸同時，也有一次攻打拔悉密，碑文沒有記載，卻見於《舊唐書·突厥傳》：

八年冬，御史大夫王晙為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稽落河上。小殺聞之，大恐。噉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勢必不合。王晙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即移衙向北三日，唐兵糧量，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先

²¹⁶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頁 105-106。

²¹⁷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頁 98-105。

²¹⁸劉昫，《舊唐書》，卷 93，〈張仁願傳〉，頁 2982；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91。

來，王峻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王峻兵馬不來，拔悉密獨至，即須擊取之，勢易為也。」九年秋，拔悉密果臨突厥衙帳，而王峻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噶欲谷曰：「此眾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噶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率擊拔悉密之還眾，遂散走北庭，而城陷不得入，盡為突厥所擒，并擄其男女而還。噶欲谷迴兵，因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為涼州都督，遣副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出兵邀擊之。噶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即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即須決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公利等兵至刪丹，遇賊，元澄令兵士揜臂持滿，仍急結其袖，會風雪凍烈，盡墜弓矢，由是官軍大敗，元澄脫身而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檢校涼州事。小殺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眾。俄又遣使請和，乞與玄宗為子，上許之。仍請尚公主，上但厚賜而遺之。²¹⁹

噶欲谷晚年與闕特勤做為毗伽可汗最重要的大臣，可從張說給唐玄宗的諫言中略知一二：

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愛而愛人，眾為之用；闕特勤驍武善戰，所向無前；噶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智，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²²⁰

後來，唐玄宗派袁振出使，與毗伽可汗、闕特勤、噶欲谷會談，突厥請尚公主，未果。毗伽可汗派阿史德頡利發朝貢，開元十三年(725)隨玄宗登泰山封禪。除噶欲谷以外，默啜、毗伽可汗時期尚有其他阿史德氏的活動，現試整理

²¹⁹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74-5175。

²²⁰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75。

如下：



默啜女婿阿史德胡祿俄又歸朝，授以特進。²²¹

小殺乃遺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²²²

以上兩條史料，第一條是默啜可汗晚年的事，當中提及的默啜女婿，顯然是阿史德氏。第二條史料的小殺是指毗伽可汗，開元十三年派阿史德頡利發入朝，頡利發為官號，與俟斤同為共同體族長，但所領的部眾較多。

從上史料，可見阿史德氏在後突厥汗國擔任使節與氏、部族共同體的族長。不同的是，其領導的氏、部族共同體有擴大的跡象。同時，可汗身邊開始出現阿史德元珍、噉欲谷等重臣，反映阿史德氏比東突厥汗國時期更加進入權力核心。

綜合上述三個階段的歷史，可得出：一、阿史德氏在東突厥汗國擔任使節與氏、部族共同體之族長；二、在唐羈縻統治時期，唐朝架空阿史那氏在突厥降戶中的影響力，重用其他氏族，阿史德氏入質京師，參與平亂，擔任定襄都督、單于大都護府檢校降戶部落等職，累積自己的政治實力；三、雖然阿史那氏，尤其是可汗嫡系的實權被架空，但基於根深蒂固的傳統，只有阿史那氏能成為可汗，因此無論是阿史德氏還是武后政權，都得扶植阿史那氏為傀儡可汗；四、阿史那氏一門獨佔汗位的傳統一路沿襲到後突厥，阿史德氏仍擔任使節和氏、部落共同體的族長，而其領導的共同體有擴大跡象，同時也出現了噉欲谷這樣的重臣，參與軍、政重大決策。

2.阿史那與阿史德的聯姻

²²¹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73。

²²²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76。



無論從漢文文獻還是突厥碑銘，皆可見發現後突厥時期，阿史德氏做為可敦、外戚、軍政重臣和使節的記載都較東突厥時期詳細。限於史料的數量，學者解釋阿史德作為阿史那姻親氏族時，很容易以後突厥為藍本，產生一幅靜態的圖象。所幸於近年新史料的出土，使研究者得以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阿史德氏作為可汗的姻親氏族，與阿史那氏共同組成了突厥國家的「貴族氏族群」。在突厥汗國成立以前，這兩個氏族(可能還包括少數幾個氏族)便組成了後來突厥汗國的「中核氏族群」。阿史那、阿史德氏的關係，類似匈奴攣鞞氏與呼衍、須卜、丘林、蘭等氏族，又或者蒙古「黃金氏族」與弘吉刺氏族。出身阿史德氏族的噶欲谷輔助骨咄祿建立後突厥汗國，經歷骨咄祿、默啜與毗伽可汗三朝。默啜死後，闕特勤殺前朝「衙官」、「用事官」，擁立默棘連為毗伽可汗，噶欲谷作為默棘連的姻親而得以免死。²²³然而，上述推論僅根據後突厥時期噶欲谷一例，如果能加上〈阿史那感德墓誌銘〉、〈唐故三十姓可汗貴女賢力毗伽公主雲中郡夫人阿史那氏墓誌〉等突厥人漢文墓誌，想必能夠對阿史那、阿史德氏的姻親關係，有更全面的了解。

2000年中國內蒙古出土〈阿史那感德墓誌銘〉，由於墓主的事跡並未見於傳統文獻，因此墓誌成為了解突厥可汗後裔在唐朝活動的重要史料。2009年，墓誌的內文終於得以公開，以下節錄三則墓誌史料：

曾祖咄苾，頡利可汗……祖特勤，本蕃葉護；父伽那，左衛郎將。²²⁴

是知一日千里，自北徂南；四代五公，生子及父。²²⁵

²²³護雅夫，〈突厥の国家構造〉，頁 11-13；林恩顯，〈突厥研究〉，頁 78。

²²⁴佚名，〈阿史那感德墓誌銘〉，引自趁振華，〈洛陽古代銘刻文獻研究〉(西安：三秦，2009 初版)，頁 473，485。

²²⁵佚名，〈阿史那感德墓誌銘〉，頁 473，485。

夫人阿史德……即鎮軍大將軍、行右武衛軍大將軍兼定襄都督、五州諸軍事、右羽林軍上下、五原郡開國公之第二女也。²²⁶



以上兩條史料，第一條是阿史那感德的父系系譜；第二條顯示阿史那感德為突厥遺民第二代，其家族在頡利可汗歸順以來，一直在唐朝仕官；²²⁷第三條是關於可汗姻親阿史德氏。據初步整理，阿史那感德當為東突厥頡利可汗之直系後裔——頡利生疊羅支、乙毗陸咄可汗欲谷設、特勤三子，欲谷設生真珠葉護，特勤生伽那，伽那生感德。關於感德妻阿史德氏的系譜，阿史那感德丈人當為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²²⁸

武后立阿史那感德為歸義可汗，旨在利用阿史那嫡系的聲音，對抗出身旁支的骨咄祿。而墓誌記載阿史那感德之妻為娶阿史德氏，由此可證阿史那與阿史德的聯姻，最早可追溯公元 7 世紀的唐羈縻時期，甚至更早。不過，降唐的突厥王族也有娶漢人為妻，由此推測阿史那、阿史德氏的通婚應該固定在特定範圍，可能僅限於頡利可汗直系子孫。²²⁹

另一段有關阿史那、阿史德通婚的史料，是〈唐故三十姓可汗貴女賢力毘伽公主雲中郡夫人阿郝氏之墓誌并序〉。該墓誌由佚名作者所寫，收入《全唐文》，實物後來在西安出土，內文與《全唐文》基本相同：

唐故三十姓可汗貴女賢力恩伽公主雲中郡夫人阿郝氏之墓誌並序

駙馬都尉故特進兼左衛大將軍雲中郡開國公踏沒施達干阿史德覓覓

漢北大國有三十姓可汗，愛女建冉賢力毗伽公主，比漢公主焉。自入

²²⁶ 佚名，〈阿史那感德墓誌銘〉，頁 474。

²²⁷ 齊藤茂雄，〈突厥「阿史那感德墓誌」注考——唐羈縻支配下突厥集團の性格〉，頁 22。

²²⁸ 趁振華，〈唐《阿史那感德墓志》考釋〉，頁 480-481。

²²⁹ 齊藤茂雄，〈突厥「阿史那感德墓誌」注考——唐羈縻支配下突厥集團の性格〉，頁 22-25。

漢，封雲中郡夫人，父天上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咄祿默啜大可汗。天授奇姿，靈降英德，君臨右地，九姓畏其神明，霸居左衽。十二部忻承美化，貴主斯誕……頃屬家國喪亂，蕃落分崩，委命南奔。歸誠北闕，家晉犯法，身入宮闈。聖渥曲流，齒妃嬪之倖女，住天恩載被。禮秦晉於家兄，家兄即三十姓天上得毗伽可汗也。因承歡澤，特許歸親兄右賢王墨特勤私第，兼賜絹帛衣服，以充縻用……以大唐開元十一年歲次癸亥六月十一日，薨于右賢王京師懷德坊之第。²³⁰

上述引文參考了《全唐文》與《隋唐五代墓誌匯編》北京卷附遼寧卷，兩者主要差別在於「駙馬都尉故特進兼左衛大將軍雲中郡開國公踏沒施達干阿史德覓覓」的文字，而張寧等人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把這墓誌稱為〈阿史德覓覓夫人阿史那氏(毗伽公主)墓誌〉。墓主為默啜可汗之女，開元四年(716)，默啜為拔野古所殺，闕特勤趁機政變，墓主於是逃亡，降附唐朝。後因阿史德覓覓犯事而是沒入宮中，後被玄宗封為公主，準備送予毗伽可汗和親，但在開元十一年(723)去世。與賢力毗伽公主一同歸唐的，尚有其親兄墨特勤。關於默啜時期的阿史德氏，還有開元三年(715)降附的阿史德胡祿，其事見於《通典》：

默啜女婿阿史德胡祿俄又歸朝，授以特進。²³¹

根據羽田亨的解釋，阿史德覓覓與阿史德胡祿實為同一人，「胡祿」是「有名聲」之意，是一種美稱，覓覓則為其本名。²³²

綜合而言，有阿史那、阿史德通婚的紀錄，不僅只有毗伽可汗一代。從突厥人漢文墓誌可見，阿史德作為阿史那的姻親氏族，起碼可以追溯到公元 7 世

²³⁰ 佚名，〈阿史德覓覓夫人阿史那氏(毗伽公主墓誌)〉，收入張寧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北京卷附遼寧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初版)，頁 140。

²³¹ 杜佑，《通典》，卷 198，頁 5439。

²³² 羽田亨，〈唐故三十姓可汗貴女阿史那氏之墓誌〉，139-140。

紀的唐羈縻統治時期。合理推斷，可能沿襲自更早的東突厥時期。雖然目前還沒有 6 世紀東突厥建國時期的直接證據，但〈阿史那感德墓誌銘〉的發現，無疑是補強了前人的研究。



(三)、從「十二姓」突厥到「三十姓」突厥

根據漢文文獻及突厥碑文顯示，骨咄祿收復於都斤山後，經歷與黠戛斯、拔悉密的戰爭，以及默啜時期對突騎施的遠征，後突厥汗國無疑成為一個勢力強大，部眾眾多的遊牧國家。唐玄宗開元年間，唐朝開始以「三十姓」來稱呼後突厥汗國。在毗伽公主逝世後兩年，唐玄宗封禪泰山，隨行有「十姓摩阿史那興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賢王」。²³³其中，「十姓」指西突厥，「三十姓」是毗伽可汗統治下的後突厥汗國。配合〈唐故三十姓可汗貴女賢力毘伽公主雲中郡夫阿那氏之墓誌并序〉，則大概可知「三十姓」就是指默啜及毗伽可汗時期的突厥諸部落。²³⁴

然而，墓誌中有「十二部斫成美化」一文，羽田亨認為十二部為高車十二部，森安孝夫及鈴木宏節皆認為十二部為「十二姓突厥」，也就是原本的東突厥諸部落。²³⁵要解決以上問題，不妨從有關同時代其他北方民族的史料，來考察「十二姓」的所指。後突厥滅亡後，不少粟特人進入唐朝東北邊境，²³⁶其中一些有關粟特人的記載，中間有提到了「十二姓」，詳見以下兩則史料：

祿山奏前後破奚、契丹部落，及討招九姓、十二姓等立功將士，其跳蕩、第一、第二功，並請不拘，付中書門下批擬。²³⁷

²³³ 劉昫，《舊唐書》，卷 23，〈禮儀志〉，頁 900；王溥，《唐會要》，卷 8，郊議條，頁 115-116。

²³⁴ 羽田亨，〈唐故三十姓可汗貴女阿史那氏之墓誌〉，137-138。

²³⁵ 森安孝夫，〈テ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われる北方民族——DRU-GU と HOR〉，頁 10；鈴木宏節，〈三十姓突厥の出現——突厥第二可汗国をめぐる北アツア情勢〉，頁 6-7。

²³⁶ Edwin G. Pulleyblank, "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 pp.332,339-340.

²³⁷ 姚汝能，《安祿山事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 18。



公諱阿義屈達干，姓康氏，柳城人，其先世為北蕃十二姓之貴種。曾祖
頡利部落都督，祖染可汗附馬都知兵馬使，父頡利發墨啜可汗衛衙官知
部落都督。皆有功烈，稱於北陞。²³⁸

以上第一段來自《安祿山事迹》，記述是開元十三載的事件，漢文直接寫「九
姓」時能與突厥文 *Toquz Oyuz* 直接對應，用以指涉鐵勒，而十二姓則是原來的
突厥十二姓。²³⁹第二段出自〈康公神道碑銘〉，墓主是「突厥系粟特人」，天寶
元年(742)隨默啜之孫勃德支特勤歸附唐朝，先為安祿山部下，安史之亂爆發後
與家眷投奔肅宗的軍隊。事實上，粟特人除活躍於絲路的商業都市，也有部份
人融入到草原，成為所謂「突厥系粟特人」。在東突厥滅亡後，這些突厥化的集
團曾與突厥人一併被安置於鄂爾多斯，也就是所謂六州胡。702 年，後突厥默
啜可汗入侵當地，帶一部份人口北返。但需注意的是，六州胡屬於粟特系突
厥，但粟特系突厥不全然是六州胡。²⁴⁰

上述史料所記都是開元以降的情況，但有關「十二姓」的記錄，尚可追溯
到的睿宗景雲年間，甚至高宗調露以前：

十二姓阿史(那)葉護可寒順化王男左羽林軍上下左金吾衛大將軍阿史
(那)從政，番名藥賀特勤，夫人薛利施匐阿施。²⁴¹

²³⁸ 顏真卿，〈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贈開府儀同三司兼夏州都督康公神道
碑銘〉，收董誥，《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342，頁 3474-1。

²³⁹ 片山章雄，〈*Toquz Oyuz* と「九姓」の諸問題について〉，頁 1；鈴木宏節，〈三十姓突厥の出
現——突厥第二可汗国をめぐる北アツア情勢〉，頁 1-33。

²⁴⁰ 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歴史的展開〉(吹田：關西大學出版社，
2011 年 2 版)，頁 98-110；鈴木宏節，〈突厥阿史那思摩系譜考——突厥第一可汗国の可汗系譜
と唐代オルドスの突厥集團〉，《東洋學報》，87:1，(2005，東京)，頁 59-60。

²⁴¹ 佚名，〈唐故薛突利施匐阿施墓誌銘〉，收入王仁波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陝西卷，(天
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初版)，頁 90。

公之先本阿跌氏，出於南單于左廂十二姓，代有才傑，繼為首師。²⁴²

第一段史料為〈唐故薛突利施匐阿施夫人墓誌銘〉，墓主於睿宗景雲元年(710)去世，配偶為「十二姓」阿史那葉護可寒順化王之子阿史那從政。第二段史料為〈李光進碑〉，墓主為突厥阿跌氏後裔，由此可見「南單于左廂十二姓」當指東突厥十二姓。²⁴³

除了突厥人漢文墓誌外，十二姓突厥亦見於敦煌出土的藏文史料 P1284 文書(Pelliot Tibetan 1283)，該文書產生於吐蕃控制沙州的 787 至 848 年間，代表吐蕃人的北方觀。該文書雖然寫於突厥第二汗國滅亡後，但作者對突厥第二汗國仍有清楚的記憶，並直接指出突厥第二汗國(東突厥)由十二個部落組成。²⁴⁴

有關三十姓突厥，由於有墓誌史料與舊唐書互證，學界比較早產生共識，認為三十姓突厥就是後突厥汗國。另一方面，雖然十二姓突厥在正史中沒有記載，但比較墓誌史料與藏文史料後，先學論證了十二姓突厥即原來的東突厥諸部，其時代上限至少可追溯到唐朝羈縻統治時期。²⁴⁵至於從十二姓擴大到三十姓突厥的過程，則關係到後突厥往北、往西擴張，可以參考〈噶欲谷碑〉的三則史料：

我的可汗聽從了我本人噶欲谷的話。他說：「按你想的指揮(軍隊)吧！」過 K ök öng，我率領眾人帶著乳牛和馱畜到達於都斤山。烏古斯人從土拉(河)而來。其軍是三千，我軍是兩千。我們交戰了。上天保佑，我們擊潰了他們，他們落入了河中。在潰逃的路上，據說又死了(許

²⁴² 令狐楚，〈李光進碑〉，收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金石萃編》(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卷 107，頁 804。

²⁴³ 鈴木宏節，〈三十姓突厥の出現——突厥第二可汗国をめぐる北アヅア情勢〉，頁 6-7。

²⁴⁴ 森安孝夫，〈テ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われる北方民族——DRU-GU と HOR〉，頁 13-14，44-45。

²⁴⁵ 鈴木宏節，〈三十姓突厥の出現——突厥第二可汗国をめぐる北アヅア情勢〉，頁 1-7。

多)。之後，烏古斯人全都來了(即臣服了)。²⁴⁶



踏開(冰雪)，我們翻過長有樹木的山頂，我們很困難地下了山。在十夜中，我們繞行(山)邊的路障。嚮導由於帶錯了路而被殺。當困苦之際，可汗說：「騎快些！」我們到達 Ani 河，我們沿那條河往下走。我令下馬用飯。我們把馬拴在樹上。我們不分晝夜地疾走。我們襲擊黠戛斯於睡夢之中。我們用矛打開了他們的睡夢。那時他們的可汗和軍隊集合起來，我們交了戰。我們打敗了他們殺死其可汗。黠戛斯人民內屬並歸順我們。(於是)我們回師。我們繞過曲漫山。²⁴⁷

我們翻過無路可走的阿爾泰山林，渡過無漫口的額爾齊斯河。我們連夜前進，於黎明時抵達 Bolchu。人們捉住了「舌頭」，他的話是這樣的：在 Yarish 平原上已集合起十萬大軍。」……他們如火一般猛烈撲來。我們交戰了戰。我們的兩翼比我們多一半。由於上天保佑，我們沒有因其人多而害怕。我們交了戰。達頭設參戰了。我們擊潰了他們俘虜其可汗。將其葉護和設在那裡殺死。我們俘虜了約五十人。就在那夜，我們往各部人民派出了(信使)。聽到那消息後，十箭諸官員和人民全都來了，臣服了。當我組織、收集來歸的官員和人民時，少數人民逃走了。我讓十箭的軍隊出兵。我們也出了兵。我們跟在他們後面，渡過珍珠河，翻過稱作「天子」的 B ängülüg äk tagh 山，我們一直到達鐵門(關)，從那裡我們回師。塞人、大食人、吐火羅人以及(住在)這邊的以 Shuq 為首的粟特人民都來臣服卡移涅可汗/小可汗。以前，突厥人民未曾到達過鐵門(關)和稱作「天子」的山。²⁴⁸

²⁴⁶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頁 98。

²⁴⁷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頁 100-101。

²⁴⁸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頁 103-105。



以上三段史料皆引自〈噉欲谷碑〉，分別顯示了噉欲谷對九姓烏古斯、黠戛斯和突騎施的征伐。〈噉欲谷碑〉在敘述上，總是由探子帶回情報，作為場景的過渡。²⁴⁹在第一段史料，唐朝謀與九姓夾擊後突厥汗國，頡施跌利遂派噉欲谷率軍北上，是後突厥採取的背後防禦手段。²⁵⁰值得注意的是，芮傳明與耿世民的中譯本都把 Toquz Oγuz 譯為「九姓烏古斯」，²⁵¹但 Oγuz 既有被理解成族名，也有理解成部落，如果採用後者，Toquz Oγuz 意指九個部落，也就是漢文史料的「九姓」，或可意譯為「九姓鐵勒」。²⁵²簡而言之，第一段史料反映的，就是頡施跌利可汗時期，後突厥收復蒙古故地的歷史。

第二段史料的背景，是默啜可汗統治時期，黠戛斯密謀聯合突騎施消滅後突厥汗國，噉欲谷先發制人，越過積雪的山林突襲黠戛斯。

第三段史料的背景，突騎施密謀與唐朝聯兵，默啜可汗立兒子為移涅可汗，派他與噉欲谷西征突騎施，恰好這場遠征在漢文文獻中有零星的記載：

時(景龍二年)突厥默啜盡眾西擊突騎施娑葛，仁願請乘虛奪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²⁵³

初，默啜景雲中率兵西擊娑葛，破滅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後，常受其徵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自頡利之後最為強盛，自恃兵威，虐用其眾。²⁵⁴

²⁴⁹鈴木宏節，〈突厥トニユクク碑文箭記——斥候逃亡者〉，72-74。

²⁵⁰鈴木宏節，〈唐代漠南における突厥可汗國の復興と展開〉，頁 53。

²⁵¹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頁 96-98。；芮傳明，〈古突厥碑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277-278。

²⁵²片山章雄，〈Toquz Oγuz と「九姓」の諸問題について〉，頁 41。

²⁵³劉昫，〈舊唐書〉，卷 93，〈張仁願傳〉，頁 2982。

²⁵⁴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72。

從以上史料來看，默啜派兵西征的時間當為景龍二年(708)，而西征的影響有二。一方面，是默啜獲得大量部眾，使後突厥汗國的實力達到頂盛，另一方面，卻由於張仁願乘虛築三受降城，取漠南地，使默啜的軍隊再不能輕易南侵。

總括而言，可以從後突厥汗國擴張的歷史解釋三十姓與十二姓的關係。東突厥滅亡後，原先的東突厥十二部(姓)被安置在漠南，680年代由骨咄祿起兵建立後突厥。然而，骨咄祿畢竟並非頡利可汗嫡系，因此有需要建立十二姓突厥以外的其他名號。默啜可汗出兵突騎施，吸收了西突厥十姓，三十姓突厥的名號也大約在這個時期出現，並沿用到毗伽可汗時期。但是，十二姓東突厥加上十姓西突厥，餘下還有八姓。在起兵推翻後突厥的部落當中，包含了拔悉密與葛邏祿。其中，《新唐書·玄宗本紀》有開元三年「三姓葛邏祿來附」的記載，²⁵⁵而藏文 P1283 文書則記載了五姓拔悉密與回紇、葛邏祿聯手推翻突厥可汗。²⁵⁶如果採用這段記載，則說明三十姓突厥包括了東突厥十二姓、西突厥十姓，再加上三姓葛邏祿、五姓拔悉密，三十姓的名號直接沿用到毗伽可汗時期。突厥第二汗國不單只是第一汗國的繼承者，隨著部眾的擴大，後突厥可視作一個新的遊牧國家。²⁵⁷

²⁵⁵歐陽修，《新唐書》，卷5，〈玄宗本紀〉，頁124。

²⁵⁶森安孝夫，〈テ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われる北方民族——DRU-GU と HOR〉，頁6，9。

²⁵⁷鈴木宏節，〈三十姓突厥の出現——突厥第二可汗国をめぐる北アヅア情勢〉，頁15-20。

第四章、後突厥汗國與唐朝爭奪農牧混合地帶



後突厥汗國 680 年建立，745 年滅亡，不僅在文字、制度上直接影響了回紇汗國。後突厥與與唐朝爭奪農牧混合地帶的過程中，促成朔方軍的常駐化，在後突厥滅亡之際，後突厥汗國的殘部進入河北，輾轉成為安祿山麾下的武裝。如果說農牧混合地帶是遊牧國家和中國衝突的樞紐，後突厥就是以陰山北麓之黑沙為中心，往北收復漠北，往南入侵、掠奪，甚至局部控制農牧混合地帶。

(一)、黑沙南庭與後突厥的崛興

公元 7 世紀末，突厥人推翻唐朝羈縻統治，建立後突厥汗國。從頡跌利施可汗到默啜可汗，黑沙南庭作為突厥復興的基地，同時也默啜時期後突厥汗國的中心。以下試從後突厥的建國、黑沙的地理位置，來討論黑沙南庭於後突厥可汗的重要性。

調露元年，阿史德奉職、阿史德溫傅在單于大都護府發起反叛。永隆元年 (680)，二人改立阿史那伏念為可汗，後伏念被平定，阿史那骨咄祿率眾出走陰山，是為後突厥汗國的開始。有關突厥對唐輔羈縻統治的反抗，可以參考以下幾條史料：

調露元年，單于管內突厥首領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落始相率反叛，立泥孰為可汗，二十四州並叛應之。²⁵⁸

²⁵⁸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66。

永隆元年，突厥又迎頡利從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將渡河立為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之。²⁵⁹



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祿復反叛。²⁶⁰

以上史料皆出自《舊唐書·突厥傳》，第一條關於調露元年阿史德溫傅、奉職以擁護泥孰為號召，向唐朝發起反叛；第二條關於阿史德溫傅、奉職被平定後，翌年突厥人又推舉了阿史那伏念為可汗，再度發起叛亂；第三條，阿史那骨咄祿的「復反叛」，實際上永隆元年出走陰山後，在兩年後越過陰山攻擊農牧混合地帶。骨咄祿在永淳二年前便已脫離唐朝統治，詳細可參考《資治通鑑》及《新唐書·突厥傳》：

是歲(永淳元年)，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單于府之北境，殺嵐州刺史王德茂。²⁶¹

永淳元年，骨咄祿又反。

骨咄祿，頡利族人也，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世襲吐屯。伏念敗，乃嘯亡散，保總材山，又治黑沙城，有眾五千，盜九姓畜馬，稍彊大，乃自立可汗，以弟默啜為殺，咄悉訶為葉護。時單于府檢降校戶部落阿史德元珍者，為長史王本立所囚。會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諭還諸部贖罪，許之。至即降骨咄祿，與為謀，遂以為阿波達干，悉屬以兵。乃寇單于府北鄙，遂攻并州，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分掠定州，北平刺史霍王

²⁵⁹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66。

²⁶⁰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66。

²⁶¹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03，唐永淳元年條，頁 6412。

元軌擊卻之。又攻媯州，圍單于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師，攻蔚州，殺刺史李思儉，執豐州都督崔知辯。詔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備邊。²⁶²



以上，就骨咄祿南侵的時間《資治通鑑》與《新唐書》記為永淳元年，《舊唐書》記為永淳二年，現採《通鑑》及《新唐書》，以永淳元年為準。²⁶³阿史那伏念兵敗後，骨咄祿退保「總材山」，據「黑沙城」，學者們曾就總材山及黑沙的地理位置進行過不少討論。總材山在〈噉欲谷碑〉稱 čoray quzin(總材山、總材山谷)，在〈闕特勤碑〉稱為 čoray yis(總材山林)，而 čoray 有影子的意思，²⁶⁴綜合既有研究，可以確定總材山就是陰山北斜面。²⁶⁵

內蒙古中、西部陰山北麓分佈著淺栗土與棕鈣土，雖然含有腐植質，但已逐漸具有荒漠化跡象，適合林牧而不利農耕，²⁶⁶總材山和黑沙的名字很可能由此而來。黑沙城在〈噉欲谷碑〉作 qara qum (黑沙、黑沙漠)，又稱黑沙南庭。²⁶⁷嚴耕望認為黑沙當在磧口，靠近詰特犍泊，也就現今伊克湖。²⁶⁸芮傳明認為在白雲鄂博西北方的沙漠。²⁶⁹

黑沙的第三個候補地點，是介於伊克湖與白雲鄂博之間的百靈廟。百靈廟周邊存在著不同時期的岩壁畫，稱為烏蘭察布岩壁畫，而其包含若干突厥風格的作品。同時，當地東北和西南方也發現了突厥墓葬。²⁷⁰同時百靈廟東北 45 公

²⁶² 歐陽修，《新唐書》，卷 215，〈突厥傳〉，頁 6044。

²⁶³ 吳玉貴，《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 初版)，頁 491-492。

²⁶⁴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頁 95-96，118；芮傳明，《古突厥碑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初版)，頁 16-17；鈴木宏節，〈唐代漠南における突厥可汗國の復興と展開〉，頁 42。

²⁶⁵ 岩佐精一郎，〈突厥の復興に就いて〉，頁 106-107；芮傳明，《古突厥碑銘研究》，頁 16-17；鈴木宏節，〈唐代漠南における突厥可汗國の復興と展開〉，頁 42。

²⁶⁶ 任美鏗，《中國自然地理綱要》(北京：商務出版社，1979 初版)，頁 310-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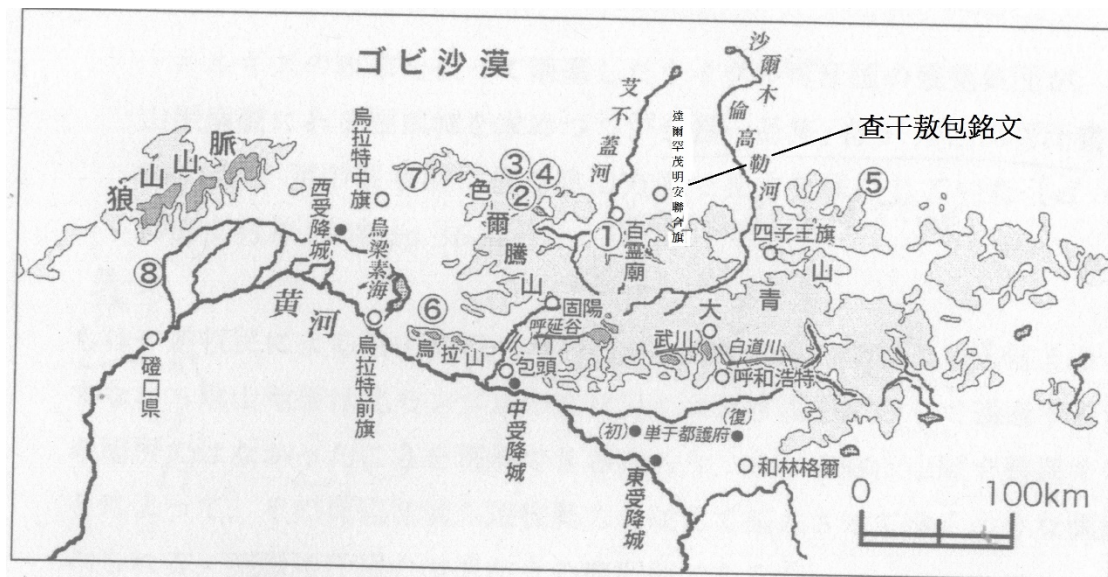
²⁶⁷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頁 95-96；岩佐精一郎，〈突厥の復興に就いて〉，頁 106-116。

²⁶⁸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頁 277-281。

²⁶⁹ 芮傳明，〈Coray 和 Kara Kum 方位考〉，頁 156。

²⁷⁰ 蓋山林，〈內蒙古百靈廟一帶突厥遺跡初探〉，725-760。

里的查干敖包蘇木銘文銘文寫道：「騎士像似的」光從這段突厥文並無法確認立碑者的身份，但從碑上發現阿史那氏的公山羊標記，剛可以推測立碑者估計為阿史那氏旁支。²⁷¹根據上述考古遺址來推測，黑沙很應該在伊克湖北方十五公里，白雲鄂博西方三十公里，以現今百靈廟為中心，半徑五十公里的範圍。²⁷²陰山北麓之黑沙為草原與農牧混合地帶之架橋，以此為中心，後突厥汗國往北收復漠北，往南入侵、掠奪，甚至局部控制農牧混合地帶。²⁷³



圖三、三受降城及陰山的突厥遺址群

修改自：鈴木宏節〈內モンゴル自治区発現の突厥文字銘文と陰山山脈の遊牧中原〉，頁 85。

後突厥對草原的再征服，始於骨咄祿北征鐵勒，收復於都斤山故地。由於漢文史料對是役的紀錄非常匱乏，因此〈噉欲谷碑〉的記載顯得尤為珍貴：

²⁷¹ 白玉冬、包文勝，〈內蒙古心嶺市突厥魯尼文查干敖包銘文考釋——兼論後突厥汗國「黑沙南庭」之所在〉，頁 79-83。

²⁷² 白玉冬、包文勝，〈內蒙古包頭市突厥魯尼文查干敖包銘文考釋——兼論後突厥汗國「黑沙南庭」之所在〉，頁 83-99；鈴木宏節，〈唐代漠南における突厥可汗國の復興と展開〉，頁 43-44。

²⁷³ 鈴木宏節，〈唐代漠南における突厥可汗國の復興と展開〉，頁 54。



我的可汗聽從了我本人瞰欲谷的話。他說：「按你想的指揮(軍隊)吧！」過 K ök öng，我率領眾人帶著乳牛和馱畜到達於都斤山。烏古斯人從土拉(河)而來。其軍是三千，我軍是兩千。我們交戰了。上天保佑，我們擊潰了他們，他們落入了河中。在潰逃的路上，據說又死了(許多)。之後，烏古斯人全都來了(即臣服了)。²⁷⁴

以上第一段史料，是骨咄祿時期，後突厥北伐鐵勒，一般認為在垂拱二年(686)與垂拱三年(687)之間。²⁷⁵過去的研究者受到鄂爾渾碑銘的影響，試圖重建一個靜態的突厥國家，因而傾向把骨咄祿北伐直接等同汗庭的北遷。²⁷⁶然而，透過新出土的考古遺址，上述說法開始受到挑戰，陰山北麓的黑沙到默啜時期仍是一個重要的中心，686 至 687 年的北征與其說是收復於都斤山故土，還不如說是為鞏固黑沙而採取的背後防禦。²⁷⁷後突厥了積極兼併草原上的其他部落，也在默啜可汗時期，以黑沙為中心，入侵農牧混合地帶：

我們是兩千人，我們兩軍。突厥人民從有史以來，突厥可汗從即位以來，未曾到過山東諸城和海洋，我向可汗請求帶軍出征。

我使(軍隊)到達山東諸城和海邊，(我軍)摧毀了二十三座城池，諸城成為一片廢墟。²⁷⁸

²⁷⁴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頁 98。

²⁷⁵ 岩佐精一郎，〈突厥の復興に就いて〉，頁 130-131；王世麗，王世偉，〈突厥的叛亂與安北都護府南遷〉，《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6:4，(2006，北京)，頁 56。

²⁷⁶ 岩佐精一郎，〈突厥の復興に就いて〉，頁 130-132；護雅夫，〈突厥と隋・唐兩王朝〉，《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第 1 編，(東京：山川出版社，1967 初版)，頁 187-188。

²⁷⁷ 鈴木宏節，〈唐代漠南における突厥可汗國の復興と展開〉，頁 50-53。

²⁷⁸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頁 98-99。

以上史料出自〈噉欲谷碑〉，是有關默啜統治時期，後突厥南侵山東的紀錄。有關默啜可汗入侵山東，還可從其他突厥文碑銘中找到互相對照的紀錄：

我(闕特勤)十四歲時任達頭人民上面的設。我同我叔父可汗一起，前面(東面)一直征戰到黃河(yašil ögüz)和山東(santung)平原，後面(西面)一直征戰到鐵門(關)，並越過曲漫山，一直征戰到點戛斯人的地方。²⁷⁹

以上出自〈毗伽可汗碑〉東面第 15 條，記載 708 年突厥人征討點戛斯，〈闕特勤碑〉東面第 17 條也有相同的紀錄。²⁸⁰

除了突厥文史料，漢文史料也有提到默啜可汗如何征討、收編其他游牧集團。早在萬歲通天元年(696)，默啜可汗便借武后的名義，重新兼併奚和契丹：

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攻陷營府，默啜遣使上言：「請還河西降戶，即率部落兵馬為國家討擊契丹。」制許之。默啜遂攻討契丹，部眾大潰，盡獲其家口，默啜自此兵眾漸盛。²⁸¹

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後，常受其徵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²⁸²

默啜於是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言。思言對賊不屈節，特贈鴻臚卿，仍命左屯衛大將軍張仁願攝右御史臺大夫，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仁願始於河外築三受降城，絕其南寇之路。²⁸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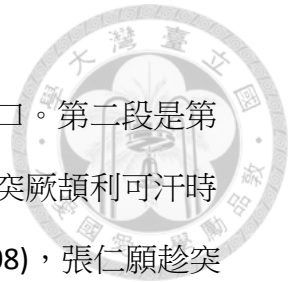
²⁷⁹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頁 155。

²⁸⁰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頁 113，125。

²⁸¹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68。

²⁸²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72。

²⁸³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72。



以上第一段引文，是默啜可汗借武后的名義攻擊契丹並掠奪人口。第二段是第二條則是這次用兵的後續發展。軍事上的勝利使突厥恢復至東突厥頡利可汗時期的強盛，奚和契丹再度受其役屬。第三條史料是景龍二年(708)，張仁願趁突厥大軍西征突騎施，在漠南修築三受降城，阻絕後突厥南侵之路。是年後突厥對突騎施的征討，也見於前述〈噉欲谷碑〉引文。

從以上諸史料，大概可見後突厥全盛時期的勢力範圍，往東征服奚和契丹，往北征役黠戛斯，西方準葛爾盆地雖未直接納入後突厥汗國的統治，但默啜透過西征把三姓葛邏祿、五姓拔悉密強制遷至漠北，組成所謂三十姓突厥。

除了致力經營草原地帶，後突厥也積極進攻農牧混合地帶，例如《資治通鑑》就提到默啜可汗山東出兵：

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太后不許。默啜怒，言辭悖慢……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以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四萬斤，并許其昏。²⁸⁴

就以上交涉的年份，《資治通鑑》記為神功元年(697)，《舊唐書》載為聖曆元年(698)，現在以《通鑑》為準，至於給予突厥的穀種，則有「四萬斛」、「種子四萬碩」、「粟田種十萬斛」、「粟三萬石」等不同說法，目前難有定論。²⁸⁵然而，武后雖然答應了默啜的條件，卻無法促成預期的和平，默啜可汗提出以下五個理由，繼續揮兵南下：

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謂閻知微等曰：「我欲以女

²⁸⁴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06，唐神功元年春三月，頁 6516。

²⁸⁵吳玉貴，《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中冊，頁 645-646。

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此豈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於別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發兵襲靜難、平狄、清夷等軍……²⁸⁶

默啜移書數朝廷曰：「與我蒸穀種，種之不生，一也。金銀器皆行濫，非真物，二也。我與使者緋紫皆奪之，三也。繪帛皆疏惡，四也。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為昏，五也。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²⁸⁷

以上，就是聖曆元年默啜可汗入侵的始末。〈瞰欲谷碑〉的 *santung*，源自漢文的「山東」，也就「太行山以東」，這在學界已成為共識。²⁸⁸至於 *taluy ögüz*，芮傳明譯為大洋，²⁸⁹耿世民譯為海洋，²⁹⁰但鈴木宏節認為是「如海的河」，*taluy* 是漢語「大灑」的借用語，因此 *taluy ögüz* 實際上就是灑水，也就是唐代的桑乾河。²⁹¹由此可見，默啜應該是取道大同盆地桑乾河流域，進攻太行山以東的河北平原。

從大同盆地進入河北平原的交通線有兩條，一是自東北繞過太行山的上谷道，二是從東南到達中山城，穿越太行山的飛狐道。公元 4 世紀末，後燕與北魏的戰爭便圍繞著這兩條交通線而展開。其後，北魏為了穩定控制河北平原的農業資源，修築了自平城到中山城的道路，而透過對河北平原的經營，北魏最終從傳統的部落組織走向了中原式的國家。²⁹²雖然後突厥並不如北魏發展成中原式的國家，但透過北魏時期的歷史，可以側面說明兩個事實。第一，默啜取

²⁸⁶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06，唐聖曆元年秋八月戊子條，頁 6530-6531。

²⁸⁷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06，唐聖曆元年秋八月戊子條，頁 6531。

²⁸⁸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頁 98-99；鈴木宏節，〈唐代漠南における突厥可汗國の復興と展開〉，頁 48。

²⁸⁹芮傳明，《古突厥碑銘研究》，頁 279。

²⁹⁰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頁 98-99。

²⁹¹鈴木宏節，〈唐代漠南における突厥可汗國の復興と展開〉，頁 48。

²⁹²前田正名著，李凭、孫耀、孫蕾譯，《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頁 169-187。

道大同盆地的目的，很可能如北魏一樣，是針對河北平原的農業資源。第二，農牧混合地帶誠為一個交通樞紐，特別是農牧混合地帶南部的大同盆地，是為連結太行山以東農產區的重要據點。無論如何，在考慮後突厥控制農牧混合地帶的動機時，除了經濟上的誘因，也不能忽略當地作為交通樞紐的重要優勢。

黑沙南庭對後突厥的重要性，在於其靠近農牧混合地帶，便於突厥人向農牧混合地帶發動進攻。有關後突厥經略農牧混合地帶的目的，則需從游牧經濟的不足來加以討論——在歐亞草原，純游牧的狀況並不如定居人群所想的普遍，²⁹³游牧民同時也依賴掠奪、貿易、農業等輔助性經濟，²⁹⁴其君主透過壟斷以上這些外部資源，來建立、維持其威權。²⁹⁵游牧國家就擁有敲詐、掠奪中國的「外部邊界戰略」，從中國取得資源，再分配這些資源來凝聚不同的部落。²⁹⁶從默啜與武后的交涉可知，後突厥希望取代農牧混合地帶的人口、工藝品、農業資源。當談判破裂，默啜揚言「欲取河北」，所指的是黃河與陰山之間宜農宜牧的細長地帶。²⁹⁷不僅如此，默啜甚至重施東突厥之故技，欲立閻知微為傀儡，替他控制農牧混合地帶。

總而言之，後突厥積極掠奪、控制農牧混合地帶，正是其建牙黑沙的目的。另一方面，大同盆地作為交通樞紐，恐怕也是默啜可汗致力控制當地的原因之一。從陰山北麓的考古遺址來看，黑沙南庭到默啜時期都仍是一個重要的中心。²⁹⁸後突厥以黑沙為中心，往東控制松漠，往南控制入侵農牧混合地帶，往北征服蒙古高原，往西征討突騎施。

²⁹³ Anatoly M. Khazanov translated by Julia Crookenden,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pp.17-25.

²⁹⁴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46-52；山田信夫，《北アヅア游牧民族史研究》，頁 225；林俊雄，〈掠奪・農耕・交易から觀た游牧國家の發展：突厥の場合〉，頁 110-112。

²⁹⁵ Anatoly M. Khazanov translated by Julia Crookenden,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pp.157-158.

²⁹⁶ 巴費爾德(Thomas Barfield)著，袁劍譯，《危險的邊疆：游牧帝國與中國》，頁 16，21-40。

²⁹⁷ 林俊雄，〈掠奪・農耕・交易から觀た游牧國家の發展：突厥の場合〉，頁 122-113。

²⁹⁸ 鈴木宏節〈内モンゴル自治区発現の突厥文字銘文と陰山山脈の游牧中原〉，頁 67-100。

(二)、從黑沙南庭到於都斤山



從默啜可汗到毗伽可汗，後突厥與唐朝從且戰且和，之後後突厥向唐朝爭取和親及互市。同時，可汗的牙帳也從黑沙南庭移到於都斤山。為釐清雙方交戰的過程和汗庭行往漠北所代表的意義，不僅要借助漢文、突厥文的史料，更要對蒙古高原上的遊牧生業有所理解。

有關默啜晚期與唐朝的戰爭跟和談，要從景龍二年開始談起。景龍二年，張仁願乘默啜四征突騎施築三受降城。先天元年(712)，後突厥遣使求和。後突厥向唐親請求和親，派出楊我支特勤娶唐朝宗女：

乙未，上御安福門，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而會上傳位，婚竟不成。²⁹⁹

從中可見景雲二年睿宗准許楊我支特勤娶金山公主，但因為翌年玄宗繼位，和親取消。同年，受後突厥役屬的奚和靺從東北方入侵：

壬辰，奚、靺犯塞，掠漁陽、雍奴，出盧龍塞而去。幽州都督薛訥追擊之，弗克。³⁰⁰

開元元年(714)，默啜再派楊我支特勤和親：

八月，突厥遣王子楊我支來求婚，以蜀王女南和縣主下嫁楊我支……³⁰¹

²⁹⁹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10，先天元年春正月乙未條，頁 6671。

³⁰⁰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10，頁 6678。

³⁰¹王欽若，《冊府元龜》，卷 979，頁 11499-2。

楊我支死，詔宗親三等以上弔其家。是時突厥再上書求昏，帝未報。³⁰²

這次，玄宗雖然答應楊我支特勤娶南和縣主，但由於楊我支去世而告終，《新唐書》並沒寫明楊我支特勤去世的年份。而在先後兩次談判之間，後突厥與唐朝後突厥與唐朝的戰爭並未停止：

先天中，突厥圍北庭，詔(褚)璆持節監總督諸將，破之。³⁰³

是時，佺帥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發兵二萬、騎八千，分為三軍，以襲奚、契丹……虜追擊之，士卒皆潰。佺、以悌為虜所擒，獻於突厥，默啜皆殺之；楷洛、可利脫歸。³⁰⁴

以上第一段史料引自〈新唐書·褚遂良傳〉附褚璆傳。吳貴玉認為在「先天中」，即是先天之末。³⁰⁵換言之，後突厥征突騎施應該從先天二年(713)後半持續到開元元年(714)。第二段出自《資治通鑑》，可見是年的戰場不僅有西北的北庭，還擴大到東北邊疆，鄰近奚和契丹的住地。大體而言，景元元年到開元元年，後突厥和唐朝都處於且戰且和的狀態。這幾年的戰場分別在西北方北庭、東北方華北北沿，這是由唐朝三受降城在呼和浩特平原一線建立起鞏固的防禦，使後突厥難以直接越過陰山進攻。突厥諸部將攻擊目標放到北庭都護府，將東北戰場交由奚、靺、契丹等屬部來負責。

開元二年(715)，默啜派移涅可汗、同俄特勤、火拔頡利發等圍北庭未果，戰況逐漸轉向對後突厥不利：

³⁰²歐陽修，《新唐書》，〈突厥傳〉，卷 215，頁 6048。

³⁰³歐陽修，《新唐書》，卷 105，〈褚遂良傳·附褚璆傳〉，頁 4029-4030。

³⁰⁴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10，唐先天元年夏五月條，頁 6672。

³⁰⁵吳玉貴，《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下冊，頁 902。

開元二年，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勤、妹婿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北庭。右驍衛將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勤於城下，斬之，虜因退縮。火拔懼不敢歸，攜其妻來奔……³⁰⁶



在火拔部出走的同時，其他部落也相繼降唐，當中包含了西突厥十姓、葛邏祿，還有其他一些被征服部落：

十姓左五咄姓、右五弩失畢俟斤皆請降，葛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大漠都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落匭雞、玄池都督蹋實力胡鼻率眾內附，詔處其眾於金山。³⁰⁷

開元三年，西域及漠北突厥部落大批降唐。³⁰⁸開元四年(716)，默啜討伐拔野古，回師途中遭遇突襲而死：

四年，默啜又北討九姓拔曳固，戰于獨樂河，拔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拔曳固逆卒頡質略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便與入蕃使郝靈荃傳默啜首至京師。³⁰⁹

毗伽可汗即位後，原本投降唐朝的部落意圖北返，在邊疆觸發新的武裝衝突：

疏奏，未報；降戶跌思泰、阿爛悉等果叛。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王峻引并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追擊叛者，破

³⁰⁶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72。

³⁰⁷歐陽修，《新唐書》，卷 215，〈突厥傳〉，頁 6048-6049。

³⁰⁸ 吳玉貴，《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下冊，頁 1014。

³⁰⁹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73。

之，斬獲三千級。³¹⁰

王峻，開元中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屬突厥默啜為九姓所殺，其下酋長多款塞投降，置之河曲內。俄而小殺繼立，降者漸叛。敕峻帥并州兵濟河討之……³¹¹

先是，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戶兵仗，令渡河而南，降戶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為巡邊使，降戶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還之，降戶得之，遂叛。³¹²

九姓之亂(單于)也，公四月度磧，過白檉林，收火拔部帳，納多真種落，彌川滿野，懷惠忘亡漠南諸軍，隲其計也。³¹³

六年，春，正月，辛丑，突厥毗伽可汗來請和；許之。³¹⁴

以上第一、二段史料分別出自《資治通鑑》、《冊府元龜》，顯示跌跌、阿爛悉意圖北歸突厥，王峻發現其圖謀並發兵追擊。第三段史料出自《資治通鑑》，顯示單于大都護府復置後，該府轄下的降部在開元四年發起叛亂，意圖北返。第四段史料出自〈撥川郡王碑〉，記載論弓仁率軍渡漠，抓回北逃的火拔、納多真部落。最後一段史料同出於《資治通鑑》，記錄開元六年(718)毗伽可汗向唐朝求和。

然而，短暫的和平在開元八年(720)便告結束。戰爭的導火線仍然是歸唐降

³¹⁰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11，唐開元四年冬十月甲辰條，頁 6721。

³¹¹王欽若，《冊府元龜》，卷 398，頁 4737-2。

³¹²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11，唐開元四年冬十月條，頁 6721-6722。

³¹³李昉，《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據，卷 891，頁 4689-1。

³¹⁴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12，唐開元六年春正月辛丑條，頁 6731。

部北逃：



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及跌部落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密謀奏請誅之。誘勺磨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戶殆盡。拔曳固、同羅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之側者，聞之皆恐懼。³¹⁵

辛未，突厥寇甘、涼等州，敗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掠契苾部落而去。³¹⁶

八年冬，御史大夫王晙為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藩，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稽落河上。³¹⁷

丙戌，突厥毗伽復使來求和。³¹⁸

從第一條史料可見，這次衝突的導火線同樣是歸唐部落密謀投奔後突厥。而從第二條史料，後突厥進攻甘、涼的目的，也是沖著當地降唐部落而來。從景雲到開元元年，後突厥和唐朝都在爭奪農牧混合地帶的人口，不論是農業人口還是遊牧人口。即使對唐朝這樣的農業帝國來說，它仍需要依靠歸降的遊牧民來充實邊疆，達到其國防目的。與前幾年不同的是，開元八年冬唐朝準備發動拔悉密、奚、契丹，直搗毗伽可汗漠北牙帳，這也是玄宗朝最後一次渡漠出擊。然而，各軍並未如期會師，後突厥擊破悉拔密，分碎了王晙的計謀。開元九年(721)，降戶康待賓之亂被平定。同年，毗伽可汗遣使請和，希望與唐締結和親。雖然毗伽可汗最後沒娶得唐朝公主，但經過六年的努力，終於在開元十五

³¹⁵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12，唐開元八年夏六月條，頁 6740-6741。

³¹⁶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12，唐開元八年冬十一月辛未條，頁 6742。

³¹⁷劉昫，《舊唐書》，卷 194，〈突厥傳〉，頁 5174。

³¹⁸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12，唐開元九年春正月丙戌，頁 6744。

年(727)爭取到在西受降城互市。

以上，大概就是從武后到玄宗初年，後突厥與唐朝從戰爭走向和平互市的經過。為討論上述的歷史現象，必需回到游牧生業和游牧國家的限制。理論上，游牧民帶著牧畜進行全年有系統的遷徙，其經濟以自給自足為主。³¹⁹同時，由於畜群大小、牧畜品種、牧地優劣的差別，游牧集團一年的移動次數和移動距離亦有所不同。³²⁰然而，游牧民除了需要放牧的草場，也需要靠狩獵補充食物來源，需要木材製作弓矢。因此，兼備森林與牧地的山林地帶顯得格外重要。以漠北的杭愛山來說，當地擁有漠北最豐富的山林和水草資源，自古以來為就是漠北的游牧中心。在漠南，陰山山脈曾擁有豐富的森林資源，為匈奴、鮮卑等游牧民提供木材和獵物，與杭愛山並稱戈壁南北兩大游牧中心。³²¹

以上僅為一般游牧民的狀況，如涉及統治階級與游牧國家，情況會變得更複雜一些。游牧社會的階序化產生自游牧部落與外在世界的關係，這「外在世界」一開始可能是其他游牧集團，漸漸擴展到草原之外的農耕民和狩獵民。游牧君主透過壟斷外部資源，來建立、維持其威權。例如，壟斷商品交易，役使外來人口——釋奴和其他部落的成員。奴隸可能被束縛在土地上，但也可能如同其他依附者，被武裝起來充當護衛。君主藉其勇力、慷慨，換取戰士們的忠誠。這些侍衛專司戰鬥，不事生產，必需藉戰爭掠奪維持給養，促成滾雪球式的對外擴張。換而言之，游牧國家的統治階級產生於社會需求，同時又為維持統治而製造社會需求。³²²為了維持統治階級和其游牧國家的延續，統治者得透過各種手段取得外界資源——農業人口、手工業者、農業品、工藝品和商業稅。位處準葛爾盆地的西突厥透過控制天山以南的綠洲國家來收取商稅，位處蒙古的東突厥乃至後突厥則透過戰爭，從中國掠奪農業人口和農業資源。因

³¹⁹ Anatoly M. Khazanov translated by Julia Crookenden,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pp.16.

³²⁰ 吉田順一，〈モンゴルの伝統的な游牧の地域性〉，《史滴》，第5号，(1984，東京)，頁62-84；Sevyan Vainshtein, translat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Nomads of South Sibe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84-85.

³²¹ 吉田順一，〈ハンガイと陰山〉，頁48-61；

³²² Anatoly M. Khazanov translated by Julia Crookenden,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pp148-149, 157-158, 161.

此，在討論東突厥、後突厥汗庭的遷移時，不妨採取地理與軍事的角度。

坐鎮漠北抑或汗庭南移，對 7 世紀末、8 世紀初的後突厥乃至更 6 至 7 世紀的東突厥來說，都是汗國必需面對的兩難。東突厥始畢可汗脫離隋朝統治，卻沒有將牙帳遷回漠北，反映 6 世紀後半漠南的重要性大增。³²³東突厥末年的三位可汗及後突厥早期的兩位可汗，都透過扶植當地勢力、擄掠漢地人口的方法，經營在地的農業資源。³²⁴從東突厥始畢、處理、頡利可汗建牙定襄，後突厥頡利施可汗、默啜可汗建牙黑沙，都可看出遊牧國家對於支配農牧混合地區的積極企圖。然而，陰山以南最大的缺點，就是距離唐朝過近。³²⁵因此，唐朝建三受降城後，後突厥與唐朝間的形勢便告逆轉，也因為同樣的原因，當薛延陀叛變，東突厥無路可退的時候，便被唐朝一舉消滅。對於東突厥的覆亡，後突厥有很深刻的反思，毗伽可汗如此戒示突厥人：

沒有比於都斤山林再好的地方。統治國家的地方是於都斤山林。
住在這裡，我同唐人建立了關係。他們慷慨地給了(我們)這麼多金、銀、糧食、絲綢。唐人的話語甜蜜，寶物華麗(原文：柔軟)。他們用甜蜜的話語、華麗的寶物誘惑，使得遠處的人民靠近(他們)。當住了以後，他們就心懷惡意。他們不讓真正英明的人、真正勇敢的人有所作為。一人有錯，連其族人、人民、後輩都不饒恕。由於受到他們甜蜜的話語、華麗的寶物的誘惑，突厥人民。你們死了許多人。突厥人民，當你們一部份不僅要右面(南面)住在總材(Chughay)山(陰山)，並要住在平原時，於是惡人就這樣教唆部份突厥人民道：「凡住遠處的給壞禮物，凡住近處的給好禮物。」他們就這樣教唆了。無知的人聽信了那些話，走近

³²³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頁 153。

³²⁴林俊雄，〈掠奪・農耕・交易から見た遊牧國家の發展：突厥の場合〉，頁 112-118，123-125；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頁 153。

³²⁵林俊雄，〈掠奪・農耕・交易から見た遊牧國家の發展：突厥の場合〉，頁 129。



了(他們)，於是你們死了許多人。如果去那個地方，突厥人民你們就將滅亡；如你們住在於都斤山地方，(從這裡)派去商隊，那就沒有憂患。如住在於都斤山，你們將永保國家。突厥人民，(但)你們自滿了，你們不考慮會有飢餓，你們一旦飽食，就不考慮飢餓。由於你們這樣，你們不聽曾養育(你們的)可汗的話，到處走散。(結果)你們全都毀滅在那裡。你們中剩下的到處(流徙)，處境困難(直譯：瘦死)。³²⁶

同碑東面第 23 至 24 行寫道：

神聖的於都斤山林的人民，你們走了，你們往東去的走了，你們往西去的走了；在你們去的地方(所得到)的好處就是：你們血流如水，你們的骨堆如山，你們高貴的男兒成了奴隸，你們清白的女兒成了女婢。由於(你們)無知，由於你們無義，我叔可汗死去了。³²⁷

以上第兩段史料，出自毗伽可汗悼亡弟的〈闕特勤碑〉，但同時也見於〈毗伽可汗碑〉。第一段是肯定於都斤山的地位，突厥人勿受唐朝誘惑，勿離開於都斤山。突厥不主動南侵，而由可汗從於都斤山派出商隊和唐朝交易。第二段史料，則是斥責默啜晚期降唐的突厥人。由於毗伽可汗時期的突厥三大碑是現今發現最完整的突厥銘文，因此早年的研究者使用這批材料時，容易重建出一個以聖山於都斤山為中心，靜態的突厥汗國。³²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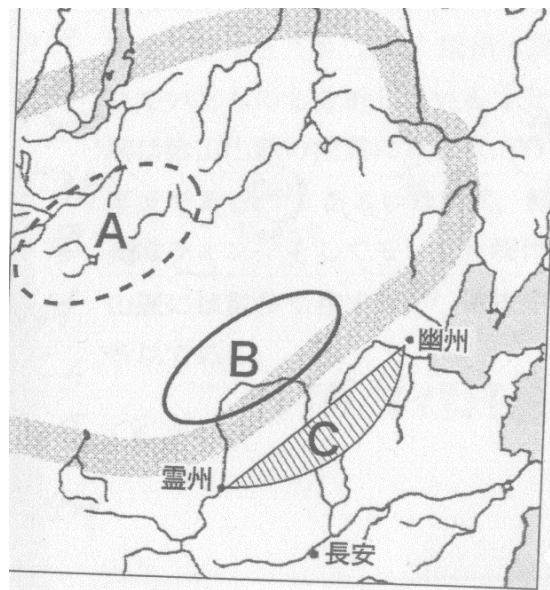
從近十年的考古報告和歷史研究來看，景龍以前，後突厥對唐朝尚有較大

³²⁶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頁 117-119。

³²⁷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頁 127。

³²⁸ 護雅夫，〈突厥の国家構造〉，頁 24-29。

的優勢，他們是以陰山北麓黑沙南庭作為連結草原與農牧混合地帶的架橋。不僅如此，更以黑沙為中心，往東、往南、往北及往西征戰，建立「控弦四十萬」的全盛時期。可以說，後突厥選擇黑沙，正因為當地可以滿足其南進企圖，而戰略上又較定襄安全。換句話說，黑沙是定襄與於都斤山中間的過渡階段。突厥復國後雖然警惕提防唐朝，但沒馬上放棄掠奪、控制農牧混合地帶的誘因，因而選擇建牙黑沙。直到對唐朝的軍事形勢逐漸失利，後突厥才重新遷回於都斤山。而由於突厥文碑銘具有政治宣傳的性質，³²⁹當然只會片面提及於都斤山的好處。另一方面，毗伽可汗的對唐政策被後來的回紇繼承，由此帶來了草原歷史下一階段的展開。



圖四、南北蒙古的遊牧中心概念圖

圈內為突厥汗國的範圍；A 為杭愛山脈、肯特山脈；B 為陰山及周邊草原；C 為農牧混合地帶。

資料來源：鈴木宏節〈內モンゴル自治区発現の突厥文字銘文と陰山山脈の遊牧中原〉，頁 89。

³²⁹ Peter Golden, "The Turk Imperial Tradition in the pre-Chinggisid era", pp24.



(三)、8 世紀以降的草原與農牧混合地帶

開元十五年，唐朝與後突厥建立互市後，雙方維持了短暫的和平。其後，毗伽可汗遭毒殺，後突厥陷入內戰，並以白眉可汗被殺而宣告滅亡。然而，自東突厥、後突厥開始蘊釀的變革最終由回紇完成，並啟發 10 世紀的契丹，開啟草原歷史的新階段。在南方的農牧混合地帶，無論是為了防範後突厥而設的朔方軍，還是在後突厥滅亡之際吸收大量粟特系突厥人的河朔三鎮，都成為左右中晚唐歷史的重要勢力。以下，將就這上述兩條歷史脈絡，加以進一步的討論。

無論是從中國征服王朝、遊牧封建制還是內陸歐亞型國家的角度，都可以看出 10 至 13 世紀草原遊牧社會的變革，以上變革大概包含：一、文字的發明；二、城池的建立；三、體系化的宗教；四、解散並重編部落。以上第一、二、三點都可以 8 至 9 世紀的回紇汗國，甚至更早期的後突厥汗國。

蒙古草原上的遊牧民首先接觸到體系性的宗教，是在東突厥佉鉢可汗時期。有別於後來的回紇，東突厥所接受的不是摩尼教而佛教：

齊有沙門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謂佉鉢曰：「齊國富強者，為有佛法耳。」遂說以因緣果報之事。佉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于齊氏，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并十誦律。佉鉢亦躬自齋戒，遠塔行道，恨不生內地。³³⁰

另一則有關東突厥佛教的文字史料，是 1956 年蒙古人民共和國發現的布古特碑。布古特靠近一突厥墓葬，碑文用佛教草寫體粟特文書寫，提到「一個又大

³³⁰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 84，〈北狄·突厥傳〉，頁 1865。

又新的伽藍建築」。³³¹布古特碑估計建於 570 至 580 年，從這個考古發現可以確認三件事：一、6 世紀粟特人進入東突厥，並深入貝加爾湖以北安哥拉河 (Angara) 流域；二、在後突厥發明突厥文以前，漠北游牧社會就引入粟特文作為通用文字；三、印證《隋書》佗鉢可汗修築伽藍的說法，並證明 6 世紀末突厥貴族間流傳著佛教信仰。當然，就有關第三點，碑文也僅是證明佛教信仰的存在，而無法證明佛教取代作為主流信仰的薩滿教。³³²

接著，有關於 7 至 9 世紀草原上的城池。事實上，在突厥系遊牧民開始築城之前，草原上就已經出現了城池。東突厥最早的城池，是由隋朝授予的定襄城。因此，定襄實際是中原王朝為了經營農牧混合地帶而建設的，後來才為了邊疆政策的考慮，安置東突厥啟民可汗於此。漠北出現城池，則要到唐龍朔三年修築瀚海都護府城。1975 年，Qara Balyasun 遺址出土〈大唐安西阿史夫人壁記〉，該壁記估計為 667 年或 679 年所作，可做為唐朝曾在漠北築城的間接證據。而在壁記東北 500 公尺的地方，則是回紇汗國都城斡魯朵八里 (Odru Baliq)，也就是漠北遊牧民主動修築的第一座城池。³³³當然，修建都城的意見並不是到了回紇時期才憑空出現的，後突厥汗國便有過築城的議論：

小殺又欲修築城壁，造立寺觀，瞰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少，不敵中國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改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為唐所併。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³³⁴

³³¹護雅夫著，林慧芬譯，〈遊牧國家的「文明化」——突厥遊牧國家〉，頁 223。

³³²護雅夫著，林慧芬譯，〈遊牧國家的「文明化」——突厥遊牧國家〉，頁 222-224，242-249；護雅夫著，吳慶顯譯，〈索格底人在蒙古地區諸游牧國中所扮演的角色——一個新發現資料的介紹〉，頁 294-295。

³³³石見清裕、森安孝夫，〈大唐安西阿史夫人壁記の再讀と歴史学的考察〉，《內陸アヅア言語研究》，第 13 号，(豐中市，1998)，頁 93-107-110。

³³⁴杜佑，《通典》，卷 198，頁 5440。



毗伽可汗雖然聽從噉欲谷的意見放棄築城，但這計畫最終由後繼的回紇來實現了。回紇的城池有部份是為了唐朝和親公主而修築，用來安置投奔回紇的農耕民。但整體來說，回紇的城池具有較強的商業、手工業與宗教性格，不像後世契丹的城池具有明顯的農業性格。³³⁵

可以說，遊牧民的都城與體系性宗教蘊釀於突厥，而完成於回紇。文字方面，東突厥在漠北遊牧社會引入文字，到後突厥發明出突厥文，而突厥文又為之後的回紇所沿用。從內陸歐亞整體的視角來看，承接著 6 至 7 世紀歐亞草原三大國的建立，8 至 9 世紀回紇、突騎施、可薩汗國分別統治著蒙古、準葛爾和南俄草原，草原陸續出現都城，交通網和商業圈擴大，在以上「文明化」持續進行的同時，遊牧社會開始階序化，從原有的氏·部族中分離出統治階級。以上 8 至 9 世紀遊牧社會的「文明化」，可以視作古代部族聯合體，走 13 世紀遊牧封建制的過渡階段。³³⁶

如果把遊牧國家與征服王朝視為歷史的兩個階段，從公元前 3 世紀的匈奴到公元 9 世紀的回紇屬於遊牧國家，公元 10 世紀以降遼、金、元、清屬於征服王朝。10 世紀契丹部落酋帥或掠奪人口，或安置難民，建立自己的部曲勢力，並在戰爭中作為軍事領導者而崛起，最後解散了遊牧國家舊有的部族制，透過人為編整部落，建立可汗的君主專制。因此，9 至 10 世紀可視為北亞從古代進入中世的轉折。³³⁷然而，以上的變革決非在 10 世紀憑空出現。除了重整部落組織一項，其他的社會變化都可以追溯到回紇，乃至更早的後突厥。由於後突厥和回紇有別於匈奴、鮮卑等早期遊牧國家，但又還沒發展成完全的征服王朝，因此將之為後期遊牧國家，以茲區別。³³⁸

³³⁵ 田坂興道，〈漠北時代に於ける回紇諸城郭に就いて〉，《蒙古學報》，第 2 號，(東京，1941)，頁 221-223。

³³⁶ 山田信夫，《北アツア遊牧民族史研究》，頁 230-250；

³³⁷ 田村実造，〈北亜に於ける歴史世界の形成と展開〉，頁 44-45，55-56。

³³⁸ 村上正二著，鄭欽仁譯，〈征服王朝〉，頁 109-123。

如果從統治技術來看，8 至 9 世紀絲路上交通、商業與情報網絡的擴大，稅制的建立，文字的發明使文書行政成為可能，這些都啟發了 10 世紀的內陸歐亞型國家。換言之，即是絲路的財富加上遊牧騎馬民族的軍事實力，建立起少數遊牧民統治多數農耕民、都市民的技術。³³⁹以上提及發明文字、修築都城、引入體系化宗教，雖然只有第一項由後突厥來完成，但其餘兩項在前述毗伽可汗與噉欲谷的對話中可見端倪。而自開元八年後，後突厥與唐朝回到和平狀態，並積極尋求互市，也可以看出後突厥放棄掠奪手段，改以控制貿易的方式來取得外界資源。

後突厥汗國的興亡與變革，不僅影響著往後的漠北往後數百年的歷史，也透過南方的農牧混合地帶，左右著中國歷史。後突厥滅亡後，一部份粟特系突厥人被安置於凜州，這些人後來被編進安祿山的軍隊。不僅如此，唐朝境內的突厥、同羅部落，以至殘留在六胡州的粟特系突厥人，都先後加入了安祿山的軍隊。³⁴⁰安史之亂結束後，河朔三鎮得以維持半獨立狀態，在當地產生一個文化獨特的地區，為後世的遼朝提供基礎。³⁴¹遼朝的建立，一方面受到回紇的啟發，代表北亞從古代進入中世時期，而另一方面，中唐以後河北胡漢混雜的文化也為遼朝的建立提供了社會基礎，是以契丹人建立的漢城帶有更多的農業性而非商業性。³⁴²

在 7 世紀末 8 世紀初，唐朝與後突厥的戰爭中，唐朝為抵擋後突厥的進攻，以行軍長期駐紮邊疆，逐漸演變為朔方軍，這支軍隊成為日後平定安史之亂的主力。

要討論是朔方道行軍的建成，需要從唐代行軍的鎮軍化談起。在唐朝確立節度使體制前，主要以作為戰略機動兵力。行軍的任務可以是進攻敵國，或者

³³⁹ 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頁 307-310。

³⁴⁰ 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歴史的展開》(吹田：關西大學出版社，2011 年 2 版)，頁 110-118。

³⁴¹ 竺沙雅章著，吳密察譯，《征服王朝論的時代》(台北：稻香出版社 2015 年 2 版)，頁 14-21。

³⁴² 坂田興道，〈漠北時代に於ける回紇諸城郭に就いて〉，頁 222。

防禦邊疆，其設置具有臨時性質，戰後即罷，兵源來自各鎮戍的府兵。³⁴³高宗鳳儀年間唐朝在邊境戰爭漸處不利，特別是鳳儀三年(697)唐軍在青海大敗，迫使唐朝轉用防禦戰略。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反映了一個名「行」實「鎮」的狀況。³⁴⁴當然，從行軍到藩鎮是一個連續漸變的過程。考慮社會、軍事、政治等狀況，藩鎮產生的原因大概有：一、土地兼併，流民日增，府兵制難以徵兵；二、鳳儀至開元初年，唐朝幾乎與周邊各族都進行著激烈的戰爭，在東北、北方、西方和西北都被迫採取守勢；三、安史之亂後朝廷允許節度使自調兵食，造成藩鎮尾大不掉。³⁴⁵

單就朔方軍來看，朔方軍源自唐朝為防禦後突厥汗國而派出的行軍，後來走向常駐化、軍鎮化。其中，朔方軍的常駐化、軍鎮化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薛懷義出任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標示著朔方軍的出現。第二階段在魏元忠至沙吒忠義任內，「朔方」、「靈武」軍號混用。這段期間，大總管前後接任，軍號中「行軍」的字樣亦被拿去。第三階段，張仁願接任大總管，築三受降城，反映唐朝經營當地的決心。同時，該軍的軍號統一定為「朔方」。最後，開元九年(722)平康待賓之反，同年張說出任為首位朔方節度使，朔方軍正式成為藩鎮之一，並在開元年間逐漸取得了營田、冶鹽、押諸蕃部落、監牧、水運、宮苑等多方特權。³⁴⁶樊文禮〈唐朔方節度使略論〉認為，早在開元九年前，朔方行軍大總管已開始節制轄境內之軍城，權力無異於節度使。³⁴⁷

然而，單靠朔方道行軍並沒有辦法有效阻擋後突厥的進攻。直到景龍元年張仁願築三受降城後，雙方形勢才告逆轉，唐朝重新佔有農牧混合地帶。三受

³⁴³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初版)，頁，5-22。

³⁴⁴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頁，369-372；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台北：大化書局，1978 初版)，頁 4；桂齊遜，〈唐代都督府、都護府及軍鎮制度與節度體制創建之關係〉，頁 25-26。

³⁴⁵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初版)，29-45。

³⁴⁶李鴻賓，《唐朝朔方軍研究：兼論唐廷與西北諸族的關係》(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初版)，頁 70-75，103-111，115-123。

³⁴⁷樊文禮，〈唐朔方節度使略論〉，《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 年 3 期，(1988，呼和浩特)，頁 110。

降城一線，自戰國、秦、漢皆中國與北方民族彼此爭奪的邊防要地。³⁴⁸在交通上，東受降城面向白道嶺，中受降城面向呼延谷，西受降山面向狼山口，三者皆屬漠北越過陰山山脈南下的交通管道。³⁴⁹開元十五年後，西受降城成為唐朝與後突厥互市之地。

張仁願的三受降城不設雍城、守具，但配合巡騎、烽堠禦敵於境，是為一動態防禦體系。³⁵⁰三受降城在軍事與邊政上扮演著以下的角色：一、作為北伐的前哨站；二、負責討伐叛亂的邊境降戶；三、唐朝與後突厥汗國在西受降城進行互市；四、突厥復國並再度領有漠北，安北都護府南遷，轉輾安置於中受降城及西受降城；五、作為北方邊疆的動態防禦系統，發揮預警功能；六、實行屯田，其中東受降城是為振武、天德兩軍軍糧的中轉站。³⁵¹



圖五、陰山山脈要圖

資料來源：鈴木宏節，〈唐代漠南における突厥可汗國の復興と展開〉，頁 40。

唐朝藉著三受降城建立起穩固的防線，三受降城修築前，唐朝每年都受到突厥的入侵，築城之後，唐朝只有一次突厥入侵的紀錄。³⁵²事實上，唐朝在景

³⁴⁸ 朱開宇，〈唐代交通圖唐帝國的空間運作——邊防、軍政佈局及歷史意義〉，頁 89。

³⁴⁹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頁 246，269-271，275。

³⁵⁰ 李鴻賓，〈唐朝朔方軍研究：兼論唐廷與西北諸族的關係〉，頁 80-81。

³⁵¹ 袁志鵬，〈論唐代三受降城與鹽州城的修築〉，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頁 60-63，66-80。

³⁵² 王永興，〈論唐代前期朔方節度使〉，收氏著《唐代前期西北軍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

龍二年重新佔有現今內蒙古中部後，到唐亡都持續領有該地區。而唐朝一貫藉由歸降遊牧民來駐守邊疆，抵禦漠北的遊牧國家，使得朔方軍吸收了大量遊牧民出身的將士。9世紀回紇汗國解體之際，沙陀三部落被安置於原屬朔方的振武軍，不僅參與了平定黃巢之亂，進一步入主河東，開啟五代時期沙陀諸王朝。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個沙陀王朝。同時間，契丹亦得脫離回紇的掌控，漸漸建立起未來千年異族王朝的二元體制，後來和宋朝簽定澶淵之盟，開啟了一種既非納貢也非羈縻的國與國關係。³⁵³無論是沙陀還是契丹，都結合了遊牧集團的軍事力量與居住地區的統治技術，可視為 10 世紀前後中央歐亞型國家的興起。³⁵⁴

最後，西方學者關注於農耕中國和草原遊牧國家的權力週期，或歷史循環，並從農牧混合地帶去解釋兩個社會的興衰如何相互連結。³⁵⁵以上的說法突顯了農牧混合地帶的地位，固然有其學術貢獻，但同時似乎也預設了兩個社會無法產生質變。從這一章的各個史例可證，無論是後突厥從掠奪轉為互市、8 至 9 世紀漠北出現文字、都城、體系化宗教，乃至 9 世紀回紇和唐朝衰亡時內陸歐亞型國家的興起，都可看出南北兩社會透過農牧混合地帶展開互動的同時，漠北的遊牧社會也發生一種「螺旋向上」的演變，³⁵⁶這些變革又以多線並行的方式，反饋到邊疆的農牧混合地帶之上。

學出版社，1994)，頁 303-304。

³⁵³張廣達，〈從「安史之亂」到「澶淵之盟」：唐宋之際的中原和北方〉，頁 1-20。

³⁵⁴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頁 307-308。

³⁵⁵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169-172，328-352；巴費爾德(Thomas Barfield)著，袁劍譯，《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頁 11-20。

³⁵⁶山田信夫，《北アジア遊牧民族史研究》，頁 225-227。

第五章、結論



本文緊扣兩條線索進行討論，分別是後突厥汗國與農牧混合地帶。其中，農牧混合地帶草原與中國歷史的中心，當地的遊牧、半遊牧集團往往牽動了南北兩個地域的歷史，前有李唐出自武川，後有突厥人推翻唐朝五十年羈縻統治，建立後突厥汗國。本文除了第一章緒論，正文第二、三、四章分別討論遊牧國家的歷史發展、7世紀唐朝加諸突厥的羈縻統治及其崩潰，還有唐朝與後突厥奪爭農牧混合地帶及其後繼影響。透過這些節章，希望回應緒論提出的三個問題。

第二章「草原與農牧混合地帶的歷史」，也為文本提供一個討論的框架，討論了歐亞草原歷史的時代劃分，也透過有關農牧混合地帶的討論，試把歐亞草原的歷史與中國史連結。約公元前 1000 年首批騎馬遊牧民族出現於西南亞，約公元前 700 年，騎馬、遊牧、尚武的文化開始東傳。在歐亞草原東部，匈奴、鮮卑到柔然遊牧民歷史的第一個階段，6 至 8 世紀的突厥、回紇是第二階段。這階段遊牧民發明了自己的文字，開始建造城池，並引入體系化宗教。10 至 13 世紀，契丹和蒙古解散原生部落，用人為的政治力重編成新的軍政單位。文字、城池、體系化宗教，加上部落的解散與重編，代表著可汗專制統治的成立，草原歷史正式進入的第三個階段。與此同時，中國北方疆邊的農牧混合地帶作為草原與中國歷史的中心，既是遊牧民入侵的發起線，也是中國防禦遊牧民的前線。遊牧民出身的北魏在陰山地區建立六鎮，以阻擋漠北的柔然，六鎮的人們漸漸成為新的精英，間接促成了唐朝的建立。李淵入主關中時，便聯合匈奴系費也頭，消滅河西薛舉。唐朝滅東突厥後，在農牧混合地帶安置突厥降部，防範漠北的薛延陀。突厥人經歷唐朝五十年的羈縻統治後「復國」，建立起後突厥汗國，與唐朝彼此爭奪農牧混合地帶。

第三章「從唐朝羈縻統治到後突厥建國」，分別討論了唐朝的羈縻體制、唐羈縻統治下的阿史德氏，還有突厥復國後從十二姓擴大到三十姓的過程。唐朝羈縻州的主要特徵為長官世襲、版籍多不上戶部，是魏晉南北朝「外臣內臣化」的延續。貞觀一朝，北方邊疆的形勢數度變化，羈縻州一度廢置，記載非常零散而且混亂。比較可以確定的，是高宗龍朔三年平定漠北鐵勒，在大漠南北分置都護府的格局。麟德元年，漠南的雲中都護府命名為單于大都護府。在唐朝的統治下，阿史德氏透過入質、從征、擔任要職累積了實力。調露元年，在阿史德氏的主導下，突厥人起來反抗唐朝統治。在 7 世紀末「復國」的後突厥實際上是阿史那旁支在阿史德氏輔助下建立的國家，後者比起東突厥時期更積極參與政治與軍事的決策。同時，以陰山北斜面靠近漠口的黑沙為中心，骨咄祿及默啜四面征討，在東突厥十二姓的基礎上，兼併西突厥十姓、拔悉密五姓、葛邏祿三姓，組成三十姓突厥，是為後突厥的全盛期。

第四章，「後突厥與唐朝爭奪農牧混合地帶」分別討論了黑沙南庭的位置、南北汗庭的兩難與 8 世紀以降的草原與農牧混合地帶。黑沙南庭的位置在今白雲鄂博與百靈廟之間，靠近百靈廟一側。後突厥頡利施可汗、默啜可汗以黑沙為中心，征討四方的戰略，可以跟東突厥晚期建牙定襄，後突厥毗伽可汗建牙於都斤山互相比較。基本上，建牙定襄與黑沙都富有進攻意義，代表游牧國家極積掠奪、控制農牧混合地帶的意圖。然而，定襄的缺點是離唐朝太近。因此，後突厥選擇以黑沙作為草原與農牧混合地帶的架橋，建立一個相對安全的基地。但隨著三受降城的修築，迫使毗伽可汗採取戰略守勢，將汗庭遷往於都斤山。公元 8 世紀初，後突厥雖然放棄了與唐朝爭奪農牧混合地帶，但也在開元十五年爭取到與唐朝互市，開啟了後來回紇透過互市獲取南方資源的路線。同時，後突厥發明了自己的文字，並出現了築城、建立佛寺的建議。雖然後兩者並沒獲得採用，但突厥文字為後來的回紇所沿用，回紇人也在草原上建立具備商業與宗教性格的城池，並引入摩尼教作為體系化宗教。可以說，後突厥透過回紇間接啟發了 10 世紀以降的游牧封建制與中央歐亞型國家。另一方面，唐朝為與後突厥爭奪農牧混合地帶的舉動，也牽動了中唐以後的歷史。7 世紀突厥羈縻州作為農牧混合地帶上的勢力脫離唐朝，為了對抗後突厥，唐朝在農牧混合地帶的中部長期派駐行軍，行軍逐漸鎮軍化、常駐化而成為了朔方軍。後突厥滅亡之際，粟特系突厥人進入農牧混合地帶東部，成為安史軍的勢力，而以上兩股勢力將在安史之亂中展開對決。唐末，被安置於代北的沙陀逐漸壯大，下啟五代沙陀王朝，而遼西的契丹也建立起同時統治游牧民和農耕民的政權。在沙陀王朝之後，宋朝與遼朝締結澶淵之盟，開啟了一種既非納貢也非羈縻的國與國關係，代表著新時代的展開。

藉著以上的討論，本文試回應三個問題。第一，是後突厥汗國，特別是毗伽可汗時期作為草原歷史的轉捩點。東突厥時期便有使用粟特文字的記錄，在後突厥時期更發明了自己的文字。毗伽可汗統治時期出現了修佛寺、築城池的建議，但沒有被落實。後繼的回紇繼承了突厥文字，建立了具商業與宗教性格的城池，並引入作為體系化宗教的摩尼教。文字、城市、體系化宗教是 6 至 9 世紀游牧國家留給 10 世紀游牧民的遺產。6 至 9 世紀由於突厥系民族的在歐亞草原建立了好幾國游牧國家，隨著貿易的擴大、情報與統治技術的累積。10 世紀以降相繼出現中央歐亞型國家，具備同時統治游牧與定居社會的技術，同時藉由重編原生部落，建立了可專制的制度。在草原東部，這些變化可以追溯到回紇乃至後突厥毗伽可汗時代。

第二，是後突厥與唐朝爭奪牧混合地帶，如何造成雙方政策的轉變。東突厥滅亡後，唐朝為了國防需要，將突厥遺民安置在農牧混合地帶，麟德元年建立單于大都護府。唐朝為了防範突厥的勢力而架空阿史那氏，特別是頡利可汗嫡系。突厥人在阿史德和阿史那旁支的領導下，推翻唐朝的羈縻統治建立後突厥汗國。唐朝與後突厥爭奪牧混合地帶，為扭轉劣勢而在農牧混合地帶中部築三受降城，並成立了朔方軍。後突厥則由於軍事失利，把重點放回於都斤山，

並加促了草原的「文明化」。後突厥滅亡之際，進入農牧混合地帶東部，形成安史軍勢力。在安史之亂中，以上兩股勢力正面交鋒。如同後突厥滅亡，9世紀回紇滅亡促成沙陀與契丹相繼崛起。一方面，契丹建立的遼朝同時掌控草原與農牧混合地帶，是為典型的中央歐亞型國家。另一方面，宋朝取代沙陀王朝中的後周，與遼朝建立澶淵之盟。透過上述的事實，可見農牧混合地帶就如拉鐵摩爾所言，是草原與中國歷史的中心。然而，這兩個個區塊的歷史不應該是歷史循環，而是螺旋向上，多線並行。

最後，是關於後突厥汗國的性質。後突厥的建立，有賴於阿史德氏的輔助，而比起東突厥時期，阿史德氏更積極地參與到政治和軍事的決策。後突厥曾建牙於黑沙南庭，比較東突厥晚期的定襄、後突厥全盛期的黑沙與後突厥晚期的於都斤山，定襄適合進攻但最難防守，黑沙適合進攻比較容易防守，於都斤山離中國最遠，其價值在於加強對漠北的控制。蒙古高原的游牧國家需要從中國獲得資源，維持自身的存在。當中，戰爭與貿易都是可考慮的手段。因此，建牙漠南還是漠北，即是戰爭與貿易之間的抉擇。後突厥最終選擇了後者，這路線由後來的回紇繼承，間接促成了游牧國家的「文明化」。

徵引文獻



傳統文獻

- 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0)。
- 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 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90 北京第 3 刷)。
- 董誥，《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 王欽若，《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94)。
- 王昶，《金石萃編》(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

出土文獻

- 噶欲谷，〈噶欲谷碑〉，引自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頁 95-114。
- 藥利特勤，〈闕特勤碑〉引自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頁 115-147。
- 藥利特勤，〈毗伽可汗碑〉引自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頁 148-176。
- 佚名，〈查干敖包銘文〉，引自白玉冬、包文勝，〈內蒙古包頭市突厥魯尼文查干敖包銘文考釋——兼論後突厥汗國「黑沙南庭」之所在〉，《西北民族研究》，

2012 年 1 期，(2012，蘭州)，頁 2-4。

佚名，〈阿史德覓覓夫人阿史那氏(毗伽公主墓誌)〉，收入張寧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北京卷附遼寧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初版)，頁 140。

佚名，〈阿史那感德墓誌銘〉，引自趁振華，《洛陽古代銘刻文獻研究》(西安：三秦，2009 初版)，頁 473。

佚名，〈大唐安西阿史夫人壁記〉，引自石見清裕、森安孝夫，〈大唐安西阿史夫人壁記の再読と歴史学的考察〉，《内陸アヅア言語研究》，第 13 号，(豊中市，1998)，頁 93-107-110。

佚名，〈唐故薛突利施匐阿施夫人墓誌銘〉，收入王仁波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陝西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初版)，頁 90。

中、日文著作

田村実造，《アヅア史を考えるーアヅア史を構成する四つの歴史世界》(東京：中央公論社，1990 初版)。

田村実造，《中国史上の民族移動期》(東京：創文社，1985 初版)。

山田信夫，《北アヅア遊牧民族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1989 初版)。

丹尼斯·塞諾(Denis Sinor)著，羅新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06 初版)。


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東京：講談社，2007 年初版)。

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初版)。

巴費爾德(Thomas Barfield)著，袁劍譯，《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初版)。

護雅夫，《遊牧騎馬民族国家》(東京：講談社，1967 初版)。

林恩顯，《突厥研究》(台北：商務書局，1988 初版)。

- 
-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初版)。
- 妹尾達彥，《長安の都市計画》(東京：講談社，2001 年初版)。
- 妹尾達彥，《中華の分裂と再生》(東京：岩波書店，1999 年初版)。
- 前田正名著，李凭、孫耀、孫蕾譯，《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初版)。
-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台北：中央研究院，2009 初版)。
- 今西錦司，《遊牧論そのほか》(東京：平凡社，1995 初版)。
- 江上波夫著，張承志譯，《騎馬民族國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 初版)。
- 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 初版)。
- 高明士，《東亞古代的政治與教育》(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初版)。
-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社，1984 初版)。
- 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初版)。
- 李大龍，《漢唐外交制度史》(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8 初版)。
- 克利亞什托爾內著，李佩娟譯，《古代突厥魯尼文碑銘：中亞細亞史原始文獻》(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 初版)。
- 任美鏗，《中國自然地理綱要》(北京：商務出版社，1979 初版)。
- 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歴史的展開》(吹田：關西大學出版社，2011 年 2 版)。
- 竺沙雅章著，吳密察譯，《征服王朝論的時代》(台北：稻香出版社 2015 年 2 版)。
- 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初版)。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台北：大化書局，1978 初版)。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初版)。
李鴻賓，《唐朝朔方軍研究：兼論唐廷與西北諸族的關係》(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初版)。



西文著作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Denis Sinor edit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Wolfram Eberhard,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Leiden: E. J. Brill ,1965)
Anatoly M. Khazanov translated by Julia Crookenden,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94)
Sevyan Vainshtein, translat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Nomads of South Siberi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學位論文

朱振宏，〈隋唐與東突厥互動關係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林慧芬，〈北亞游牧國家之興衰與均勢——以突厥第一汗國為中心〉，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暨碩士班歷史組碩士論文，2010。
朱開宇，〈唐代交通圖唐帝國的空間運作——邊防、軍政佈局及歷史意義〉，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

袁志鵬，〈論唐代三受降城與鹽州城的修築〉，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11。



中、日文論文

白鳥庫吉，〈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對立〉，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第8卷，(東京：岩波書店，1970 初版)，頁 69-84。

Karl A. Wittfogel 著，蘇國良、江志宏譯，〈中國遼代社會史(907-1125 年)總述〉，收入鄭欽仁、李明仁編《征服王朝論文集》(台北：2010 二版)，頁 1-69。

田村実造，〈中國征服王朝について——總括にかえて〉，收入氏著《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中編，(京都：東洋史研究会，1974 初版)，頁 623-655。

田村実造，〈北亜に於ける歴史世界の形成と展開〉，收入氏著《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上編，(京都：東洋史研究会，1964 初版)，頁 5-56。

村上正二著，鄭欽仁譯，〈征服王朝〉，收入鄭欽仁、李明仁編《征服王朝論文集》(台北：2010 二版)，頁 91-150。


護雅夫著，林慧芬譯，〈遊牧國家的「文明化」——突厥遊牧國家〉，《早期中國史研究》，第2卷，(2010，台北)，頁 213-253。

護雅夫著，吳慶顯譯，〈索格底人在蒙古地區諸游牧國中所扮演的角色——一個新發現資料的介紹〉，《邊政研究所年報》，第9期，(台北：1987 初版)，頁 283-299。

護雅夫著，吳永明譯，〈阿史德元珍與噶欲谷〉，《民族譯叢》，1979 年 3 期，(北京，1979)，頁 35-39。

護雅夫，〈突厥の國家構造〉，收氏著《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第1編，(東京：山川出版社，1967 初版)，頁 3-60。

護雅夫，〈鉄勒諸部における elt äb är、irkin 号の研究〉，收氏著《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第1編，(東京：山川出版社，1967 初版)，頁 398-438。

- 
- 護雅夫，〈突厥と隋・唐兩王朝〉，《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第1編，(東京：山川出版社，1967 初版)，頁 161-223。
- 松田壽男，〈絹馬交易覺書〉，收入氏著《松田壽男著作集》，第2冊，(東京：六興出版，1986 初版)，頁 154-179。
- 林俊雄，〈掠奪・農耕・交易から觀た遊牧國家の發展：突厥の場合〉，《東洋史研究》，44:1，(京都，1985.6)，頁 110-135。
- 平田陽一郎，〈突厥他鉢可汗の即位と高紹義亡命政權〉，《東洋學報》，86:2，(2004，東京)，頁 1-34。
- 羽田亨，〈唐故三十姓可汗貴女阿史那氏之墓誌〉，《東洋學報》，3:1，(1913，東京)，頁 134-152。
- 片山章雄，〈Toquz Oγuz と「九姓」の諸問題について〉，《史學雜誌》，90:12，(1981，東京)，頁 39-120。
- 森安孝夫，〈テベツト語史料中に現われる北方民族——DRU-GU と HOR〉，《アヅ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第14期，(1977，東京)，頁 1-48。
- 岩佐精一郎，〈突厥の復興に就いて〉，收入和田清編《岩佐精一郎遺稿》(東京：岩佐傳一，1936 初版)，頁 77-167。
- 芮傳明，〈Coray 和 Kara Kum 方位考〉，《西北民族研究》，1990 年 2 期，(1990，蘭州)，頁 151-160。
- 蓋山林，〈內蒙古百靈廟一帶突厥遺跡初探〉，收氏著《蓋山林文集》(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 初版)，頁 725-761。
- 白玉冬、包文勝，〈內蒙古包頭市突厥魯尼文查干敖包銘文考釋——兼論後突厥汗國「黑沙南庭」之所在〉，《西北民族研究》，2012 年 1 期，(2012，蘭州)，頁 78-99。
- 鈴木宏節，〈三十姓突厥の出現——突厥第二可汗國をめぐる北アヅア情勢〉，《史學雜誌》，115:10，(2006，東京)，頁 1-36。
- 鈴木宏節，〈唐代漠南における突厥可汗國の復興と展開〉，《東洋史研究》，

70:1, (2011, 京都), 頁 35-66。

鈴木宏節〈内モンゴル自治区発現の突厥文字銘文と陰山山脈の遊牧中原〉,
《内陸アツア言語の研究》, 第 28 号, (2013, 大阪), 頁 67-100。

鈴木宏節, 〈突厥トニユクク碑文筈記——斥候逃亡者〉, 《待兼山論叢(史学
篇)》, 第 4 号, (2008, 大阪), 頁 55-80。

吉田順一, 〈ハンガイと陰山〉, 《史観》, 第 102 冊, (1980, 東京), 頁 48-61。

吉田順一, 〈モンゴルの伝統的な遊牧の地域性〉, 《史滴》, 第 5 号, (1984, 東
京), 頁 57-90。

齊藤茂雄, 〈突厥「阿史那感德墓誌訳注考——唐羈縻支配下突厥集団の性
格〉, 《内陸アツア言語の研究》, 第 26 期, (2011, 豊中市), 頁 1-38。

石見清裕, 〈ラティモアの辺境論と漢～唐間の中国北辺〉, 收唐代史研究会編
《東アツ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東京: 唐代史研究会, 1999 年, 初版),
頁 278-299。

石見清裕, 〈唐の成立と内陸アツア〉, 《歴史評論》, 2010 年 4 月號, (2010,
東京), 頁 4-16。

石見清裕, 〈唐の建國と匈奴の費也頭〉, 收入氏著《唐の北方問題と国勢秩
序》, 頁 17-63。

石見清裕, 〈唐の突厥遺民に対する措置〉, 收入氏著《唐の北方問題と国勢秩
序》(東京: 1998 初版), 頁 109-147。

石見清裕、森安孝夫, 〈大唐安西阿史夫人壁記の再読と歴史学的考察〉, 《内陸
アツア言語研究》, 第 13 号, (豊中市, 1998), 頁 93-110。

李鴻賓, 〈長城區域在唐史研究中的位置——從歷史學與民族學結合的角度觀
察〉, 收氏著《唐朝的北方邊地與民族》(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初
版), 頁 100-113。

スコット・ピアース(Pearce Scott)著, 早大北朝史研究会譯, 〈代の地——内陸
アツア境界地域社会の起源発展および歴史的意義〉, 《史滴》, 第 27 号, (東



京，2005)，頁 22-46。

森部豐，〈唐前半期河北地域における非漢族の分布と安史軍淵源の一形態〉，收入唐代史研究會編《唐代史研究》，第 5 卷，(2002，東京)，頁 22-45。

張廣達，〈從「安史之亂」到「澶淵之盟」：唐宋之際的中原和北方〉，收黃寬重編《基調與變奏：七至十二世紀的中國》(台北：政大歷史學系，2008 初版)，頁 1-27。

佐川英治，〈遊牧と農耕の間——北魏平城鹿苑の機能とその変遷〉，《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 47 号，文学部教員研究活動一覽，(2007，岡山)，頁 49-76。

馬馳，〈試論唐代蕃州的管理體制〉，收入中國唐代學會編輯委員會編《第三屆中國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唐代學會，1997 年)，頁 1-32。

譚其驤〈唐代羈縻州論論〉，收入《紀念顧頡剛學術論集》，(下冊)，(成都：巴蜀書店，1990 初版)，頁 555-569。

岡田宏二〈中国王朝の羈縻政策が概観〉，收氏著《中国華南社会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3 初版)，頁 3-30。

谷川道雄，〈東アヅア世界形成期の史的構造〉，收入唐代史研究會編《隋唐帝国と東アヅア世界》(東京：汲古書院，1979 初版)，頁 87-112。

栗原益男，〈七、八世紀の東アヅア世界〉，收唐代史研究會編《隋唐帝国と東アヅア世界》(東京：1979 初版)，頁 139-164。

艾沖，〈唐前期東突厥羈縻都督府的置廢與因革〉，《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8:2)，(2003，西安)，頁 135-141。

章群，〈唐代降胡安置考〉，《新亞學報》，1:1，(1955，香港)，頁 245-311。

蘇北海，〈唐朝在回紇、東突厥地區設立的府州考〉，《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 年 1 期，(1987，烏魯木齊)，頁 46-55。

樊文禮，〈唐貞觀四年設置突厥羈縻府州考述〉，《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4 年 3 期，(1994，北京)，頁 84-92。

艾沖，〈唐代安北都護府遷徙考論〉，《陝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報)》，(西

安，2008)，頁 105-112。

譚其驤，〈唐北陞二都護府建置沿革與治所遷移〉，收氏著《長水集》(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初版)，頁 263-277。

嚴耕望，〈唐代安北單于兩都護府考〉，《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香港：新亞研究所，1974 初版)，頁 1-27。

李宗俊，〈唐代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再考〉，《中國史研究》，(2009，北京)，頁 61-76。

樊文禮，〈唐代單于都護府考論〉，《民族研究》，1993 年 3 期，(1993，北京)，頁 35-55。

樊文禮，〈唐代靈、慶、銀、夏等州界內的僑置府州〉，《民族研究》，1990 年 4 期，(1990，北京)，頁 84-92。

桂齊遜，〈唐代都督府、都護府及軍鎮制度與節度體制創建之關係〉，《大陸雜誌》，89:4，(1994，台北)，頁 15-43。

趙振華，〈唐《阿史那感德墓志》考釋〉，收氏著《洛陽古代銘刻文獻研究》(西安：三秦，2009 初版)，頁 473-485。

王世麗，王世偉，〈突厥的叛亂與安北都護府南遷〉，《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6:4，(2006，北京)，頁 53-61，148。

田坂興道，〈漠北時代に於ける回紇諸城郭に就いて〉，《蒙古學報》，第 2 號，(東京，1941)，頁 192-243。

樊文禮，〈唐朔方節度使略論〉，《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 年 3 期，(1988，呼和浩特)，頁 110-118。

王永興，〈論唐代前期朔方節度使〉，收氏著《唐代前期西北軍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 246-320。

西文論文

Peter Golden, "The Turk Imperial Tradition in the pre-Chinggisid era", *Turks and Khazars*, (Farnham: Ashgate, 2010), pp23-61.

Edwin G. Pulleyblank, "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 *T'oung Pao*, 2:41,(1952) , pp317-356

Elizabeth E. Bacon, "Types of Pastoral Nomadism in Central and Southwest Asia".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10:1,1954 ,pp44-67.



工具書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5 初版)。

岑仲勉，《突厥集史》(北京：中華書局，1958 初版)。

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第一冊，(合肥：宗徽大學出版社，2000 初版)。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

芮傳明，《古突厥碑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吳玉貴，《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9 初版)。